YISELIE
WENXUE

以色列文学丛书

主编/高秋福

收藏家

〇[以色列]约瑟尔·比尔斯坦/著

〇隋丽君/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YISELIEWENXUE

以色列文学丛书

收藏家





以 色 列 文 学 丛 书

主编／高秋福

收藏家

○[以色列]约瑟尔·比尔斯坦／著
○隋丽君／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收藏家/[以色列]约瑟尔·比尔斯坦著;隋丽君译.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
(以色列文学丛书)
ISBN 7-80647-235-5
Ⅰ.收… Ⅱ.①约…②隋… Ⅲ.长编小说-以色列-现代 Ⅳ.
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2136 号

书　名:收藏家
作　者:[以色列]约琴尔·比尔斯坦 著
隋丽君 译
出版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科佳图书印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6.125
字　数:13 万
版　次:200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0.50 元
ISBN 7-80647-235-5/I·167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高秋福

在世界文学之林中，以色列文学独具特色：流短而源长，物阜又人旺。

所谓“以色列文学”，严格地讲，应该是构成以色列国各民族作家创作的总称。在以色列各民族的作家中，绝大部分是用希伯来文写作的犹太人，也有少数用意第绪文和其他文字写作的犹太人，还有一些用阿拉伯文写作的阿拉伯人。但是，犹太人是以色列国民的主体，而绝大多数犹太作家是用民族语言希伯来文写作的。因此，用希伯来文创作的文学作品成为了以色列文学的主体，是以色列文学最有资格的代表。

以色列是 1948 年建国的。以色列文学迄今只有五十年多一点的历史。因此，我们说以色列文学“流短”。但是，以色列文学上承迄今至少有三千年历史的希伯来古典文学，积淀深厚，因而我们又说它“源长”。希伯来语从古至今一直是犹太人的民族语言。纪元前产生的希伯来《圣经》，是希伯来古典文学的开山之作。公元二世纪前后，犹太人因兵燹之灾被迫从长期居住的巴勒斯坦地区流散到世界各地，希伯来语渐趋衰微，希伯来文学的发展几近中断。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

起，大批犹太人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移居巴勒斯坦地区，流徙世界各地一千多年的犹太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园，作为民族语言文字的现代希伯来文得到复兴。这样，现代希伯来文学才有了发展的机遇。1948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创建自己的民族国家以色列之后，现代希伯来文学真正踏上了复兴和发展的道路，并迅即带着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重新跨入世界各民族文学之林。一时间，以色列文坛上真可谓“人旺”——涌现出一大批有才华的作家；同时也可谓“物阜”——出现了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这些作家和作品不但在长达几千年的希伯来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整个世界当代文坛上也熠熠生辉。

以色列文学的成就当以诗歌和小说最为突出。无论诗歌还是小说，都深受犹太民族独特历史和以色列国独特经历的影响。因此，以色列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自己鲜明、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视角。其一，悠久的犹太民族的历史、犹太人的宗教思想以及以希伯来《圣经》为代表的犹太文化，总是以色列文学取之不尽的创作题材和永不枯竭的思想源泉。其二，犹太民族流亡世界各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大批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地区，这一漫长而独特的流散与回归的过程，在以色列文学作品中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得到强烈的反映。其三，大批犹太人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移居巴勒斯坦地区之后，他们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劳作，重建家园，创办了独特的农业集体村社“基布兹”。基布兹的成员集体劳动，各尽所能，人人平等，按需分配生活物资。这一独特的社会组织对不少犹太人、特别是思想左倾的知识分子发生了重大影响。其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分子在德国上台，对德国及其侵占国家的犹太人大肆屠杀，罹难者有六百万之众，占当时世界犹太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在以色列文学中，以这一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事件为题材，出现了揭示犹太

民族悲苦命运的独特文学流派——"大屠杀文学"。其五，从1948年到1982年，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先后发生五次规模不同的战争。战争不仅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也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创伤。以色列各阶层对战争的看法不尽相同，对吁求解决阿以冲突的中东和平进程也存在不同的主张。这些在以色列文学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其六，以色列文学既承袭了历史悠久的希伯来文学的传统，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同时，由于以色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移民国家，易于接受外来的影响，又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以色列早期的作家受俄罗斯现实主义的影响较大，而六十年代以后，欧美流行的各种现代主义思潮则在以色列文坛上占据了主导地位。总之，犹太民族的历史和以色列的经历极为独特，这就构成了以色列文学有别于世界任何其他国家的文学的极其鲜明的特点与个性。

作为以色列文学主脉之一的现代希伯来诗歌，由被称为"犹太民族诗人"的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发其滥觞，随后有索尔·切尔尼科夫斯基、阿维拉汉·本-伊扎克、戴维·沃杰尔等杰出诗人崭露头角。以色列建国之后，作为移民的犹太人同土生土长的犹太人在民族战争与建设新生活的活动中融合在一起，从中涌现出一批具有新的民族观念、新的艺术和审美情趣的诗人。其中最引人注目有耶胡达·阿米哈依、艾米尔·吉尔博亚、丹·佩吉斯、泽尔达·什纽尔森·米什考斯基。七十年代之后，出现许多土生土长的以色列诗人，其中的佼佼者有迈尔·威泽蒂尔、约翰·瓦拉赫、艾哈隆·沙布泰。他们运用越来越纯熟的现代希伯来文，创作出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别于前人的大量诗歌作品。

作为以色列文学另一主脉的是小说。在希伯来文学中，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是十九世纪中叶才开始出现的。到本世纪四十年代，一些有成就的作家陆续引起人们的注意。二十年代登上

文坛、六十年代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希莫尔·约瑟夫·阿格农是其中最卓越的代表。以色列建国后，同诗歌一样，小说创作日趋繁荣，新人不断涌现，接连推出佳作。有的文学史家将五十年来以色列的小说创作粗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以色列建国初期的二十年。在这个时期，多数作家是来自欧洲、特别是来自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犹太移民，少数是土生土长的犹太人。他们大多在基布兹里过着严格的集体生活，后来参加了以色列的独立战争。他们的作品富有强烈的民族复兴和民族立国的使命感。有的文学史家称他们为以色列“独立战争作家群”。本杰明·塔木兹、阿哈隆·梅吉德、伊扎克·奥帕兹、摩希·沙米尔是其中杰出的代表。第二个时期是从1967年“六日战争”到1982年入侵黎巴嫩战争。这一时期的作家基本上都是在以色列出生并成长起来的。他们亲身经历了三次阿以战争，形成了与前辈作家不同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和道德观。他们敢于大胆描写与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凸现个人的作用。有的评论家称他们为以色列“社会生活作家群”。其中最有名的是约拉姆·坎纽克、阿哈隆·阿佩费尔德、阿莫斯·奥兹、亚伯拉罕·约书亚、约书亚·肯纳兹。第三个时期是从八十年代初至今。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一批东方犹太作家和女性作家在以色列文坛上崛起。他们对犹太民族的命运也极为关注，但写作上大多采取西方流行的各种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萨维昂·利布莱希特、奥丽·卡塞尔-布鲁姆、叶胡迪特·卡切尔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这样三个时期的划分，只是从作家群的形式及其主要创作倾向上来说的，并非没有争议。实际上，以色列文学的历史太短，不少作家实际上跨越了其中两个甚至三个时期。

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是亚洲东西两端的两个古老的民族，都有悠久而灿烂的文化传统。但是，主要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这

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长期受到阻隔。八十年代末,中国同以色列的关系开始改善。1992 年初,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此,现代希伯来文学的一些作品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来。但是,就我所知,这些被介绍过来的作品大多是单本形式,还没有较系统地以多本丛书形式出现。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独具慧眼,提出了出版以色列文学丛书的设想,得到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的大力支持。经过反复协商,双方同意用几年时间,把以色列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代表性作品有计划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他们对以色列文学发展的概貌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在实施这项计划的过程中,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洪安南副社长和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所长尼莉·科恩女士都希望我来担任这套丛书的主编。我在中国同以色列建交过程中曾奉命多次访问以色列,同以色列的政治界、经济界、文化界人士多有接触。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结识了科恩女士,并同她探讨如何把以色列的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来。但是,说实话,我对以色列文学了解不多。因此,真的要担负起这套丛书的主编之责时,我确实感到有点惶恐。我惟愿认真把这套丛书编好,以不辜负他们的信托和希望。

这套丛书的选本大多是由希伯来文转译的英文本,个别是由意第绪文转译的英文本。不少英文译本中夹杂着一些希伯来文、意第绪文、阿拉伯文,甚至法文、德文、拉丁文词汇或语句。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和我国一些以色列和中东问题专家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丛书的编选和翻译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尚祈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教。

2000 年 7 月 30 日于北京新华园

目 录

第一章　在雨中

施穆埃尔·索洛米尔死在了我们的银行里。他是带着爽朗的笑声离开人世的。他之所以开怀大笑,是因为哈莱维对他讲了他的股票的情况。

葬礼在一个炎热的夏日举行。热得昏昏欲睡的乞丐们连想要求施舍都懒得张口。不过,他们当中有一位却一手拿着一只要钱的盒子,像欢迎客人那样张着双臂向我们走来。只见他五短身材,穿着深色衣服,用唱诗班领唱者那样悦耳的声音喊道:"各位好!"

施穆埃尔·索洛米尔是从萨费德搬到我们镇上来的。他带了一些展品来,要在这里建一座博物馆。由于开支超过了原先的估计,他欠了债,于是便向我们银行请求贷款。当他来问为什么拒绝他的请求时,哈莱维解释了我们银行对像他这样的人的看法:没有直系亲属,没有职业,没有钱,也没有什么财产可言,没有愿意为他作保的朋友。如果他突然撒手人寰,谁来偿还他的债务?哈莱维双颊轻微颤抖着得出结论说:银行可不是慈善机构!他对坐在他对面的那个人显然没有任何敬重之意。

索洛米尔在一家老人院找到一个打更的职位之后,又来我们银行请求贷款。有了贷款,他也许就能办起一所出借依地语书籍的图书馆了。据他估算,若能有一千名固定借阅者,他的收

入用来归还贷款和支付利息就会绰绰有余。他请哈莱维放心，办这所图书馆是不需要任何花费的，因为那些继承了依地语书籍的人通常把它们当废物扔掉。他住在萨费德时就注意到这一点了；到我们镇上后，他在四处察看死去的东欧人的房舍时也发现了类似情况。哈莱维感到不解的是，既然他有现成的书，不必花钱去买，那还要贷款干什么？另外，有谁会劳神去读那些从垃圾桶里捡来的依地语书籍呢？当他站起身来示意谈话已经结束时，索洛米尔那邋遢的外貌突然令他心头一震。后来他常常打趣地描述他那顶编制的帽圈上插着两根彩色羽毛的贵族帽、垂在脖子后面的那几绺散乱的灰白头发、没有拉上拉链的裤子以及用绳子系着的鞋。

“这是什么逻辑？”哈莱维问。

索洛米尔微笑着做了回答，好像他已经对这个问题深思熟虑过了似的。“如果我按照逻辑生活的话，”他答道，“我现在就会糟糕得不成样子了。”

哈莱维想了一会儿说，如果索洛米尔能为银行拉来客户，他也许会考虑批准贷款。但是，索洛米尔刚到我们镇上来，除了住在老人院中的人以外，他几乎谁也不认识。

“从这里找办法，”他边说边用手抹了一下脑袋，又轻轻拍了拍他的秃顶。“是的，从这里找。”他重复了一句之后，便向索洛米尔介绍起一个时期来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的一个项目的某些细节。他解释说，这个项目是要帮助老年人，唤起他们对生活的新的热情。他是在一位名叫肯纳德·贝伦森的年轻美国人所写的一本书中读到它的。这个美国人创办了一家股东公司，要实施一项迅速致富的计划，不仅让整个整个的国家富起来，而且让个人富起来。哈莱维援引肯纳德·贝伦森书中一个主张说：“老年人所需要的是致富的动机。”

索洛米尔又在哈莱维的桌旁坐下来。他对成为这样一家公司的股东是没有什么顾虑的。他在萨费德生活的那些年中，一直都在思索精神问题。现在是把脑筋转向物质的东西、挣点小钱防老的时候了。这正是他选择到我们这个镇来办博物馆和依地语图书馆的原因。他发现，我们这个镇上全都是领养老金的人，既有以色列的，也有国外来的。以前的宾馆和饭店已经改成供老人和能住得起的人居住的容身之所了。其他人则到一个更穷的地段去租住一些房舍里的房间。那些房舍是政府卖给一个澳大利亚金融家的，卖给他时有一个条件：他得把这些房子廉价租给领养老金的人。索洛米尔自己就从此人那里租了一个大院里面的一间加长的平房，在那里建起了博物馆和出借依地语书籍的图书馆，使那些领养老金的人有地方可去，有点东西可读，从而也就可以打发他们那些孤寂的时光。

"肯纳德·贝伦森?"他问了一句，因为他很想多听听有关这个布鲁克林年轻人和他派到世界各地去推广他的主张、推销他的股份的那些代理人的事。哈莱维确信，肯纳德·贝伦森在以色列也会利用股票交易所给所有公民带来财富的。其指导思想是连对穷人也要鼓励他们去购买股份，从而结束他们一分钱也要掰成两半花的生活。

索洛米尔被聘请为贝伦森的代理人，可以在我们镇上到处与人谈话，传播贝伦森的教导，这使他心里着实很受用。"咱以前是个很不错的演说家哩。"他离开我们银行时说。

没过多久，索洛米尔就开始带来客户了。他的眼睛还盯着喜欢把一打打的钞票藏在老人院的犄角旮旯里的老人院老板，盯着在那里当园丁的老光棍韦格，盯着有钱的丽达·奥拉米，还有他自己的邻居——卡车司机诺德尔。

一个冬季的傍晚，天下着雨。索洛米尔把那个在镇上电影

院门口卖面包圈的耶胡舒阿·里默尔领到我们银行里来了。耶胡舒阿·里默尔个子不高,长得很结实,身上衣服穿得左三层右三层的。他以怀疑的眼光环视了一下大厅,连索洛米尔都防着,惟恐他偷听到他述说的事情。他站在哈莱维的写字桌和我的写字桌之间,把身子俯向哈莱维说:“年轻人,请原谅我问你一个很机密的问题。”说罢他在人家让给他的座位上坐下,把两个胳膊肘支在桌子上,还用一只手半遮住嘴巴,提出一些问题来,诸如,如果他把很大一笔钱存在我们银行里,而且存上好几年,我们能给他多少利息。他没等哈莱维把各种不同的存款办法讲完,就把他那装满面包圈的篮子提起来,要他估摸一下里面藏着多少钱。他用大拇指向我示意:“你也猜猜看。”他的鼻子又扁又平,两只耳朵里各长出一撮黑毛。他把篮子里的面包圈倒在哈莱维的桌子上,让我们看他那藏钱的夹层,夹层用细电线固定着。他对自己这个具有独创性的发明很是得意,因为这使他多年来一直没有受过乞丐们的骚扰。然而,哈莱维却不认为这是个智慧之举,说是经过这么多年的通货膨胀,这些钱的价值已经大大减少了。里默尔不这么想,理由是,由于他意外地为自己攒下了这么多钱,这点损失不算什么。他的钱的价值的确减少了,但本钱还在。他朝身后望了一眼,招呼索洛米尔到哈莱维的桌前去。“你对他说吧,”他说。索洛米尔搬过一把椅子坐下来,解开了大衣的扣子。那是一件女式大衣,只不过把纽扣改到了另一边。

索洛米尔是在前一年的夏天认识里默尔的,那是在街上发生了一起小小的风波之后。一天下午,他在走过电影院的宽阔台阶时,看到里默尔坐在那里,显然对他引起的骚动毫不在意。人们指着他的鼻子大声抗议着。一名妇女在大声嚷嚷,好像是说一只狗在面包圈篮子上撒了尿。她还让俯身察看的人仔细闻一闻。里默尔对周围的人不理不睬,只顾把一只口袋中的宝贝

东西掏出来装到另一只口袋。里面有一堆鞋带、一个记事本、一根两头都露出烛芯的蜡烛、一把剪刀、一个嗅盐盒和一个压碎了的熟鸡蛋。他拿起那个鸡蛋，在掌心中滚来滚去，念念有词地祝福一下后咬下一小块，然后从牙缝中把蛋壳吐出来。接着，他斜仰起脑袋，用两个手指从嗅盐盒中捏一点盐放进嘴里。索洛米尔往里默尔的钱盒子里扔了几个硬币，从篮子里拿起一个面包圈，当着那些围观者的面大嚼起来，把他们惊得目瞪口呆。里默尔斜眼把他扫视了一番，从那双破烂不堪的鞋看到那顶饰着漂亮羽毛的帽子，然后耸了耸肩膀。“又是一个讨厌的家伙，”他咕哝着。说完便站起身，用一块布把面包圈盖起来，表示这一天的生意到此结束。他周围的人立即散去。那个瘦高个的摄影师回到他的照相机旁，那相机是一个放在三角架上蒙着黑布的盒子。那女人回到街对面她的摊亭去了。她怒气未消，依旧从亭子里面隔着柜台大声嚷着。但是，街上的人已不再理会她了。店铺都关了门，拉上了百叶窗。除了偶尔有车辆经过之外，四周一片寂静。

索洛米尔从台阶上站起身来，掸掉放在裤子外面的已开线的衬衫上的面包渣，蹒跚着走开了。他刚走过一两座房子，就听到里默尔在后面喊他：“年轻人，买张彩票吧！它会给你带来好运的！”

索洛米尔在坐到哈莱维桌旁的座位上之前，俯身看了一眼里默尔带来的钱。不久前，他还竭力要在里默尔的家里发现那些钱的踪迹。他们在电影院外面首次见面之后，一天晚上，索洛米尔来到里默尔家中看看他住的情况，同时还告诉他，总工会要为全镇领养老金的人组织一次免费观光。那天，索洛米尔对里默尔讲了他自己听到和从报上读到的一些例子，提醒他防范可能瞄上他的盗贼。他这样做是为了吓唬里默尔，使他把钱存到

我们的银行里。里默尔的小棚屋夹在多户分租的公寓和一些风雨飘摇的小破房中间，四周是野猫野狗出没的垃圾场，那里正是社会底层为非作歹之徒的藏身之地。

索洛米尔毫不怀疑，里默尔的小棚屋迟早会遭盗贼光顾。他把一些关于最近发生溜门撬锁事件的剪报拿给里默尔看，其中包括关于一对老夫妻的报道。一天，当盗贼破门而入时，这对老夫妻险些送了性命。报纸上还刊登了那位老妇人坐在门口讲述事发经过的照片。她讲到她丈夫吓得魂不附体，站在床上一个劲儿地向盗贼们喊："愿你们健康长寿！"他们之所以保住了性命，是因为教堂执事一大早来敲门喊她丈夫起来做晨祷。那几个贼尽管吓了一跳，还是带着他们的所有钱币和金货逃跑了。事主并不总能保住性命的，索洛米尔对他说。他记得，有一个老乞丐——他也像里默尔一样，是一个人生活的——就被入室行窃的偷儿用刀刺死了，尽管他们没找到他藏起来的财宝。只是在把尸体搬出去之后，人们才从小木房的地板底下起出来几排夜壶。奉命去点数那乞丐的囤积品的三名警察被累了个半死，还是没能点清数目。最后，人们把夜壶内装的小钱倒进了一个大口袋，送到以色列银行，用一部专用机器才数清楚。

索洛米尔注意到，在里默尔的小房子里，用不着费劲去起那地板。大多数地板块都松动了，缝隙中填满沙子。也用不着在墙上搜寻——那白墙光秃秃的，连一个挂衣服用的挂钩或一块搁板、一个钉子都没有，就好像那房间只是供里默尔歇脚用的，就像小火车站上的候车室。甚至那几件古怪的家具——一张桌子、一只矮凳、一只木箱和一张床——也像是被随便丢在那里的。在旁边那个只有门框没有门的房间里，有一个马桶、一个淋浴喷头、一个洗菜池和一个煤油炉。除了冬天偶尔喝一杯茶或一杯热牛奶之外，里默尔从来不做饭。他每天都到拐角的副食

品店去买自己所需要的食品。他也很少在家:太阳升起他就离家,天黑之后很久才回来。他在电影院的台阶上一直呆到人家大门锁上、行人稀少、路上几乎不再有人影的时候。这时,他用舌头舔舔铅笔尖,计算当天的收入。那是他赖以维生的钱。德国人给的战争赔偿始终被卷得整整齐齐地放在篮子底,从未动过。他心里存着一个模糊的希望,即有朝一日他的某个近亲会来找他。尽管他在战后来到这里时,发现族中已经没有幸存的人了。里默尔的气喘病越来越厉害,他担心自己可能会突然撒手人寰,而身后没有人背诵传统的犹太悼文,为他的灵魂祈祷。所以,他开始自己预先背诵悼文。到他动用德国赔偿金的时候,他的犹太悼文已经背了一年多,因而不再需要花钱雇人吟诵悼文了。他确信,鉴于那些人索要的价码不断提高,要是真的请人为他吟诵悼文的话,他的钱连一个子儿也剩不下。

哈莱维在他的桌子上给我腾了个地方,让我当着里默尔的面点数他的钱。索洛米尔也把他的椅子凑近了点儿。刚才一位穿着高跟鞋的年轻女郎一摇一摆地走出银行,哈莱维乜斜着眼睛盯着人家扭动的丰臀看了半天。此刻,他把同样的眼神转向了我正数着的钱上。如今,在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新客户之后,他在我们银行里已经感到像在家里一样随便了。然而,里默尔的工作却不是那么好做,而是直到那年冬天才说动他到我们银行来听哈莱维讲解肯纳德·贝伦森的计划。“你对他讲话的时候,他好像从来不听,”索洛米尔抱怨说。这么多年来,里默尔形单影只,没有一个诉说对象,想必他已经失去了听人讲话的习惯。偶尔有顾客问点什么,他也很少劳神去回答。即便是摊亭里的那个女人对他表示友善,他也不屑一顾。在烈日炎炎的日子里,偶尔会请他喝杯冷饮的那个女人总想从他嘴里掏点有关他过去的情况或者了解点比较隐秘的事情。他对戴着黑领结、瘦得皮

包骨的摄影师也采取拒之于千里之外的态度，尽管那人时不时地会对他结结巴巴地讲几句谁也听不懂的保加利亚语。有一次，他做梦竟梦见了这位手拿罩着黑套的照相机的摄影师。他像对大人物那样深深鞠躬，脑袋都碰到膝盖了。他挥动双臂，划出一个表示邀请的半圆，问道："先生，要照相吗？"里默尔却没有要给自己照张相的野心。他有其他事情需要考虑。他得在天刚亮时起床，从面包房买来新出炉的面包圈；晚上回来后，他又忙着处理一些个人的事情：洗衬衫、补袜子、钉鞋底。由于要做这么多事，他实在没有时间去应酬。正因为如此，索洛米尔的突然造访根本不受欢迎。倒不是他舍不得招待他一杯茶，而是认为实在没有必要同他讨论他小屋里那光秃秃的墙壁的问题。里默尔从未忧虑过那墙壁的颜色，也不曾担心一片白色的墙壁会令人忧郁。所以，当索洛米尔表示愿意把他博物馆中的一些画拿来装饰他那光秃秃的墙壁的时候，他谢绝了他的美意。他根本不想要那种东西。他记得，老家的墙上，在那个注明"梅厄·巴尔－内斯先生所有"的收藏品盒子旁边，就挂着一对新娘和新郎的肖像。还有一幅画像，画的是一位身穿消防员制服的叔叔。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荡然无存了，都在大屠杀期间被毁掉了。另一方面，能够不花一分钱到全国各地转一圈，那又另当别论了。他本来也打算离开这个小镇，去寻找一个可以在新鲜空气中挣口饭吃的地方。市中心电影院旁令人窒息的空气对他的气喘病很不利，他每次犯咳嗽，都觉得胸痛。至于索洛米尔提到的其他问题，什么入室行窃啦，什么股份了，什么女人啦，他并不特别有兴趣。入室行窃——他说——是任何地方都会发生的。股票交易所的存在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老家罗兹的时候，他就听人们谈起过股票交易所。这里也是，不久前从股票交易所传出的消息引起了沸沸扬扬的街谈巷议，尽管他依旧无动于衷。再

娶？假如对面小摊亭的那个女人给过他恰当的暗示，他本来是会考虑的。但她嫁给了一个罗马尼亚人，而那个人后来失去了劳动能力，以至于她现在不仅得养活自己，还得养活他。在里默尔看来，这就是她常常歇斯底里发作的原因。后来就发生了狗撒尿的事件。说老实话，他挺喜欢那个小东西——那是一只模样可爱的小狗，尾巴弯弯地向上翘起，很有贵族派头。他只是打了一会儿盹，不然一定会把它赶开的。咳，即使没有这些事，他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光是活着就累得人要发疯！”

银行的大堂里已经没有人了。一位职员关了桌上的台灯，从旁门出去了。更夫手指上转动着一串钥匙，巡视了一圈又一圈。出纳员示意我快一些把里默尔的钱递过去。此刻这一捆一捆的钱正横七竖八地躺在我面前。

里默尔对我那样草草地点数他的钱表示不满。他自己每次数钱都得用大半个晚上才行。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在某个冬季寒冷的雨夜，当雨水透过屋顶洇湿他的小房间的各个角落、使他情绪消沉而无法入睡的时候，他会用棉花把百叶窗的缝隙塞严，免得有人偷看他在屋内做什么。然后，借着放在自己肩上的煤油灯的亮光，他把缠绕篮子夹层的电线解开，用整个晚上数他的钱。不过，那天晚上索洛米尔前来造访时，他看到里默尔坐在桌旁，正在把他为自己背下来的犹太祈祷文写在一张纸上。索洛米尔演示给他看，应当如何把一页纸分成几栏，免得把日期和数字混作一团。里默尔对他的建议却不屑考虑。如果天堂里响起一种与众不同的祈祷声，他争辩说，那有什么坏处？它在天堂里肯定不会被湮没。

里默尔望着我把他的钱交给出纳员时，露出担忧的眼神。“只要单据上的数目相符，”哈莱维安慰他说：“那就没有关系。”里默尔用手指触摸着那张收据，显得好像对整个交易有些后悔。

显然，他对于只用一张小纸头来代表这笔交易感到不安。但是，对于索洛米尔而言，这钱等于还在他的篮子里放着，他用不着去考虑到别的什么地方、到陌生人中间去重打鼓另开张，并为今后的命运忧虑。多年来，他一直在电影院门口的台阶上卖面包圈。大家都认识他，他自己的事都是自己说了算。现在，这一切都要放弃了。他希望自己不会怀念那些台阶和他的面包圈生意。里默尔提起自己的篮子，瞅了索洛米尔一眼，就好像是第一次见到他似的。

"这全都是因为那次观光，"他咕哝着说。

在总工会组织的观光中，他们到了港口和卡梅尔山，并且从卡梅尔山上俯瞰了海法湾。他们从某个教派的墓地中穿过，到一个基布兹(以色列特有的一种农场——译者注)去吃饭。关于整个这次旅行，里默尔印象最深的是那座城市公墓。他从看到它的那一刻起便意识到，这正是他一直寻求的那个能减轻他的气喘病的所在。那里的空气是纯净的，周围是一片宁静的绿色。当他们的大轿车因遇到一列送葬的队伍而不得不停下来的时候，他们从车上下来，活动活动腿脚。里默尔乘机同公墓大门口的一名乞丐交谈了几句。他得知，在那里还是可以谋生的，尽管它远远赶不上特拉维夫公墓那么繁荣。它一天能办六七件丧事就相当不错了。人家告诉他，有时生意会清淡到只有一次纪念仪式、树立一个墓碑或者举行一次简单至极的葬礼——那种谁都很难挣到一个小钱的草草结束的葬礼。在登车返回的途中，里默尔不再像以前那样保守自己的秘密了。他向索洛米尔讲述了自己在一个唱诗班中担任男童歌手的往事。他忽然想到，他依旧可以在葬礼上利用他的歌喉。索洛米尔觉得他的想法蛮有道理，因为他以前曾在萨费德各墓地及其周围转悠过，为他的博物馆寻找稀有的砖石和墓碑，所以对这类事情相当熟悉。

里默尔站起身准备离开银行，同时把那收据装进了大衣口袋。放在那里的东西从来没丢过。他手中拎着一个轻多了的篮子，眼睛盯着出纳员把他的钱放进铁皮保险柜内。出纳员的手伸进保险柜，一直达到胳膊肘的部位。当我回到自己的桌旁时，里默尔望了我一眼，那眼神显得怪可怜的。

"一下子全都解决了，"他一边朝门口走去一边说。他把包钱用的那些棕色的包装纸留在了哈莱维的桌子上。哈莱维在清理桌子时，发现包装纸上写着字。每张纸上都有自己的标题："雪"、"肿胀的双腿"、"纳粹士兵"。索洛米尔俯过身，读出声来："砍柴人"、"绞死的男孩"。他把那些纸折起来，带回家去了。他的收藏家的眼睛立即识别出，这是适于放到他的博物馆中的物件。

索洛米尔也曾得到过德国支付的赔偿金，但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希娜·罗歇尔把那笔钱挥霍一空。后来，她离开了他。他一再告诫她别跟那些画家——他们全都是波希米亚人——搅在一起，可她偏不听；有一天还是跟他们当中的一个跑了。

"一个难弄的人，那家伙，"索洛米尔朝着里默尔走出去的那道门努努嘴说。里默尔原本并不想把他的钱投在股票上，而想暂时存到一个活期账户上，到他拿定主意该怎么办时再说。哈莱维担心他明天又会全部取出来。他觉得，里默尔把钱投到肯(纳德)·贝(伦森)协会的股票中对他是最有利的。他说事不宜迟，他将向那个面包圈小贩证明，怎样能使他的钱为他"效力"，而不是任其烂在篮子底，逐渐失去其价值。肯·贝协会的股票升值的前景极佳。根据哈莱维的预见，这个协会在以色列是大有前途的。他不由得对肯纳德·贝伦森顿生钦佩之意。这位布鲁克林青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回来并退伍之后，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建立起一个涵盖十多个国家的帝国。哈莱维

读了他的全部著作,希望成为肯纳德·贝伦森在以色列的代表。他关注着这位金融天才在向世界各大城市派出代理人之前给他们的指示。"问问他们,他们想不想发财?"哈莱维把拳头放到桌面上,引述那位天才的话说。间或有一位职员充满疑窦地抬眼望一望他。其中有一个人把他桌上的灯关掉,准备离开银行。当他从我们的桌旁经过时,哈莱维向他表示了祝贺,因为特拉维夫股票交易所的金融公报上提到了他的名字。总有一天,巴鲁奇·阿纳钦的大名——他向那人保证说——会家喻户晓。

巴鲁奇·阿纳钦曾是哈莱维试验关于如何唤起人们的发财雄心的贝氏理论的第一个对象。一天早上,在银行尚未开门之际,阿纳钦走到哈莱维面前,问他是否知道是谁弄断了他桌上那株盆栽仙人掌。哈莱维不喜欢在自己全神贯注地研究头一天的股市行情时有人来打搅他。他从来不能无动于衷地阅读行情。每当他掀过公报的一页时,他的眼睛总是因担心而瞪得老大。他常说,股票交易所内的风云变幻就是他赖以生存的面包和黄油,是为他的生活增加趣味的精神食粮。他在浏览金融消息时,有时会咯咯发笑,有时会抓挠肚皮,有时会擤鼻涕、咬嘴唇、鼓双颊、拍秃脑袋或者用拳头砸桌子,把电话都震得丁当作响。他已如此深陷其中,以致他的喜爱、厌恶与失望,他的一颦一笑,他的猜疑与释怀,都与股票联系在一起。他了解它们各自的特点;他知道哪些股这一整年都升不起来,就像困在角落里难得发出吱吱叫声的老鼠;他知道哪些股是根本没有准星的,它们总是跟在另一些股的后头,人家升,它们也升,人家降,它们也降;他还知道哪些股则左右局面、兴风作浪,使交易所的气氛充满狂热的悬念。哈莱维对每种股的历史、它们所起的作用以及它们今后的走势全都了如指掌。即便是市场上最不重要的股票,他所了解的情况也远远多于他对共事多年的巴鲁奇·阿纳钦的了解。他

只知道阿纳钦所专注的是枯燥的计算；知道他不先用一个手指把他桌上那盆小仙人掌上的细刺摸一遍是不能安下心来开始这一天的工作的；知道他即便在最冷的早上也要洗一个冷水浴；知道他是个大棋迷、每天读三份报纸、每周看两次演出——其中有一次是与他妻子一起去看。

阿纳钦神情绝望地站在哈莱维面前，双手捧着的三段小小的仙人掌残株在少量的泥土中滚动着。这位上年纪的职员站在那里，好像在一大清早除了哀叹他那被人掐断的仙人掌和不让别人工作之外，再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似的，这情景看了真让人痛心。哈莱维拉开一只抽屉，然后又拉开另一只，让阿纳钦亲眼看看，我们两个人都有多少未完成的事情要做，看看我们的抽屉里塞了多少未答复的信件、多少未偿清的政府债券、多少债权利息票。

在晚上临下班之前，哈莱维常常会与我约定次日来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那几个抽屉，把积攒下来的单据、信件之类清理掉一些。每每是我们次日来后就拉开一只抽屉，把那些纸头摆弄一通，又塞回原处。我们会把一些信件的头一行浏览一下，或者把一摞没剪开的利息票扫一眼。然后，不必再说一句话，哈莱维就会决定把这一切推到翌日，把抽屉关上。这时，他会搓着双手，把全部注意力投入到阅读当天的金融公报中。他有时会在桌子下面把两条腿伸出老远，探身去抓电话的听筒，就好像有一部电话在他脑袋里丁零作响似的。

过了好一会儿，哈莱维才听明白阿纳钦说的是什么。阿纳钦在走到哈莱维身边之前，已经问过其他职员是否知道是谁掐断了他的仙人掌了。哈莱维对于有人打扰他真是非常恼火，便站起来准备训斥他。就在这当儿，他弯下身看了看阿纳钦的一双大手。那手在颤抖着，就好像手中捧的是什么活蹦乱跳的东

西。他把那几段仙人掌插到土里，开始讲起有关这种植物善于扎根和重新获得生命力的特性的大道理来。“巴鲁奇·阿纳钦，你想不想成为一个阔佬?”这时，两人就像有默契似的，同时面对面地坐了下来，各自都不掩饰自己的微笑，似乎他们早就在期待这个时刻的到来了。这是哈莱维第一次教导别人如何在股票交易所做交易。

“要有雄心，老兄!”他大声地说:“要有雄心!”

索洛米尔为阿纳钦拖过来另一把椅子，因为他急切地想要知道金融公报怎么会提到他的名字。他本人也曾在一家报纸上发表过一点东西(那是一篇纪念一位儿时的朋友的文章)，文章的写作风格还受到了好评。阿纳钦没有坐下来，而是不停地来回走动，往烟斗里装着烟丝。他那剃得精光的脑袋闪闪发亮，脸上也看不到一根胡须。

阿纳钦的名字出现在特拉维夫股票交易所举办的一次竞赛的获胜者名单中。参赛者要预测出市场上的哪些股票在一年之内带来的红利最多。由哈莱维发起这次竞赛的目的在于提高该股票交易所的声望，使人们对参加它的交易发生更大的兴趣。通过这种竞赛鼓励学生和没有资金的人试着向股票市场投资——目前只是试验性的。阿纳钦打算把他退休时可以拿到的人寿保险金投到实实在在的股票中去。不过，眼下他的买卖和“收入”账目都还是纸上谈兵。尽管他生活在以后会成富翁的希望之中，他的行为举止却往往显得像是已经发了大财，摆出一副了不起的架势，傲慢地用眼角的余光看人。此时，阿纳钦一边吸着烟斗，一边美滋滋地接受着哈莱维对他的成就的恭维。

我到这家银行工作的头一天，巴鲁奇·阿纳钦就测试了我的水平。他交给我一页写满数字的纸，简单地给我讲了一下该如何操作加法机。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那东西怎么用，因此，

我敲了几个键、转了几次把手后，机器就塞住了。我坐在那里呆了好一会儿，想找一个友善的面孔以便求援。就在这时，哈莱维要我为他打一封信，而阿纳钦却对他说，我以前是个基布兹庄员，当然不知道会计是干什么的。阿纳钦对我的过去已经有了一些了解，因为我俩曾在这个世界上比邻而居——他住在新加坡，我住在澳大利亚。我们甚至还有一位共同的熟人，即戴维·斯塔福德爵士，此人在新加坡政府中当过部长。我为查明战争期间驻在新加坡的一些犹太军人的下落而同此人打过一些交道，阿纳钦以前则与他到同一座教堂做礼拜。我们这位共同的熟人使得我俩比较熟络一些。因此，第二天早上，当我在去上班的公共汽车上看到膝头上展放着一张报纸的阿纳钦时，我对我俩又成了邻居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在向司机付车费之前，朝他点了点头，指了指他身旁的空座。阿纳钦却不理会我的致意。只见他把报纸拿起来，挡住了脸。我背朝着他从他身旁走过去，在较远的地方找到了另一个座位。后来，阿纳钦和我就习惯于在汽车上彼此视而不见，而只是到了银行才打招呼了。有时我先向他道一句“早上好”，有时他先向我问好，同时抬一下他的帽子——在夏季是一顶草帽，到冬天则是一顶十七世纪的荷兰人所戴的那种皮帽子。荷兰是股票交易所的摇篮，他对那个国家作过一番研究。他家中的一整面墙上挂着一幅年代久远的阿姆斯特丹地图。

到这时，银行里的灯大部分都关上了。出纳也已经回家了。阿纳钦拿出一张写满数字的纸——那是他从当天的股票交易中得到的“收入”——不无骄傲地说，用不了多久，他就能挣到第一个一百万了。

“但是，你从来不往肯·贝协会的股票中投资，”哈莱维有些不满地说。他估计，该协会的股票很快就会成为世界各地股市

上的抢手货。阿纳钦悠闲地喷出一口烟，然后说，他很谨慎，竭力避开任何可能在他开始用自己的钱进行股票交易的时候就破坏他的成功机会的东西。

起初，阿纳钦只是盲目地按照哈莱维的指点去做——尽管这样做的不止他一个人。例如，有一位头发剪得像个男孩似的年轻女士就不止一次告诉哈莱维，她绝对地信任他，分毫不差地跟他学——他买进，她就买进；他卖出，她也卖出。哈莱维听她这样说，立即用手拍拍自己的秃头，连白眼球都好像增大了。有一次，他问她，她是否把他当成了应当盲目追随的摩西。他说，当年摩西曾带领他的人民走向希望之乡，而他只是带领他的客户走进特拉维夫股票交易所。不过，这类说法总还是会产生影响的。正因为如此，当阿纳钦开始表现出独立的态度、在股票市场的交易中自作主张的时候，他对他很是不满。

阿纳钦根本不把肯纳德·贝伦森放在眼里。他觉得此人不够可靠。不错，他具有创业精神，足智多谋，精力充沛，建立起了一个广阔的帝国。但在阿纳钦看来，他的未来仍属未定之天。另外，阿纳钦对于他在报纸上读到的有关肯纳德·贝伦森的浪荡生活的描述也很反感，那简直像一个纨绔王子。他清楚地知道这样一个事实：肯纳德·贝伦森住在瑞士，整日价被年轻的美女和纯种的赛马所围绕，但许多人却把他当成一位在世界各地传播福音、宣传他的主张和推广他的股份的弥赛亚（犹太人盼望的复国救主——译者注）式的人物。阿纳钦年轻时也在国外——在巴黎——侨居过，不过他在那里玩的是象棋。

阿纳钦走到桌边停了下来，俯过身去，先对着哈莱维的脸瞅了一眼，然后又盯着索洛米尔的脸看了一下，随后问，他说得不对吗？不等那两位回答，他就急匆匆地走出了银行。家里还有好多事等着他做哩。他坚持记日记，把自己当天交易的每一种

股都记录下来，连最细小的变化也不放过，并通过许多图表来显示它们的走势。哈莱维浏览过他的一本日记，并说，如果阿纳钦能持之以恒，记上二十年左右，他肯定能出版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

到这时，屋内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了。阿纳钦走后，整个大厅立即笼罩在一片寂静之中。屋外敲打着窗户的雨声也变得清晰可闻了。是该下班的时候了。在回家之前，哈莱维还想到禽肉店去买只鸡，留到星期六吃，另外还要到医院去看望一位生病的客户。但我们当时正在等待有钱的丽达·奥拉米的到来。她以前只到我们银行来过一次，此番她托索洛米尔捎话来，说她这天要背着她丈夫到这里来买肯·贝协会的股票。正因为如此，索洛米尔没有同里默尔一起离开，而是留了下来。

据索洛米尔说，奥拉米夫妇是舍弃了在特拉维夫的豪宅而搬到老人院大院里的私人小屋来的。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戴维·奥拉米染疾在身。戴维·奥拉米原先是个建筑承包商，与他的儿子们合伙经营多年。到他六十岁的时候，他觉得这种苦活已经干够了，便把公司交给了儿子们，自己好潜心学习《圣经》。奥拉米小时候家里很穷，来以色列后日子过得不错。在为物质的东西辛勤奋斗了一辈子之后，如今是把思想转向精神方面的时候了。但他却消沉起来，学习的兴趣已经荡然无存，除了连续几小时地在摇椅中晃来晃去之外，也不想为自己做任何事情。要让他去散散步、去理个发或去商店买一件新衬衫，都得别人硬拉着他去才行。他的眼神中流露出的忧伤似乎暗示着他在思索深藏在他那纷乱的精神之中的各种想法。他的忧郁症状早就有了，只是没有引起重视而已。例如，他曾多日在城市公园中闲逛，找人同他聊天；他会写支票给任何愿意坐到他身边听他讲话的人。到他的儿子们发现他们的父亲在以这种方式大洒金钱的

时候，他已不再缺少倾听他的心声的听众了。他开支票的权利被取消了，儿子们还雇了一位护士每天陪伴他几个小时。但是，当他对她萌生了爱意的时候，儿子们便只好把她解雇而把他送去看心理医生了。心理医生建议他出国旅行一趟，于是，奥拉米一家便很快起程去了意大利。在帕多瓦停留期间，丽达·奥拉米想起她丈夫的一位表妹曾在那座城市住过，而且后来死在那里。于是，他们便去凭吊了她的坟墓。就是在那个时候，丽达·奥拉米第一次从她丈夫身上感觉到一丝重新燃起的兴趣，那是围绕着修整表妹的墓前已毁损的墓碑而产生的兴趣。他们在帕多瓦多呆了几天，给那墓地拍了几张照片，以便让族人看看坟墓修整前后都是什么样。儿子们看到一位表亲的坟墓帮助驱散了父亲的忧郁，便到国外四处寻找许多其他亲戚的墓地，于是，奥拉米一家再次去了欧洲。这一次，戴维·奥拉米带着人生的新目的回来了——他要致力于修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毁的犹太人坟场中的那些墓碑。

"她来了，"索洛米尔指着哈莱维身后的窗户说。丽达·奥拉米正从那扇窗户往里面张望。为了看得更清楚些，她用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擦去窗户上的雾气。哈莱维边走过去为她开门边说，如果她真的是来购买肯·贝协会的股票的，那他就可以把这一天视为银行的幸运日了——先是里默尔，现在又是她。但是索洛米尔并没有向他打包票说丽达·奥拉米到这里来就一定能做成交易。

索洛米尔起初不想与奥拉米一家沾边。那位丈夫的忧郁症使他害怕，因为他认为这种病的传染性是极强的。他自己的妻子希娜·罗歇尔就患过此病，常常一个人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一连好几天都没有一点声响。那些日子真叫人不开心，因为他自己好像也受到她的传染，整日郁郁寡欢。还有他在萨费德的那

位芳邻。乍一看，他还以为他是个花花公子呢——擦得铮亮的皮鞋、染过的胡须、鲜艳的领带——可他的内心深处却充塞着漆黑的愁云。他几乎每天早上都要走近站在自家台阶上的索洛米尔，警告他说，世界就要毁灭了，今天比昨天更糟。索洛米尔老是躲着他，就像躲避所有染上这种病的人。如果毁坏的坟墓是治疗戴维·奥拉米的忧郁症的惟一药方，他想，那他一定病得不轻。

丽达·奥拉米把撑着的雨伞放在门旁，解开她的毛皮大衣的扣子。她先环顾一下这间空旷半黑的大厅，确信屋内没有其他职员、关于她将要做的事情——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赚好多好多钱——一个字也不会透露给她的儿子们和她的丈夫之后，才在哈莱维对面坐下来。她想多挣些钱来供她丈夫做他新近迷上的事情。她从手袋里拿出一本相册，让哈莱维翻看。相册里面镶的是他们在最近这次旅行期间拍的大部分照片，这样她就免得再作不必要的解释了。哈莱维掀开绒布封面，看了第一页，然后慢慢地翻到下一页，后来就越翻越快了。看到最后，他又从头浏览了一遍，怕自己漏掉了什么。然后，他合上了相册。“除了墓碑还是墓碑，”他把头靠在椅背上评论说。接着，他在桌子下面把两腿伸直，斜过身子，双手交叉放在他那便便大腹上，把目光停在丽达的脸上。那张脸有点长，凹陷的双颊投下了一抹阴影。她的白发微带一点蓝色。

丽达边收好相册边说，奥拉米做的事情在东欧裔镇民协会中传开了。他们纷纷拿着地址来找他，请他察看分布在各地村镇的近亲的墓穴，必要时还要帮助修葺。尽管他们为修坟出过钱，但这些钱远远不够用。不过，她的丈夫继续着他的工作，以为这些年来他挣下的钱用来完成他担负的这项使命是绰绰有余的。他把这项工作视为自己的天职，像当年创立家业那样劲头

十足地寻找着他的同胞们的已故亲属的墓穴。活着的人令他厌烦，但他对搜集死人的情况却是不厌其烦，连一点点线索也不肯放过。丽达·奥拉米又一次打开相册，指着头两帧照片给我们看。一帧照的是那位表妹的坟墓修整前的样子，另一帧是修整后的样子。事实上，她说，那位表妹在她的家人中就好像又活过来了一样。过去的这些年中，有谁想过哪怕是提一提她的名字吗？而今，他们回忆起了她那暴烈的性格，她那惊险的罗曼史，她与人私奔到意大利的往事以及她同一个非犹太人——那人是个共产党，还是个酒鬼——在一起的动荡生活。她的一些信件也被找到了，人们对她那笔漂亮字赞不绝口。奥拉米甚至随身带着某个亲戚寄来的那位表妹的一张照片。看来，他年轻时曾热恋过她，现在还常常想起她。这时，哈莱维又看了一眼那位表妹的坟墓的照片。但是，丽达·奥拉米生气地说，那个女人不过是个荡妇而已，有啥好看的。说罢她便把相册往后翻了好几页，让我们看他们家族的拉比(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和主持宗教仪式的人员——译者注)的墓穴。那位拉比的名字翻译过来叫做摩西·戴维·韦尔特曼，与她丈夫同名。这位拉比，她说，当时被看作天才——是他那一代人中伟大的精神领袖。从最近发现的他的著作手稿中，以及从老人们对他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他曾想做一件办不到的事情：在他有生之年，使弥赛亚降临人间。年纪并没有减少他的雄风，因为他一生结过四次婚，而且，在他于耄耋之年撒手归西之前，他还要他的妻子——一个年轻的孤女——庄严地发誓终生为他守寡，因为他不能容忍任何别的人与她共行鱼水之欢。

“我尊敬的夫人，”哈莱维打断了丽达的话头。在他看来，她这么富有，有一个有进取心的丈夫，每年出国旅行好几次，这都应当感谢幸运之星的眷顾。一个人一辈子能有这么好的运气，

夫复何求！

“可我不是罗特希尔德(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著名豪富家族，主要经营银行业——译者注)啊！”她摆出一副苦相说。那些旅行把他们的钱花掉了很大一部分！起初，她以为出去个两三次也就够了，指望她丈夫最终会对整天在荒芜的坟场里乱转感到厌烦，改而为自己寻找某种省钱的嗜好。他这种心血来潮的怪念头也太奢侈了，真让她无法忍受。他们挣下这些钱可不是为了挥霍在欧洲的坟场里的！难道那里的犹太人不曾被弄得一无所有吗？当着她丈夫的面，人们对他赞扬备至，但背地里他们却尽情地取笑他。他放弃了一个那么兴旺的公司，这已经够傻的了；如今他又把大笔钱财投到一个死人的世界中，使自己成了一个虔诚的傻瓜！她本人是非常想搬回特拉维夫的房子里去的。那座房子曾经是那样地门庭若市，他们几乎从不独自进餐，以色列和外国的显贵在那里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但是，她丈夫对人间的欢乐已经没有兴趣了。他每次旅行回来，立即开始计划下一次旅行。他现在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出版拉比的著述和举办讲座上。不久，他就要去给那些住在老人院的人讲课。但是，丽达·奥拉米说，那里会有谁来听他讲这些东西呢？他要是讲讲怎么能赚更多的钱，那就不愁没有听众了。

“这个肯纳德·贝伦森是何许人？”她突然改变话题，这样问道。还在她丈夫患病之前，在特拉维夫的一些宴会上，人们就不时提到这个名字。但当时，她丈夫挣钱很多，他们生活得很阔绰，所以她也就没太在意。现在得由她来操心所有那些出国旅行的花费了。她从手袋里掏出几叠钞票，又把相册装了回去。数完钱后，索洛米尔表示要送她回家。哈莱维把他们送到门口，丽达·奥拉米又一次提醒他不要向任何人谈及这笔交易，尤其不能对她丈夫说起。

“他打算到老人院去讲些什么?”我听到哈莱维问了她这样一句。他回到自己的桌子前,显得很得意。那些钱被放进我俩写字桌旁的一个小一些的保险柜内。我们也没有再多耽搁,最后检查了一下是否一切都锁好,把所有的灯都关上——只留了铁皮保险柜上方的那一盏。在往门口走去的时候,我问哈莱维,奥拉米要讲的内容是什么。“有关在欧洲的犹太人坟墓的事,”他回答说,然后又要我提醒他,明早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用丽达·奥拉米存的钱订购肯·贝协会的股票。

就在我们要离开的当儿,女清洁工来了。她又把所有的灯开亮,走进衣帽间换上了工作服。

外面,雨还在哗哗地下,雨丝在窗内射出的灯光的映照下闪闪发亮。劲风裹着骤雨吹打在我们的脸上。那禽肉店在一条离主要街道有些距离的一条小路上。店主是我们的客户,他的东西卖得比任何别的店都便宜。哈莱维的薪水很少,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在读大学,妻子达妮埃拉一个钱也不挣,供养这样一家人该有多么不容易啊。所以,他们对哈莱维每个月底拿回家来的那几个钱总是精打细算。他妻子倒没有因为他挣钱太少而埋怨他,尽管她有一次曾话里有话地说,她真不明白,为什么哈莱维总是为别人赚钱,却从不考虑为自己挣点。她一直对此感到困惑不解,最后决定不再依靠她的丈夫,自己来想办法。她开始购买政府长期债券。这种债券有机会在每年举办三次的抽奖中赢大钱。每次抽奖的翌日,她都会出现在银行里,看看她的债券中有没有哪一张中了大奖。她穿的衣服颜色都很暗淡,她的头发紧紧地拢在脑后,梳成一个圆髻,使她那一脸菜色更加显眼。

“她老是做着这种美梦,”哈莱维有一次对我说,对她如此相信宿命流露出一丝不屑的微笑。另一方面,他自己却坚信纯粹

的必然，坚信现实的东西。例如，金融奇才肯纳德·贝伦森对于他就是一个活样板。他曾给他写过一封信，询问报上说他即将访问以色列的消息是否属实。而且，他还指出，以色列所需要的和正在等待的正是像他这样的一个人——这是暗指他的犹太人身份——因此这里的人将会张开双臂欢迎他。哈莱维对我说，如果肯纳德·贝伦森真的打算来访，他要与他谈谈他的协会在以色列设代表处的问题，并借机向他暗示他自己愿意充当他的代表。他将向贝伦森介绍迄今他为宣传贝伦森的主张和推广贝伦森的股份所做的一切。

“他们会付给你美元，”他边说边绕开小路上的一个水坑。他估计，这样一个职位的薪水总有他现在挣的四倍那么多。到那时，他就可以觉得自己混得像个人样儿了，与他刚进以色列银行时被分派去在警卫的警惕目光下把一捆捆残破钞票放进火炉里烧掉的时候相比，那就有天壤之别了。在自己挣的钱还不够养活自己的时候，却要把那么多钱烧掉，实在于心不忍。倘若他能得到肯·贝协会代表的职位，他的妻子达妮埃拉也会轻松一些了。他要带她出国旅游。他会对她说：“别再做那些傻梦了。”

禽肉店夹在一些破旧的小平房中间。进屋后，我们抖掉帽子上的雨水。哈莱维把他的塑料篮子搁在地上，把风衣的领子放低。那领子的边缘已经被磨破了。他对我说过，他得到那个职位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买一件新风衣。

一些宰好的鸡挂在墙上的一排钩子上，从冰箱的玻璃门内还可以看到更多的白条鸡放在里面。那冰箱的边缘长满了白霜，像雪花一样闪烁。一位头戴编织围巾，身穿棕色带花、下摆肥大的连衣裙的妇人站在柜台前，把手指伸进一只鸡的肚子里来回摸着。肉店老板穿着沾满血迹的围裙，向我们打过招呼，等待那位女顾客拿定主意。“行了吧，太太？”他催促着说。可那女

人却不理睬他的催促，执意要他从钩子上再拿几只鸡下来，然后又从冰箱里拿出一两只，而且把每一只都捏掐挤压了一通。肉店老板——名字叫平沙西克——朝我们苦笑了一下，示意我们耐心一些，等他把那位顾客打发好。他称哈莱维为"银行先生"。他有很长时间没到我们银行来了，所以忘了他的名字。

"老婆又回到我身边来了，"他告诉我们。

说起来，他之所以成为我们银行的客户，还与他的妻子有关。她离开他后，他到我们银行来询问如何进行股票交易。他打算用他的钱买股票，哪怕会因此赔掉一些钱，因为他觉得，一旦他老婆听说他要把他们的钱财全都输光，她就会改变主意，回到他身边。起初，哈莱维把他的钱投到肯·贝协会的股票中。但是，正当这种股票升值的当儿，平沙西克却让他把这些股票抛掉，把钱全部投到投机股票中。后来他的股票又升了值，收益翻了一倍，可他一点也不高兴。他说，他根本不想让他的老婆满意。他所希望的只是让他的老婆回来帮他打理生意！于是，哈莱维就把他的全部资本投到了那些连能否在市场上生存下去都成问题的股票中。尽管这种股票的收益率很高，但它们大概连印制股票的纸张钱都不值。他警告平沙西克说，这样做风险太大了；虽说这种股票可能靠镍、石油和黄金发大财，但它们最终也有可能变成一堆废纸。可就连这种股票也急剧地升了值。平沙西克灰心了。他把所有股票套了现，从此不再到我们银行来了。

平沙西克又从钩子上取下几只鸡来。那女人把它们全都扒拉了一通，觉得都不称心。"他卖的鸡全都是从集中营里弄来的，"她一面评论着一边蹒跚地朝门口走去。等她已经走到门旁时，店主朝她喊了一句："太太，你想要肥些的吗？从你自己的屁股上割一块吧！"刹那间，那女人看起来真像一只没有拔过毛的

棕色母鸡。

她的名字叫格拉·明茨，也是我们的一位客户。她的丈夫是个瘦高个，喉结突出得吓人。他们共同购买了肯·贝协会的股票，但规定，任何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无权卖出或提取。她不信任她丈夫，因为他常在外面寻花问柳。她担心他会把钱全都花在他的新姘头身上。

平沙西克把那些鸡从柜台上拿走，把哈莱维选中的那只鸡放在酒精炉的火上烧焦没拔净的微微发蓝的毛根。他一手抓着鸡头，一手抓着鸡腿，把整只鸡扯直，边烤边同我们说话。他告诉我们，他和他妻子已和好如初，现在想干点事情。人家往股票交易所投资就可以轻易赚钱，过好日子，他们干嘛还要这么辛苦地经营这个禽肉店，整天跟宰杀的鸡只和肥胖的家庭妇女打交道呢？他们要把这爿小店关掉，开始轻松的生活。他把鸡头窝到鸡腿内侧，又抓上一些灰不溜丢的鸡杂碎，用一张报纸包了起来。

“人们还在股票市场上赌博吗？”他问。听说一度毫不费力地为他赚了些钱的那些股票已经跌破了底，他感到很遗憾。他想，幸好当时把它们抛出去了。他听说过肯纳德·贝伦森的事，而且——在围裙的前襟上擦了擦他那油渍渍的手指之后——说他过两天就带钱到我们银行来。他长着一张圆圆的脸，皮肤油光闪亮，就好像也在酒精炉上烤过似的。

外面还在下雨。路边的排水沟积满了雨水，我们大步迈过去，来到人行道上。哈莱维要我留意一下，如果平沙西克和他妻子到银行来，而他当时又不得闲，没法亲自招呼他们，那就由我来用他们的钱购买肯·贝协会的股票。我们卖出去的股票越多，他当肯·贝协会驻以色列代理的机会就越大。他已经对以色列银行的主要分行的一位董事谈起过这件事，人家答应决不作梗。

银行同意放他几年，因为有一个自己的人为肯·贝协会工作，对他们也是有利的。

这时，响起了一阵铃声。卖煤油的雅可夫·诺德尔驾着一辆马车走过。他高高地坐在帆布遮篷里面的一个箱子上，那遮篷已经破了一个角，忽闪忽闪地飘着。他向前俯着身子，借着街灯那昏暗的亮光，望了我们一眼，在不停摇着的铃声中朝我们说了句什么，但我们连一个字也没听清。

头年夏天，索洛米尔曾带着雅可夫·诺德尔到我们银行来购买肯·贝协会的股票。尽管诺德尔在夏季只干卖水果和蔬菜的买卖，但他身上那股煤油味即使在夏天也挥之不去。他坐在哈莱维的对面，挨个口袋摸索，终于掏出一张一百美元的大票。他说这是他惟一看得起的钞票，而且，尽管他既不会念、也不会写那钞票背面的字，但他知道那些字是什么意思。那上面写的是：美国政府保证向持有这张钞票的人支付相同数额的黄金。当有人对他说，美国政府早就收回了这一承诺时，他说什么也不相信，坚持说美国不像俄国，华盛顿说话是算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俄国做马匹交易，他是大老远把这张钞票带到这里来的。如今它已经磨得很薄，有些地方都透亮了。

给诺德尔当助手的那个阿拉伯人跟在车后头，从桶里往外舀煤油。他浑身湿透，赤脚穿着一双薄木屐，在骤雨中蹒跚而行，为街两侧的居民送煤油。他认出了我们，竭力盖过那铃铛与那三个和着马车后轮的滚动声丁东作响的煤油罐，高声向我们打招呼。

“你好，哈莱维先生！”

“你好，纳阿拉尼先生！”

“怎么样啊？”他们两人同时喊出这句话，又先后作了回答：

“我是说银行！”

"我是说煤油!"

艾哈迈德·纳阿拉尼跟在车后头,他的脑袋就像前面那匹马的头一样,忽隐忽现。

他每个月都到银行来领一次工资,那是由雅可夫·诺德尔开出的油迹斑斑的、以三个"x"代替签名的支票。他第一次来兑支票时,出纳因无法辨认沾满油渍的支票上的字迹而拒付,是哈莱维出面帮了他的忙。他把他领到自己桌前,打开灯,对着亮把支票仔细检视了一番。在把诺德尔老婆写在上面的字辨认清楚之后,他让出纳把钱付给了纳阿拉尼。

纳阿拉尼拿到钱后,走到一个角落,像东方人那样蹲下来,把钱数了一遍又一遍。大概过了一个小时,也许还不止一个小时,哈莱维趁着没有客户的当儿走到他跟前,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不是,没有什么不对头,只是当时纳阿拉尼不知道支票是什么东西,也不明白银行何以会知道他的老板给他的一个月工钱的确切数目。瘦骨嶙峋的他,鼻子底下长着细细的胡须。他的裤子太短,赤裸的双脚被冻得发紫。他站起来,把一张半镑的票子塞到哈莱维手里。哈莱维把他领到门口,把钱还给了他。到了下一个月,纳阿拉尼拿着油渍渍的支票来时,便径直去找哈莱维。哈莱维用他工资的十分之一给他开了一个账户,以便他能存下一点钱,到时候好买肯·贝协会的股票。从那以后,每当纳阿拉尼拿着支票,虽说已有些熟稔但仍不无扭捏地坐下来的时候,哈莱维都会拍拍他的后背,像唱重复歌词似地说一句:"祝你发财。"然后,两人又用阿拉伯语大声说:"Akun ghani!"

突然刮起的一阵风暂时把雨吹跑了。一片乌云散开,露出一颗闪亮的星星。街角处诺德尔马车的铃声依稀可闻。哈莱维想说什么,但欲言又止,化做一种似乎从胸腔发出的咕哝声。我

们默默地向前走。此时我对哈莱维高兴时与不高兴时的种种怪癖以及当我走在他身边听他谈论他未来的计划时他的情绪变化都已习以为常了。

多亏了他，我才能留在银行里工作。我在基布兹农场的多年经历是使哈莱维对我产生好感的原因之一。他说过，要帮助他在民众中传播股市为什么存在的思想、引起人们从事股票交易的更大兴趣，就需要有基布兹成员那种开拓精神。他说，特拉维夫股票交易所仍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是他最先点拨我了解这一交易的秘密，是他教会我如何区分什么是有息票的债券，什么是无息票的债券。他对债券的性质作过一些研究，发现它们显示了国家心态与经济局势。他还告诉我不同政府促使本国人民购买债券的办法。我常常在没有客户的时候，花大量的时间同那些被迫购买国债的人联系。那些人的债券都存放在我们两人桌子之间的铁皮保险柜内。过了这么多年，有些持券人已经移居国外，有些人已经不在人世了。哈莱维有一次参加一位客户的丧礼时，给我指看过一些墓碑上的名字，那都是锁在我们保险柜内的那些无人认领的债券的持有者。如果有地址，我会给那个死去的人发一份通知，要他给银行打电话，取走政府早已归还的债款。由于不知道他们的合法继承人是谁，我就把信寄给“已故的某某先生或某某夫人”。在我到银行工作的头一天，哈莱维就让我用打字机替他打过一封致郊区的某街某号的“已故伊扎克·巴尼先生”、大意如上的信。后来，这种信的内容我都烂熟在胸了。收信人全都被要求尽早前来领取他们早已到期的债券的本息，那是 1948 年发行的利率为百分之三点四一的战争国债。

我们转到了主要大街上，那里有许多店铺，沿街的房子都有为人行道挡雨的遮篷。再往前走几步就是一个公共汽车站，乘

那路车可以到医院去。我们常用休息时间到医院探视客户，同他们讨论与股票交易所有关的问题。有一次，哈莱维把我带到一位有钱的客户家里。那位富翁看来命不久矣。他的儿子们要哈莱维介绍一下他的财务状况，以便使他开心一些。许多亲友都聚集在一间宽敞的客厅内，那位爸爸斜躺在活动床上被推了进来。他脸色蜡黄，双颊深陷，眼神呆滞。长子大声向他通报来宾的姓名，然后停了一会儿，让病人喘口气。他刚刚像睡梦中哭泣的人那样轻叹一声，那儿子便向他俯过身去，然后向我们转达了他父亲讲的话：他很抱歉不得不在这种状态下接待客人，请我们大家不必客气。客厅的家具非常讲究，每一个物件都很引人注目。在那架敞着盖的大钢琴旁边，铜制的烛台上立着一只粗大的蜡烛，俨如一根金色发光的柱子。一幅长长的日本挂毯盖满了整个墙壁，那上面绣的是森林、大海和远处的地平线。在挂毯的对面，透过敞开的窗户，可以看到一片开阔的草地。那草地一直绵延至一片矮树林，从那里又延伸到天际。在靠近树冠的地方，可以看见大海。一辆载着一些大账簿的小台车被推进客厅。那长子打开一本账簿的封面，让大家看看里面用细绳穿在一起的厚厚的纸页，那绳子打成了一个结。他对众人说，这些纸页是他父亲多年来亲手清清楚楚写下的他所购买的所有股票和股份的演变情况，得了多少红利、每年的分红和利润有多少。直到最近，他躺在病床上，依然每天花费好几个小时作记录。那儿子高举着打开的账簿，一会儿转向左边，一会儿转向右边，让所有人都能看见那划得笔直的线条、那用不同颜色区分的栏目和那工整的数字。他赞扬父亲惊人的记忆力，说他年轻时在汉堡就显示出了非凡的商业才能。那时他已经相当有钱了，但所有钱财都被希特勒抄了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他带着幸免被抄的几颗钻石，逃离了德国，然后又经由中国到了以色列。

在这里，他重新成了自己财产的主人，而且又创立了新的家业。那长子把账簿放回小台车内，说还有十本这种由他父亲亲笔做的记录放在他书房的玻璃橱柜内，任何想用它们来做研究的人尽可以使用。在这本账簿的封面上，用很大的粗体字母写着这样一个名字：维利·阿夫尼—施泰纳。

维利·阿夫尼—施泰纳身体还好的时候，有时会到银行来看我们。即便是对最不起眼的职员，他也表现出最高的敬意。他个子很高，腰部微弯，但那与其说表明他卑躬屈膝，不如说表明他的仁厚和蔼。他总是微笑不语。有一次，他在等候哈莱维为他办理手续的时候，坐在我旁边问起我的近况。他的关心使我受宠若惊，便向他讲起我早些时候在报纸上读到的一则消息：有人在谈论同阿拉伯人媾和的问题，这使人产生了股票升值的希望。

“太晚了！”他回答说，但他没有说明这是指同阿拉伯人媾和太晚了，还是指进某些股票太晚了，抑或是两者兼指。

维利·阿夫尼—施泰纳缓缓地由一侧向另一侧移动着身子。一条瘦得皮包骨的腿从被单下面伸了出来，睡衣在大腿处被揉成一团。他抬起一只肩膀，非常缓慢地转动脑袋，用那双依然呆滞的眼睛环视了一下房间。“哈莱维先生，我的股票怎样了？”他用沙哑的声音问。

在场的人似乎松了口气。他们请哈莱维来，就是为了能唤起这样一种反应。人们希望哈莱维的到场能刺激他说点什么，从而摆脱他这些天来所陷入的深度沮丧。在此之前，连医生都表示没有办法了，听天由命吧。此刻，这位老人那浑浊的眼睛里确实闪现出了生命的火花，于是，他的长子便拉着哈莱维的手臂，把他带到床前，使他能同他的父亲说几句话。客厅里其他的人——总共有十二三个人——也小声地表示着赞同之意，意思

是让哈莱维与老者交谈。不过,哈莱维根本用不着别人鼓励,因为他这个人一谈起股票劲头就来了。他俯下身来,像前面那位长子所做的那样,尽力寻找一个聚焦点。然后,他在靠近老者耳朵的地方停了下来,大声说道:“非常好!非常好!”

阿夫尼一施泰纳全身抖动了一下,脑袋又落到枕头上。哈莱维显得很高兴。他回到自己的扶手椅前,很舒服地坐了进去,开始呷起先前人家为他斟好的咖啡。他轻轻地拂了一下嘴唇,抹掉可能挂在上面的干酪渣,然后向周遭都鞠了一躬,对众人向他投来的感激目光表示答谢之意。那位长子走到床前,看到父亲已经入睡,于是便示意将活动床推出客厅。那辆小台车也被推走了。这时,其他的人便开始喝咖啡,吃点心,换位置,三三两两地围在一起。正当他们压低声音谈论着某人出国旅游、汉堡的一家饭店、在国外购买的某些物品的价格以及某种特别的糕点的配方的时候,那长子回来宣布:他父亲已经与世长辞了。

在七日丧期时,我们收到了那家人的一封信,他们高度赞扬了哈莱维,并表示了全家人对他的到来所怀有的感激之情。那封信的副本也被寄给了我们银行在特拉维夫的主要分行。信中还概述了他们的父亲的为人,谈到他怎样把家族中尚在的人聚拢到以色列,使他们团结在一起,并确保他们能有光明的未来。上天赐给他众多的孙辈和重孙,但是,眼见父亲陷入绝望,在深度的沮丧之中度过生命的最后时日,儿女们悲痛万分。然而,哈莱维的到来重新点燃了他多年来对股票交易所的兴趣,使他消沉的情绪得以振奋。他们的父亲在弥留之际、在即将进入极乐世界的时候,听到的是哈莱维的兴奋的话语“非常好!非常好”!这使全家人都感到莫大的欣慰。

在车站上,一些人聚在一个锡铁屋檐下等候去医院的公共汽车。当时大雨如注,我们钻到人群中避雨。哈莱维把装着鸡

的篮子放下，开始在他的公文箱里翻找东西。他探过身来对我说，在走进医院的时候，我们得装出高兴的样子，使老人院老板哈伊姆·齐波里猜不透我们的真正来意。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做哈伊姆·齐波里的工作，鼓动他把钱投到肯·贝协会的股票中去。索洛米尔陪他到我们银行来过几次，让哈莱维给他讲有关股票市场的事。不仅如此，他的妻子肖莎娜·齐波里是最渴望他在我们银行开立账户的了，即使不为别的，也是为了能改一改他总是把钱藏到老人院的犄角旮旯里的老习惯，也使他别再老是把钱带在身上。最近，光天化日之下行抢的事增多了，随身带着现钱很不安全。每次她丈夫离开家门，她想到他也许会遭遇什么不幸，一颗心总要往下沉。就在他最终同意成为我们客户、带着要用来购买肯·贝协会股票的大笔现钱离开家的那一天，他竟晕倒在来银行的路上。过路人照看着他，直至救护车来把他送到医院。就在那一天，肖莎娜·齐波里慌张张地冲进我们银行，来打听情况，补充细节，向哈莱维咨询下一步该怎么办。据她估计，哈伊姆身上带的钱达六位数。当她急急忙忙赶到医院时，人家交给她一包东西，里面装着她丈夫的个人物品——他的衣服、一只手表、一副金袖链以及在他身上找到的几叠钞票。她发现，那钱还不到应有数目的四分之一。其余的钱已无处可寻。尽管她怀疑他遭到了抢劫——她总觉得这种事迟早会发生——她却不愿在医院中抱怨此事，因为她知道她丈夫有在家中的老地方藏钱的习惯。她向他问起过钱的事，但没有任何用处。就是他没病的时候，他也从不对她讲真话。她看到他一丝不挂地躺在走廊的床上，双眼紧闭，嘴巴张开，一个字也讲不出来。走廊里没有窗户，只有一盏电灯照着他的脸和放在头边的一个小柜子上的假牙。然而，她禁不住一遍又一遍地冲着他的脸喊：“其余的钱在哪儿？”

她的声音因过于大声讲话及经常尖叫而变得嘶哑刺耳，有时还会中断。哈莱维暗示她把声音放低一些，因为旁边坐着客户，大厅内还有许多站着的客户。但他的暗示不起任何作用。她坐在那里一会儿也不能平静，也几乎不听哈莱维在说什么。她只是一个劲儿地重复她如何在她丈夫的床边大声诘问有关钱的事，还说她已经不再设法弄明白他为什么要把钱藏起来了。自打她认识他以来，他一直财迷心窍，老是抱有一种过于逼真的幻想。他把钱藏到家中的各个角落，过些时候再拿出来，就假装是得到了一笔意外之财。如果她不是始终生活在那些钱有朝一日被人发现、最终落入某个陌生人之手的恐惧之中，那她也就不会对他这种寻找满足感的方式有怨言了。老人院里毕竟住满了人，特别是老年人。众所周知，老年人总爱在各种角落里抠抠弄弄，而且总爱到与他们不相干的地方去。索洛米尔在当上他们的巡夜人之后不久，就发现过这样一个藏着钱的角落。当他把那个地方指给她看的时候，她差点儿背过气去。幸好索洛米尔是个诚实的人。换了别人，人家就会拿上那些钱一走了之。她当然奖励了索洛米尔的诚实，而且把自己知道的秘密告诉了他，还让他留意她的丈夫。她带着索洛米尔在老人院里转了一圈，指给他看她丈夫爱往哪些地方藏钱。事实上，这些藏钱的地方大部分她都知道，但她从未碰过那些钱，免得引起他的警觉而再去寻找她所不知道的其他藏钱的地方。像现在这样，她至少可以知道钱的下落。她时不时地往壁炉架上的磁狗里面或者往院内一棵树上挂着的结满蜘蛛网的鸽子房内张望。多年来，她费了不知多少口舌，劝齐波里到银行去开个账户，别再想入非非了。现在，厄运终于降临到他们的头上。她从医院回来后，在老人院中搜了个遍，连一分钱也没找到。

哈莱维劝她别放弃搜寻。几天后，她又来到银行，告诉我们

她在祖父留下的那只钟里找到了另外四分之一的钱。这重新燃起了她的希望。她列出了一个单子,写明她在房子内外发现的所有藏钱的地点,并带着单子到医院去同齐波里核对。她对我们说,他不再躺在走廊里了,而是被转到一个有窗户可以看见大海的小房间。他的感觉也好一些了,但还是不能说话。她把那张单子举到他眼前,把着他的手指在单子上来回移动,希望帮助他记忆起来,或者给她一个暗示,让她知道其余的钱可能藏在什么地方。但这个办法也未能奏效。她此刻把单子拿到银行里来了,要求哈莱维尽快到医院去看望她丈夫,并像无意似的提及这个问题。或许他能做得比她成功一些。"你去一趟是值得的,"她暗示说,因为她会把找到的钱全都用来购买肯·贝协会股票。

一连好几周那个单子都放在哈莱维的桌子上。每天早上我们都打算晚上去看望齐波里,但到下班时总是又把探视推迟。肖莎娜·齐波里常给哈莱维打电话,催他快些行动,免得藏的钱被人发现并偷走,也免得她丈夫的情况恶化,完全丧失记忆。但愿别发生这样的事!他确实在慢慢康复,已经能一瘸一拐地走路了,佝着的双肩也直起来了。她说,尽管他已经能说话了,但也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因为虽然可以结结巴巴、糊里糊涂地说些谁也听不懂的话,但一问到钱的事他就又像以前一样一声不吭了。

雨水滴答答地敲打着我们大家站在下面等候公共汽车的那个锡铁遮篷。由于雨借风势不停地向我们袭来,人们都互相紧靠着,以免被淋湿。进来避雨的人越来越多,不时有人甩着雨伞上的雨珠。哈莱维正在打开他的公文箱,寻找肖莎娜·齐波里给他的单子。我接过他取出的纸张、文件和信件,但没有发现那张单子。他想他一定是把它落在银行的桌子上了。起初,我们想上车后再整理出一个单子来,因为那个原件我们都看过好几遍。

哈莱维和我都记得哈伊姆·齐波里藏过钱的一些地方。“破煤油灯、樟脑丸罐、被淘汰了的灯罩，”哈莱维说。我又补充了两个：“旧拖鞋、小百宝箱。”但是，那个单子写了满满两页纸，我们回忆起来的还差得很远。有一次，当哈莱维对于她竟开列出这么多地点表示怀疑时，肖莎娜夸口说，她的家可不是乞丐住的小窝棚，那里能藏钱的地方多着哩。

我们刚走出那个锡铁雨篷，汽车就来了。但我们还是回银行去取肖莎娜·齐波里的单子了。在街角处一家店铺的篷子下面，我们遇见了老人院的园丁保罗·韦格。他向我们讨一双二手雨靴，因为他仅有的那一双在齐波里的花园内干活时穿坏了。他先后抬起两只脚给我们看那千疮百孔的雨靴的惨状，脚上的袜子已经湿透了。索洛米尔答应过要给他换一双鞋，但他好像总觉得这事不用急。哈莱维不仅看了韦格的雨靴，还看了看整个这个人的外表，他那张苍老干枯的脸，他那从上到下全都泛着红色的大鼻子。韦格讲话时，他嘴里那仅剩的一颗牙齿若隐若现。他讲的是掺杂着英语单词的德语，因为他一直学不会希伯来语。他是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生的，曾在海德堡大学就读，拥有化学博士学位。索洛米尔对我们说过韦格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逃离德国的，在遥远的澳大利亚呆过一段时间，以色列刚一建立他就来到这里，成了一个基布兹的创始人之一。他在那个基布兹没呆多久，却差不多同所有人都闹翻了。后来他曾回到德国去靠养老金生活，并领取了战争赔偿。当他听说以色列吃的东西很便宜的时候，他便又回到这里，在我们这个镇上的领养老金的穷人聚居区内租了一间房子，并当上了齐波里的园丁。起初，肖莎娜对于雇一名博士当园丁很不以为然，但是索洛米尔说服她同意让韦格扛着锄头和耙子在她的花园中忙碌了。当索洛米尔把韦格带到银行来让哈莱维试探他对购买肯·

贝协会股票的看法的时候，他还对我们谈到韦格过着孤独的独身生活以及有关他一直在寻找的一位远亲的情况——他们中间隔着六七位已经去世的亲戚。韦格把他的钱转到了我们银行，开了一个外币账户，但对于让他投资于股票的建议却置若罔闻。

韦格把一只脚放在我的脚边，然后又把脚放在哈莱维的脚边，好让我们知道他的脚的大小。哈莱维对于他顽固地拒绝购买肯·贝协会股票一直耿耿于怀。如果他购买了肯纳德·贝伦森的股票，光是靠利息他就会生活得很阔绰，哪会需要向人乞讨一双旧雨靴呢。他本来可以不仅买一双新靴子，而且可以买一打，而且还可以买一件像样的大衣来把他穿的那件破破烂烂的旧军大衣换下来。他甚至可以装上满口假牙，使别人至少能听懂他讲些什么。"他本来会有钱做所有这些事情，"直到我们把韦格甩到了后面，哈莱维还如此气呼呼地评论着。肯纳德·贝伦森在阐释他有关穷人没有发财志向的理论时，所指的就是韦格这样的人。贝伦森在他的书中告诫说，人们还没有学会应当怎样爱钱，还需要在他们心中培育对钱的真正的爱。索洛米尔对我们说起过韦格对花在自己身上的钱是怎样地锱铢必较，我觉得他可能太夸张了。韦格曾有好几次到我们银行来出售他账户上的马克，然后开出金额可观的支票送给慈善机构。

"花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但却不想发财，"当我们在一辆汽车前头穿过马路时，哈莱维这样自言自语地说。那辆汽车的前灯晃得我们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而且还把脏兮兮的雨水溅到人行道上来。哈莱维这样说与其是出于气恼，不如说是为了记住这件事，以便到肯纳德·贝伦森的著述中去查找，因为他不记得见过像韦格这样的例子。

"我们给他弄一双靴子，"哈莱维接着说。他的意思是，索洛米尔或我自己应当到大脚的熟人中询问一下。他觉得，最好是

农民或基布兹成员穿的那种高帮胶靴。由于我曾在基布兹中生活过，那我肯定会认识某个有一双富余的大码靴子的人。“而且，博士一定会购买肯·贝协会股票，”当我们站在银行门口，在擦鞋垫上擦鞋时，哈莱维得出结论说。

屋内的灯全都亮着。一股废纸的霉味直往我们的鼻孔里钻。那女清洁工用怀疑的眼光朝我们这边瞄了一眼，挥舞着胳膊下令我们离开：银行下班了，没有人接待顾客。

“雷切尔夫人！雷切尔夫人！”哈莱维大声喊着，为的是驱散她的怀疑。雷切尔·奥哈纳有点不知所措地急忙向我们走来。她在哈莱维面前站住了，把扫帚把儿靠在一张桌子边缘，两只手掌举起，就像为人祈福那样，一下子扑到哈莱维的胸前，哈哈大笑起来。她个子很矮，又很胖，哈莱维同她讲话就像对孩子讲话似的。“你这个月存钱了没有，雷切尔夫人？”他问。

雷切尔·奥哈纳弯下身子，把手伸进高腰袜子里，掏出一张又一张钞票，有的皱皱巴巴，有的卷成小卷后又被压扁了。她还从前胸掏出好几张。她不想把钱带在身上过夜，她说。这样她的儿子——那个不成器的东西——就无法强迫她把钱交给他了。“你拿去吧！”她一边说着一边把所有的钱都塞到哈莱维的手里。我脱下大衣，拿下倒放在我桌子上的两把椅子，清出了一块地方，好写收据。

哈莱维一直鼓励雷切尔·奥哈纳把每月的工资拿出一部分来，让他为她购买肯·贝协会股票。前些时候的某一天，他把她叫跟前，问她愿不愿意成为有钱人。她听了这话便流下了眼泪，接着又抽泣起来，就好像他的问题触动了她的一处裸露的伤口似的。与此同时，她的生活中还有其他一些麻烦事令她伤心：一个蹲监狱的儿子、一个弱智的女儿、一个眼睛快要失明了但还拖着病弱的身子挨门挨户收破烂的年老的丈夫。

哈莱维没有让她哭出声来。他把自己的手帕递给她，让她把鼻子擤一下，鼓励她振作些、坚强些。看来，从来没有人让她好好地哭过一场——不论是在这里、在家里还是在任何别的地方。只有在她曾祖母的葬礼上，她才得以哭个痛快，尽管早在摩洛哥老家时这位老太太据说就已经超过一百岁了。但是，当又过了一些年之后老人家仙逝于以色列这个地方时，雷切尔·奥哈纳的眼泪却可以自由地流淌。她觉得，如果她希望能尽情地哭一通，墓地是她惟一能够这样做的地方。她开始经常参加葬礼。有许多以色列本国的和来自国外的老年人在我们这个小镇上度晚年，所以常常会举行葬礼。几乎每天都有人去世，所以雷切尔不愁没有葬礼可参加。惟一的障碍是她看不懂全镇的墙上、公告牌上和树上贴的讣告。她可以根据它们的黑框认出那是讣告，至于是谁的葬礼、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等候免费往返巴士，她只有让过路的人给她读了才能知道。她并不是总能得到正确的信息，但她这个人很腼腆，不好意思再问一遍。

我把笔交给雷切尔，让她在收据上签字。她写上了自己的全名。哈莱维俯下身，出声地把用大方形印刷体密密麻麻写在一起的"Rachel Ohana"这几个字母读了一遍。他拿过收据，把一只脚放在椅子上，开始赞扬起雷切尔来，把我们回银行来的目的忘到脑后去了。

银行曾送雷切尔上过一年多希伯来语识字班，但她什么也没学会。只是在她感到需要了解有关葬礼的信息，好让她能畅快地哭一通的时候，她才学会认和写几个字。现在既然能认识加黑框的讣告上写的字了，她也就不再在设法成为有钱人这种事上缩手缩脚了。她每个月都从自己的工资中省出一小部分，带着胜利的微笑直接把钱送到哈莱维那里去。

哈莱维在他的文件箱内找到了肖莎娜·齐波里的那张单子。

他用一张过期的金融公报把买的鸡重新包了包,因为原先那张包鸡的纸已经被雨浇湿了。我们离开银行,到医院看望哈伊姆·齐波里去了。

第二章　在医院里

在巴士上，我们遇到了索洛米尔。哈莱维和我同他打了句招呼之后，便朝后面的座位走去。

“同他在一起的那位女士是谁？”哈莱维问。

“她叫德沃拉·米肖里，是一个基布兹的成员。”

“她有钱吗？”

其实，没多久以前索洛米尔还到我们银行谈起过德沃拉·米肖里的事。哈莱维当时太忙，没有时间接待他，便让他来找我。听说我本人以前也在基布兹中生活过，索洛米尔便给了我一张名片，邀我到他家中去与他见面。同时，他说，我还可以看看他的博物馆。

不久后，当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前去拜访时，我发现他在置于他那狭长的小屋后面院子里的那个古代石棺内睡着了。通往小屋的门上横着一个铁栓，铁栓上斜吊着一把挂锁。所有的窗户都从里面用拆开展平的纸箱硬纸壳钉上了，但透过一块纸壳上的一个小洞可以看见屋内的地上丢得东一件西一件的物品和衣服，还有放在这些东西中间的一摞书。整个后院都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古代石头、破损的塑像、骨灰瓮、一截一截的柱子、一些陶器碎片，还有两个大理石台阶。好几块墓碑互相倚放着，其中一块上刻着 Cohen 的手指张开的大手。院内长满各种野草。小门

廊上方的锡篷似乎已被一棵树的枝杈顶起来了。一道低矮的拱门由那棵树支撑着，上面钉着一些铁条和锈迹斑斑的螺栓。拱门上用大个的字母刻着希娜·罗歇尔的名字。

院内的这一切都是施穆埃尔·索洛米尔用两辆卡车从萨费德运来的。由于没有车道通到后院，他的这些古董全都得在距这所房子大约二百米远的便道上卸下来。雅可夫·诺德尔的后院与索洛米尔的院子相邻。他把自己的仆人艾哈迈德·纳阿拉尼租给索洛米尔，帮他把东西弄到院子里。艾哈迈德拿起一块大锡板，在锡板的一侧敲出两个洞，拴上绳子，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开始拉那些箱子、石头和柱子。直到秋天过去、冬季到来的时候，艾哈迈德才把那条便道清理出来。

为了支付给诺德尔的好处费和给纳阿拉尼的工资，索洛米尔到我们银行来申请贷款。但是，在哈莱维的建议下，他把贷款投到了肯·贝协会的股票上，而给诺德尔和纳阿拉尼两人开了缓期付款的支票。哈莱维对他解释说，到那些支票到期时——第一张是六个月到期，最后一张是十八个月以后到期——股票就会升值了。用这笔钱为他赚钱，他不仅能把债还清，而且净剩的钱也会比开始时多得多。

索洛米尔对我们银行给他出的这个点子赞不绝口。“你看，”不久以后，他就用一种古代赞美诗般的慢吞吞的语调对我细数这样做的好处：“我把我的收藏品放到了我想放的地方；雅可夫·诺德尔的日子也不比以前差；艾哈迈德·纳阿拉尼现在有了一些美国股票。我自己成了名副其实的股东——所有这一切，连一个铜板也没花就办到了。”他把这看作当今时代的标志，自由世界的标志，进步经济的标志。他说，前几代人连想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他们年复一年地省吃俭用，也只能勉强度日。他一直想把股份卖出去，以便还清债务，获得可观的利润，但又

不想失去在今后获得更大利润的机会。

那天我到他的住所去的时候，忘了他是个夜猫子，上午要睡觉。他身穿一件花睡袍，盖着两条粗糙的灰毯子。暖融融的太阳使得这个寒冷的冬日有了一丝春天的气息。斜照进石棺的阳光，形成了一明一暗的两个世界。索洛米尔的脸刮得光光的。自打他同德沃拉·米肖里恋爱以来，他比较注意修边幅了。他同她的关系始于总工会组织的那次参观期间他们在一个基布兹吃饭的时候。她小心地揩掉她盘子旁边的一块污渍，以免弄脏了他放在那里的写有姓名的牌子，而且大声读出那牌子上的名字，让全桌的人都听到："施穆埃尔·索洛米尔博士。"她所做的这一切都使他顿生爱慕之意。接着，他补充了细节——在柏林大学攻读过城市博物馆和艺术品收藏学。听她说她想参观一些精美的画展，他便邀她先来看看他的展品。她对他说，自她丈夫去世之后，她的生活就变得黯淡无光了，她的家现在是一个了无欢乐的地方。她一周三天在厨房里工作，三天到基布兹图书馆去。但是，她的心不再放在她所从事的工作上了。每一天都像前一天一样乏味，而且她没有了任何可以期待的目标。正因为如此，当她在星期三那天走进餐厅，看见一个新面孔的时候，她就立即被吸引到他所在的桌子那儿来了。

饭后，她带索洛米尔参观了场院。放眼望去，毗邻基布兹的广袤田野，田野上放牧的无数牛羊，还有公路两旁那一片片果园，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不喜欢那豪华的餐厅和餐厅周围的宿舍区，因为它们与他心目中的开拓生活似乎格格不入。很早以前，他曾动过放弃城市中的喧嚣忙碌、去过一种艰苦创业者的宁静生活的念头。从那时起，对这种生活的憧憬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而眼前的景象破坏了这种憧憬。他感到失望。不过，他喜欢餐厅墙上的装饰画，也喜欢推车送热汤的女孩

的姣好的面容。有好一会儿，他的眼睛竟离不开她那绕过脖颈、停在乳峰上的弯弯的发辫。

在此期间，同来的那些领养老金的人已经与基布兹中那些目光犀利的老人们一起用过了地道的犹太正餐，此刻正聚集在破旧的祈祷室外面。索洛米尔本想与他们一道用餐的，但是，同那么多老年人在一起，他觉得不自在，好像喘不过气来似的。他离开众人，走进基布兹的餐厅。那里充满年轻人的欢笑声、盘碟相碰的丁当声、熟土豆的香味，此外还有德沃拉·米肖里——所有这一切都是那样令人耳目一新，那样使他精神振奋。毕竟，他参加这次参观活动只是受我们银行之托，前来打探领养老金的老人中有谁仍在把钱存在别的地方。银行需要更多的客户，他自己则想多为他的图书馆弄些依地语书籍。德沃拉·米肖里答应把摆满好几面墙的依地语书籍都送给他。此前她已开始清理基布兹图书馆里的大部分依地语藏书了。而且，她知道许多别的基布兹也在这样做，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还在读依地语书籍了，而那些书只是白白占掉许多宝贵的空间而已。她说她羡慕他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和他的志多趣广：书籍、银行和画。

“我这人生性就是闲不住，”索洛米尔承认了这一点，并保证不久会再来看她，就他一个人来。

当他发现德沃拉·米肖里每周两次进城到一位朋友家打牌时，他弄到了那位朋友的地址，开始在那所房子外面等她。据他分析，如果她爱打牌，那她必定有点钱。有一次，她于将近午夜时从里面走出来。由于刚打完牌，她两颊仍然绯红，一出门便急急忙忙去赶最后一班巴士回家。索洛米尔本希望她能同他一起过夜。然而，当晚输了钱的德沃拉根本没有情绪做爱。于是，他们便商定，以后她先到他这里来，然后再去打牌。有一次，当她到索洛米尔那里来同他在床上缠绵了一阵之后，他打开了她的

钱包,发现里面有一个银行存折。

"钱多吗?"哈莱维问。

"她和她丈夫买彩票中过一次头奖,"索洛米尔告诉他。

乘客们开始争先恐后地上车,上来后便涌向后部的座位。街灯从凝了一层水蒸气的车窗旁闪过,有时车外比车内还要亮一些。哈莱维把装着鸡的篮子拿起来,放到膝盖上,免得被别人踩了。他觉得,有的人就是走运,世上什么好事都有他们的份儿。把所有家财都押在那些投机股票上的平沙西克就是一个例子。就连普通的基布兹成员也是如此。不论从哪方面说,他自己到今天应当是发了大财的,然而他却没发财。他没有像许多别的人那样成功这应当怪谁呢?他从达妮埃拉的脸上也看出了这样的疑惑,尽管他一直不能回答这类问题,不论是向自己回答,还是向她回答。她早就不再仅仅依靠他了。有时,她会半夜三更从床上爬起来,记下她刚刚梦见的一个数字,以便同她买的彩票上的数字相对照。有一次,她梦见的数字与票上的数字一样,于是,第二天上午她就急忙赶到银行,准备去领她赢的钱。后来,失望而又气恼的她不停地念叨:"那数字是清清楚楚的嘛!"不过,她也不是完全不相信他了。她始终认为,一切都取决于他的意志力,只要他拥有足够强烈的意愿,他们自己仍有可能发点小财。在她看来,哈莱维属于那种总是为别人着想的人,向来不考虑如何为自己谋好处。在她心情较好的时候,她会称他"我伟大的理想主义者"!

哈莱维变得不安起来。当汽车停下、车灯亮起来的时候,他微微抬起一点身子,朝着前面隔着两排座位的索洛米尔和他的同伴望了望。

"他在等什么?为什么不带她到银行去?"

"所有的钱都用她丈夫的名字存在特拉维夫的一家银行

里。”

“可他已经死了。”

“不错，图维亚·拉辛已经死了一年多了。”

“她姓米肖里？又结婚了吗？”

“没有。她一直姓娘家的姓。”

“这里面有什么古怪？”哈莱维颇感不解。

这也是一个使索洛米尔感到困惑的问题，因为他和哈莱维都不知道，基布兹中的一些妇女即便在结婚后也依旧姓娘家的姓，以此显示自己的独立。

德沃拉·米肖里并没有因为索洛米尔发现了自己的秘密而感到不悦。现在她至少有个人可以吐露心曲了。自打她丈夫去世以后，她不敢向任何人谈起他们赢钱的事，担心一旦被基布兹听到风声，她就得把钱全部上交。拉辛在世时，他们总是用一些特殊词语来指称他们的银行账户，免得自己说露了嘴。他们用以指账户的词有“鸡蛋”、“蛋糕”、“面条”和“奶酪”。但是，自从她丈夫去世以后，这些词只会使她更痛切地想到自己已成了寡妇。只要厨房里那些女人的谈话中崩出“面条”、“奶酪”、“鸡蛋”这类字眼，她就背后发凉，不由得四下张望，惟恐人家是在暗指她的钱。有时，在劳累了一天之后，她会比平时早一些上床。但在睡觉之前她总要把那存折再仔细地看一遍。拉辛生前曾努力教会她怎样计算百分比和怎样记账。现在她很怀念他，因为她已经把他教给她的东西都忘光了。她常常躺在床上，把打开的存折放在面前，但却什么也看不懂。拉辛走得太早，撇下她一个人处理这些户头，而且连一个可以商量的人都没有。

多年来，拉辛坚持用他们每月的津贴买彩票。每当她抱怨手上一个子儿也没有的时候，他就吹口哨权作回答。那口哨吹的是熟悉的祈祷曲：

我将继续深信不移，
尽管好运姗姗来迟。
不论需要等待多久，
我的希望决不放弃。

基布兹的其他成员通常用他们的津贴买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装饰他们的房屋。她自己也早就想买一个电炉，这样她就不必再到基布兹的大厨房去烤东西了。大厨房里的那些女人总是用鹰一般的眼睛盯着她的手指，评论她的配方，打探她的隐私。但是，在赢了头奖之后，她说什么也不敢买那个电炉了，因为她害怕别人怀疑买炉子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她丈夫为自己买了一件花晨袍、一套真丝睡衣，还有一部录音机。他常于夜深人静之时，锁上房门，拉上百叶窗，穿上他的新衣服，在屋内走来走去，练习对着录音机讲话。总的来说，他是个言语不多的人，不跟任何人交朋友。如果有谁主动同他搭讪，他也只是抬抬一只肩膀，作个不情愿的回应。他给德沃拉留下了一盘录音带，他在那里面细数了他们房内的所有家具、他还有多少天退休、他所不喜欢的或对之有嫌隙的基布兹成员的名字，还描述了他发明的一个捕蝇器的构造。但是，关于那笔钱，他只字未提。

"为什么所有钱都用他的名字存呢？"哈莱维很想知道其中的原因。

这时，汽车正在轰隆轰隆地通过一座桥梁，所有东西都在格格作响。我没有立即回答他，想等声音小一些时再说。车灯亮了，一些乘客下了车。后面变得松快一些了。索洛米尔转过头来，向我们示意。德沃拉·米肖里用眼角的余光朝后面扫了我们一下。

“也许是为了显示他自己的独立性?”哈莱维还在想那个问题。

一开始,他们的钱的确是以联合户头的形式存的。但后来,德沃拉让她丈夫到特拉维夫的银行去把她的名字勾掉了,因为她担心倘若这事泄露他们会被迫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要么把钱上交,要么离开基布兹。拉辛对基布兹没有多少感情,即便被开除也毫不在乎。他一直想自己开一爿小店,但德沃拉说什么也不同意。她当初破釜沉舟地从海外归来,成为一名开拓者,难道只是为了在以色列开店卖小货吗?不想实现那些崇高的理想了吗?如果生意破产,他们的钱全都赔光,她不得不去为别人洗衣裳,那又该怎么办?拉辛没有任何专长,不是一个能挣大钱的人。在基布兹中,他被分配去打扫场院,在夏季还要消灭那里的苍蝇。他发现苍蝇们总爱聚在鸡内脏附近,于是便想出了一种用鸡内脏吸引苍蝇并将它们聚而歼之的家什。

当德沃拉的担心减轻了一些的时候,她就让拉辛到银行去把她的名字恢复。毕竟,你无法预知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做会免去许多法律方面的纠纷。就这样,随着她的担心的涨涨落落,她一会儿让拉辛去把她的名字勾掉,一会儿又让他去把她的名字恢复。后来,在她又一次让他去把她的名字勾掉之后不久,拉辛在加利利海中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是什么原因使她不肯把钱全都转到她的名下?”哈莱维非常希望向她提供各种帮助。他想告诉索洛米尔,劝她赶紧把存款转到我们银行来。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索洛米尔已经同一位律师联络过了,想请他帮忙使德沃拉成为惟一的受益人。但是,后来,由于拉辛托梦给她,她便改变了主意。那次索洛米尔真的发火了。拉辛在梦中到底对她说了些什么?毕竟,他这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不

过是一个可悲的逮苍蝇的人而已。这在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方也都是无用者的职业！他索洛米尔小时候也逮过苍蝇。他会把一束稻草放在它们的翼下，让它们试着往墙上爬。他总是能根据草束的大小准确地判断出那苍蝇是能够爬上去呢，还是会摔下来。但这种小孩子的恶作剧他早就不干了。他希望德沃拉把钱投到他的博物馆和图书借阅室。那会使这两者都获得丰厚的收入。德沃拉当过图书管理员，在到其他地方建立图书借阅室时，她的经验可以派上用场。现在有足够的图书和读者，再建一些图书借阅室是完全有条件的。一些钟情于依地语的老人很愿意为此做出贡献。他自己就认识特拉维夫的一位年老的犹太人，他愿意出一百万镑在那里建立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依地语图书馆。拉辛可曾想过，直到他去世之后，他依旧抓住那笔钱不放？实际上，拉辛在德沃拉的梦中根本没讲话，只是像生前那样用口哨吹出那只关于不放弃希望的祈祷曲。

哈莱维在他的座位上不安地挪动着身子。想到有那么多他早就可以投到肯·贝协会股票中的钱此时还被闲放在特拉维夫的某家银行内，他实在无法处之泰然。他记得，肯纳德·贝伦森的书中谈到他的一位代理人曾在资本抽逃期间做成一笔数千美元的买卖。于是，哈莱维站起身来，拨开众人，朝索洛米尔的座位走去。他要同他谈谈那笔钱的事。索洛米尔给我递了个眼色，要我也过去。

就在我去拜访索洛米尔的那个春天般的早晨，他刚刚从酣睡中醒来。我弯下身子，握住他从石棺里伸过来的手。他朝我微笑着，双唇就像摇篮中的婴儿一样鲜润。为了躲开旁边的一个树枝投到他脸上的阴影，他微微移动了一下身躯。巡夜人这差事使他受了风寒。在波兰和在萨费德那冰天雪地的冬季，他似乎从未因受寒而患过背痛的毛病。气候想必是一年比一年糟

糕了。老人院里的人也都这么说。他的小屋太冷了，而可以把它烘暖的煤油又太贵，他只好利用这清晨的阳光来温暖自己被冻僵的身子骨。石棺摆放的位置使它恰好能捕捉到几缕冬日的阳光。我用手摸了摸石棺的内壁，发现那里相当暖和。少时，我帮他把置于两个管子之上的石棺推出阴影。石棺下面的草地已经被压平，可见索洛米尔在冬季的几个月中总是把它推来推去，整日价追逐着阳光。我坐在大理石台阶上，望着索洛米尔惬意地躺在他那温暖的小窝里。后来，当他摆脱了曚昽的睡意、完全清醒过来之后，他建议我参观一下他的博物馆。我对他说，我已经到那里去过了。当他还在睡着的时候，我打开了门上的挂锁，拔开插销，发现有一张桌子挡住了那道向外开的门的三分之二。我屏息收腹，挤了进去，把其余的房间参观了一遍。

"哦，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用桌子挡住入口。

"萨费德的画廊都是这样进的，"他说。这是因为，当萨费德成了艺术家的集居地之后，人们开始前去参观那里的画廊，但却不肯买门票。于是，就把一张桌子横在门口，迫使观众挤进去，面对那个装钱的盘子——那盘子非常显眼，决不会看不到——使他们无法不交钱。索洛米尔甚至对这种办法做了改进，把他的盘子放在白色蜡光纸板上画的一个黑色圆圈内，纸板上画了一些从各个方向指向盘子的红色箭头。

离桌子不远有一张双人床，上面乱七八糟地堆着一些被子、枕头之类的东西。桌子和床之间有一个煤油炉，那炉子置于一个放倒的绿色锡桶之上。锡桶周围、双人床上以及桌子底下，散放着各种各样的炊具。桌子上面则堆满了书籍、剩饭、文具，还有一条长内裤。索洛米尔生活很节俭，个人物品减少到最必需的几样，以便为他的博物馆留出尽可能大的空间。"毕竟，"他为

自己辩解说："一个男人要那么大地方有什么用?"

在隔壁的房间内，每一面墙上都过挂着好几排画，那些画都用绳子拴在一起。"这样就不会被偷掉了，"他解释说。所有房间内都放着装在麻袋里、纸箱和木箱里以及胡乱堆在一起的书籍。有些箱子上还带有外国标志。索洛米尔到我们镇上落户之后，向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区发了信。他保证，谁要是捐赠摆满一面墙壁的书籍，就把捐赠者的名字刻在墙壁上，永志纪念。美国方面有了回音，澳大利亚和乌拉圭也有了回音。"我还同华沙和列宁格勒的图书馆保持联系，"他说。

在一间灯泡已经烧坏、窗户钉着木板的黑黢黢的房间内，有一只装满祭祀用品的玻璃箱。你只能透过玻璃模模糊糊地看出里面有几顶绣花瓜皮帽、一个银制的手形指示物、几只调料瓶、几个铜蜡台和一些羊角，其中有一个羊角是细细弯弯的。玻璃箱上方挂着一幅赫茨尔(1860—1904，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创始人——译者注)的肖像画、一部希伯来《圣经》卷轴，还有一件像是古代婚约之类的东西。一张弯腿桌子上放着拉辛的那部录音机。德沃拉把它送给索洛米尔，让他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录下来。他穿的那件花晨袍也是她送给他的。他躺在石棺内没起来的时候，就曾把毯子掀开让我摸摸那料子。他穿着一双红袜子，拖鞋放在旁边的一个只有一个把手的高高的瓦罐上。后来，由于推石棺太用力，身上出了汗，他脱去那件晨袍，但依旧穿着拉辛的丝质睡衣。在阳光下，那绿色的睡衣闪着银光。索洛米尔在等待德沃拉的到来。这天是她进城打牌的日子。

公共汽车的过道上此时已经没有乘客了。再有两站就到目的地了，于是我便站起身，朝哈莱维走去，想听听他在说什么。他一手抓住吊环，一面把头凑向德沃拉·米肖里，好让她在嘈杂的环境中能听清他讲的话。他高度赞扬索洛米尔，说他今天又

带来了两位相当有钱的客户。他邀她到银行来同他好好谈一谈，还说她听听他提出的一些适时的建议是绝对不会后悔的。我们此刻就是到医院去向某个人提建议的，而那人在钱的问题上是十分精明的。索洛米尔听出我们要去看望什么人，便暗示说，他过一会儿也要到医院去，希望我们在那里等等他。看来，肖莎娜·齐波里先前已求过他到医院跟她丈夫谈点什么事。

我们下了车。大雨还在瓢泼似地下着。那条街是个下坡，雨水漫过路沿，形成一条湍急的小溪。铺了沥青的人行道的中央涌起一层层的涟漪。黑暗中，房舍和窗户闪闪发光，有几扇开着灯的窗子显得格外明亮。哈莱维的眼睛盯着已启动的汽车，心思仍然放在德沃拉·米肖里身上。"我觉得她一点儿也不像那么胆小的人，"他一边说着一边竖起风衣的领子。

我们进了医院的大门。看门人蜷缩在他那灯光明亮的小亭子里，他那黑色的影子透过窗户映入我们的眼睛。院子里还有一些人在朝主楼奔跑。医院的门厅里又冷又湿，它那绿色的墙壁散发着一股迷蒙的寒意。一位身穿蓝色睡衣、外罩一件蓝色长袍的老年患者把公用电话的听筒贴在耳朵上，在费力地听着对方讲话。他鼻子尖尖，下巴低垂，脸上满是褶皱。在一条长凳的一角，坐着一位年轻的女兵，在那里轻轻地啜泣。

"她要是对我也热情点就好了，"哈莱维仍在想着德沃拉·米肖里的事。他用爬楼梯的办法暖和着身子，只是这样一来他的大肚皮变得更明显了。他突然想起忘记问索洛米尔，他同丽达·奥拉米一起去老人院的路上，她有没有提过再往我们银行转些钱的事。如果她提过，那就越早办越好。我答应他，索洛米尔一来我就提醒他问这个问题。谈到戴维·奥拉米要到老人院讲授欧洲犹太人墓地现状的事，哈莱维认为，他也完全可以去介绍一下特拉维夫的股票交易所。他早就考虑要到各老人院去推广肯

纳德·贝伦森的股票和主张了。贝伦森本人也一直要求他的使者别放过任何机会——不论是社交活动、家庭聚会、乘船游览还是陆上旅行。人们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渴望听到多赚钱的秘诀。贝伦森甚至引述犹太教义中"以汝之心,以汝之躯……"那段话来证明他在有关犹太教的问题上学识也很渊博。他本人也在塔木德经院中、在教堂里、在佛教集会上、在素食者俱乐部里、在音乐会和展览会上多次发表过演讲。

"索洛米尔的博物馆几时正式开馆?"哈莱维在二楼阶梯的转弯处停下来喘口气时问我。对他来说,边爬楼边说话可不是件容易事。他也打算在博物馆开幕时谈谈肯·贝协会股票问题。我已经为索洛米尔打好了请柬,但是,从我上次去时那个院子和小房子内乱糟糟的情形来看,一时半会儿还无法开馆。我指的是我看到索洛米尔穿着拉辛的睡衣和晨袍在石棺内睡觉的那天上午。那天,推石棺把他累得筋疲力尽,他一直歇到下午一两点钟,为德沃拉·米肖里养精蓄锐。他仰卧在那里,闭着双眼,把脸对着太阳。院子里静悄悄的——除了隔壁诺德尔家那些鹅啊、鸡啊、山羊啊和那匹马发出的声音之外。诺德尔那又矮又胖的妻子在那群动物中间忙活着。她自己也活像一只被剪掉了尾巴的鸭子。墓碑的后面藏着一些骨灰瓮,瓮的底部有一些闪亮的硬币。刻在门上的希娜·罗歇尔的名字被涂成了黄色。那门是索洛米尔带来的,为的是纪念他的妻子希娜·罗歇尔。它使他回忆起他们那已逝的伟大爱情;回忆起他们穿行于萨费德的那些建在山坡上的墓地之中找寻古代的碑石、从各种遗址中找寻往昔的砖石建筑和其他文物的情景;回忆起在那些美好的清晨,他们一起走在萨费德狭窄的小路上,到穷人家里去询问他们是否有什么东西要卖的情景。还有那些家庭拿出来的那些宝贝!那扇刻有希娜·罗歇尔名字的拱形铁门是他们从某个遗址下面挖

出来的。但是装在玻璃箱里的那些祭祀用品却是她自己的特殊贡献。她具有很强的审美能力，而且本来有可能成为一名画家的。但他不准她同萨费德的那批画家混在一起——那些家伙全都是波希米亚人！希娜·罗歇尔本来是个文静的人。她为人腼腆、柔顺，很少大声讲话。不过，随着他们的爱情的消亡，她整个变了一个人，变得寡言、内向，干脆沉默无语了。

我以为索洛米尔又睡着了，就一个人在院子里的那些石头中间随便溜达。但是，当我回来的时候，却发现他眼望着天空，在自哼自唱：

我向天上的摩西祷告，
请让一口袋钱落到我的面前。

德沃拉·米肖里出现在院子里。他立即像年轻的求婚者那样跳了起来，而且只穿着那双红袜子站在那里，亲吻她伸过来的手。她给他带来了一包书，还有一块奶酪蛋糕，因为索洛米尔最近卖掉他收藏的一只羊角，买了一只电炉子送给了她。他立即穿上拖鞋，手里拿着那两件礼物，急急忙忙跑进小屋换衣服去了。刚一进屋，他就把一块挡窗的纸板掀开，朝我们喊："你们两位互相自我介绍一下吧！"过了一会儿，他穿了一条黄裤子和一件能遮住喉咙的黄色高领套头衫走出来，问我们好不好看。但是，没等我们答话，他就自己兴奋地喊起来："年轻了二十岁！"在德沃拉看来，穿了一身黄衣裤的索洛米尔家就好像"拿星期三当周末"一样。

电梯坏了，我们只好爬到四楼。上楼后向左拐，进入一条狭长的走廊。这时我们看到了在走廊另一端的哈伊姆·齐波里。他正朝我们这边走来，但还没有看见我们。离这么远我们就看

出他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上次见到他时，他还那么健壮结实。那是去年夏天，在公园里，他从哈莱维和我坐着休息的长凳旁经过时，特地停下来，朝我们弯弯腰，还抬了抬他的宽沿草帽向我们致意。

"你们好，银行先生们，"他向我们打招呼，问我们怎么会在这样一个大热天、又不是周末的时候到城市公园中来。他那又长又稀疏的白发乱蓬蓬地盖在发红的脖颈上。哈莱维指了指膝盖上的包裹。我们利用午休时间想找个裁缝，替哈莱维改一条裤子，但是转遍了全城的穷人区，沿着上坡下坡的小路在有楼梯和小桥相通的房舍间跑了几个来回，也没能找到，终于不得不作罢。

齐波里告诉我们，此时在他的脑子里打转的全是女装。他陪妻子肖莎娜到一条专卖女人服装的街上去转，进了一家又一家店铺，就是找不到她喜欢的。不过，在一家铺子里发生的一件事情让他非常不痛快，所以他才要到公园里整理一下思绪，平静平静。

于是，他在我们的长凳前来回踱着步子，讲述起那些摆满衣服架的小街的情景。女人们在那些小街上走来走去，常常会迷路，就像迷失在茂密的森林中一样。当肖莎娜也从视线中消失了的时候，他便烦闷地坐到了紧靠楼梯栏杆的那家商店的台阶上，以免给人踩着。他把两手搭在双腿之间，脑袋垂向膝盖，把帽子拉低，盖住前额。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在那里偷看从身旁走过的女人们的腿。如果他觉得哪双腿特别漂亮，他就把帽子往后掀一掀，再往上瞥一眼，尽管有时是白费力气。只有那位长腿女孩走过，而他把帽子整个拿掉时，他才没有失望。讲到这里，齐波里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用双手比划起那女孩的身材来。

他的身后是宁静的大海。可以看见一艘小船正离开海岸，

缓缓地向远处的天际驶去。哈莱维把膝盖上的包裹放到了他身旁的空座上。齐波里则在继续叙述着他如何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位年轻的女子。此时的她，正表情悲苦地站在他的对面。他非常希望能博她一笑。哪怕她对他给予一丁点儿注意，他也一定能想出办法来除掉她脸上的愁容。这时，一个小姑娘和她妈妈一起从楼梯上走下来。小姑娘边走边用手指尖刮那栏杆，一直刮到齐波里的脑袋上也没停下来。等到她的手指触到他的前额时，他猛然想起在什么地方见过那位女孩，想起她的名字叫米拉蕾。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年他十六岁，米拉蕾也差不多那么大。他自己是变老了，米拉蕾却没有。她还是那个十六岁的女孩。那一次他不是坐在一家商店的台阶上，露出一副可怜相，而是被打发到商店来买纱线。他在那里邂逅了米拉蕾，两人一阵长时间的相互注视，使他们明白彼此爱上了对方。说实话，他每次来买纱线都要讨价还价，设法省下一个小银币，把它攒起来，希望能用这种办法变成有钱人。气恼的店主已经警告过他：他要是再这样干，就把他头朝下扔到外面去，叫他永远不再来胡搅蛮缠。然而，那一天，在遇见了米拉蕾、又充满爱意地对望过之后，他不知该怎么办好了——是继续为一个小银币讨价还价而冒着失去他的所爱的危险呢，还是付出代价得到他的米拉蕾。齐波里把前额上的草帽往后一推，露出他那张缺乏棱角的脸来。他非常希望两者兼得——他的小银币和他的爱。

那小船从一棵树旁驶过。齐波里说，在服装店里，他本应把所有这一切都讲给个子高高的米拉蕾听。但是，个子高高的米拉蕾根本没注意到他。她看过他一眼，但没认出他来。她当时正拿着那件连衣裙往她的长腿上比，微笑着表示满意。当他意识到是连衣裙的颜色、而不是他齐波里使得米拉蕾展露出笑容的时候，他的心都碎了。他重新戴上草帽，把帽沿拉得低低的，

遮住前额,仍旧躬着身子坐在那里。后来,他不等肖莎娜从背后的密密麻麻的衣服架里钻出来,就走出了商店,径直到公园来把米拉蕾赶出他的脑海。

他停止了踱步,对我们说:"先前那一次我也是输着离开商店的,因为我选择了小银币而失去了爱。"

齐波里拄着拐棍、拖着一条腿,朝我们走来。他整个人比原先缩了一半,僵硬的脖子使他从远处看就像个失明的人。他冲我们大声嚷嚷,权作打招呼。他说我们来得正是时候,因为他有一个紧急的问题要问我们,而且希望我们就在这个走廊里告诉他:一个人在寻找上帝的路上能走多远。"两位银行家,请给我算一算。"

他的眼神也比以前僵硬了。他把我们带入病房,躺到自己的床上,我则自己拖过两把椅子来。哈莱维觉得自己被欺骗了。有一瞬间,他以为齐波里所提的问题指的是藏起来的那些钱,甚至还偷偷地捅了我一下,意思是说我们从一开始就走对了路。失望之余,他甚至忘了要始终装出一副乐观的样子。他把那装鸡的篮子放到床脚旁,向齐波里转达了戴维·奥拉米的问候。他说,奥拉米打算过几天到老人院去发表关于犹太人墓地问题的演讲,他自己也打算谈谈特拉维夫股票市场问题。他希望齐波里很快康复,以便能亲自主持这两次活动。

"听说过肯纳德·贝伦森吗?"哈莱维问。

齐波里仰卧在床上。由于无法向两侧转动脑袋,他只好冲着天花板讲话。他想知道,一个人在临死前是不是真的经常因为觉得自己度过了错误的一生而苦恼。他十分真切地体验过直面死神的情景,而且,在他苏醒过来之后,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一生是多么不对头。从那之后,他花了好多时间深入地考虑各种事情,尽管这类想法并不是一夜之间出现在他的脑海里的。

他的妻子和其他家人整天在他床边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但却丝毫没有意识到他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他已庄严发誓与金钱、女人绝缘；倘若他能康复出院，从今往后他将过一种毫无伪装的真实的生活，要保持缄默，决不开口。齐波里把伸向我们的手垂了下去，闭上眼睛，不再做声，好像在等待一阵疼痛过去。

“我又讲话了，违背了誓言。”

哈莱维向他凑近了一点。一位护士出现在门口，然后又离开了——显然不知道该不该把我们请走，因为探视时间早就过了。一种令人感到异样的寂静笼罩了房间：齐波里躺在他的床上，床头摆着一张小桌子，哈莱维和我坐在他旁边。现在我们俩就是他此刻这个家庭的仅有的成员。

“明天上午他们要给我做手术，”他说。怪不得把他的头和脸也得那么干净。他那剃光的脑壳使他的脸也显得光秃秃的。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在一个漫长夏日的傍晚时分，走路走得筋疲力尽的他来到路旁的田野里，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他解下背包，跪在地上，把一条毯子铺在一面石墙旁边，尽可能远离他的邻居。他脱下鞋子，把背包中的东西全倒出来——那是一个男人出远门时必带之物：毛巾、牙刷、肥皂、一本杂志、一张旧照片、一双换洗的袜子。他把鞋放在头间，蒙上毛巾，便枕在上面休息起来。田野里静悄悄的，夕阳在红霞中缓缓西沉。他闭上眼睛，一会儿便睡着了。“我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能猜到我在自己的梦中身处何处吗？”不要说医生、护士和护理员，就连他自己的妻子也不想听他唠叨这些！这个世界上充斥着无聊的废话，各种引你上当的声音把人的耳朵都吵聋了。然而，在这座医院里，有一个人却用不着走开。齐波里指了指房间另一头的那张床。床的主人刚一回来，他就向我们作了介绍。就是此人，不仅听他讲了他的梦，而且还给他解了梦。“八十多岁了，多年以前

从俄国来的。不是犹太人。”

齐波里拽着拴在床的另一端的绳子坐起来。多亏他做了那个梦，也多亏了那位俄国人，他已经开始思考有关上帝的事了。在所有探访者都离去而我们尚未到来之前的一个多小时内，他一直在走廊内踱来踱去，以便整理自己的思绪，对一些老的念头作出新的解释，直至他被带到一个小房间去。那房间内仅容下一张蒙着塑料布的单人床。在那里，一个骨瘦如柴、上唇没有胡须而只有一层绒毛的年轻的护理员扑在他身上，时而咯咯笑着，时而吹着口哨，用推子把他的脑袋和全身推了一遍。他在走出那小屋时，感到非常屈辱，因为他全身毛发皆无，连脑袋里的赞美词也随之无影无踪了。不过，就连这也不能使他泄气。在逐渐加深的暮色中，他拄着拐棍，又在走廊中踱起步来，竭力回忆忘却了的赞美词。这时，另一个护理员——这一个年纪要大一些，面目也还和善——又来拉他去灌肠。

齐波里回到病房后便一直专注地盯着一个空脸盆，免得在众人面前感到无地自容。“我亲爱的银行家们，”他终于开口了，“一个被灌过肠又有过那许多想法的人再去寻找上帝，他还能走多远？请给我算一算！”

哈莱维从口袋里掏出那份清单。他本应在挂断电话之前问问肖莎娜，她所说的她丈夫讲话词不达意，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刚想说什么，这时一个患者走了进来，在我们旁边停了一下，然后便盯住哈莱维的篮子，俯下身去，用手指碰了碰那张包着鸡的报纸。

“这就是那个俄国人吧？”哈莱维朝那人的方向努了努嘴。此时，那人正在向自己的病床走去。

“莫迪凯·莫根施特恩！”齐波里大声喊道。“过来见见我的客人。”

莫根施特恩转过身来。病号服胡乱穿在他的身上，只有一个纽扣把那蓝色晨袍的两襟扣在一起。系睡裤的带子耷拉在晨袍外面。只见他再度朝那篮子弯下身去，问道："我可以看看吗？"

"嗨！"哈莱维回答，从他的声调中人们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他是如何看待这个请求的。他把篮子往床底下推了推，手不够长，便又用脚往里蹬了蹬。他猛地转过身子，又把椅子用力拉转过来，不再去看莫根施特恩那张长着一个纽扣大小的优美下巴、有点女人气的脸。由于极力克制气愤，肖莎娜的清单在他手中抖动着。他的篮子不干任何人的事，干嘛要凑过去打探？他到这里来，难道是来解释有关上帝的梦的吗？他对别人的梦毫无兴趣，就连自己的梦也记不住。解梦那是他太太达妮埃拉拿手的事。梦境有时会使她半夜爬起来翻查报纸，看看里面有没有她刚刚梦见的数字。

"听说过肯纳德·贝伦森这个人吗？"哈莱维再次向齐波里发问，接着便对他讲起他在老人院发表演说时将谈些什么。他谈到肯纳德·贝伦森关于让各国富起来、给世界带来和平的计划。

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懂得，贸易和财富是与和平联系在一起的，懂得没有和平就不会有繁荣的贸易，而战争总是使世界陷入贫困。甚至有一位波斯国王也曾被告诫不要挑起战争，因为交战会使他蒙受极大的损失。西欧各国汲取了这个教训，所以它们为和平而结成了一个庞大的共同市场。

"对不起，我听到了肯纳德·贝伦森的名字，对吗？"那个名叫莫根施特恩的病号在床上喊道。

谁也没吭声。我们当时正背对着他，而齐波里的思绪正在另一个世界内游荡。他在想，如果违背自己的誓言，将会是一种什么情况？而今，他违背了誓言，他同死神的遭遇就不是真的

了，既然如此，可否假定他的生活其实并不是伪装的呢？

那边，莫根施特恩又把他的问题重复了一遍。

"那个人靠什么谋生？"哈莱维问。

"以前是教音乐的，"齐波里回答。"此人绝顶聪明，总有一天会发财的。"接着，他压低声音补充说，莫根施特恩把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一座工厂卖掉，放弃了教师职业，开始进行股票交易了。"是个老光棍。"

哈莱维把那名单放进口袋，从齐波里床下拖出篮子，提着它走到莫根施特恩的床边，对他说："你自己看看吧，除了一只安息日要吃的鸡，别的什么也没有。"

"我要找的不是鸡，而是股票交易所的公报，"莫根施特恩说着用手指了指包着鸡的那张纸。哈莱维脸上露出了喜色。他把那张纸打开了一部分，在上面寻找着日期。"这不是新的，"他说，"是上周的了。"

"老兄！"莫根施特恩欢呼起来。"我有一个多月没看到正式的股市报告了！"说罢，两人立即立即找来一张废报纸，把鸡重新包了一下。

"阁下帮了我这么大的忙，请问尊姓大名？"莫根施特恩问道。

哈莱维不仅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他，还把自己说成肯纳德·贝伦森未来在以色列的代表。莫根施特恩一把抓住哈莱维的手，两人的手就这样相互紧握了一阵。原来，莫根施特恩读过肯纳德·贝伦森的书，书中那些干巴巴的数字在他听来犹如美妙的音乐。他称贝伦森为"肯纳德"，还谈到被他抛弃在美国的未婚妻——一个他在瑞士结交的年轻姑娘，谈到在一间满是镜子的大厅内一些女孩子为他跳裸体舞，谈到贝伦森非常敬重他的母亲，一些皇亲国戚为他举行宴会。他可以自由进出世界上最显

赫的大人物的宅邸，如奥本海默的家、罗特希尔德的家等等……

“他将亲自前来主持在以色列举行的第一次肯·贝协会会议，”哈莱维向莫根施特恩提供了这一信息之后，又补充说，发售肯·贝协会股票的全部收入都将在以色列投资，一个子儿也不会花在别的地方。这还不算，其他国家的钱也将转到以色列。外国大亨将紧随贝伦森之后，纷纷到以色列来。到那时，以色列的经济就会像长了翅膀似地腾飞起来！

哈莱维同莫根施特恩敲定，等他的病一好，他就立即把钱转到我们银行来购买肯·贝协会的股票。此事谈妥后，他又回到了齐波里床边的座位上来。他还保证要为莫根施特恩弄一张参加即将召开的会议的请柬，并把他介绍给与会的肯·贝协会高级经理人员。

“太走运了！”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从口袋里掏出肖莎娜开列的那张单子。

齐波里借助床边的绳子慢慢躺了下来，神情显得很倦怠。这时，第三个患者，即那个俄国人，走进来了。他朝齐波里眨了眨眼，便走了过去，他那挺直的身板连一个多余的动作都不肯做。

“一个禁欲主义者，你们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吧？”齐波里的声音很轻，好像怕他听见似的。接着，他又示意我们凑近一点儿，继续说道：“在沙皇军队中当过军官。全家都被布尔什维克处决了。同他妻子一起逃到德国。又从纳粹手下跑出来，取道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来到巴勒斯坦。流亡在我们中间的时间已经超过四分之一世纪了。这些年一直在海军中当工程师。”

“他有钱吗？”哈莱维问。

“他们只发给他一丁点养老金，连喝粥都不够。但他妻子搞些梵文手稿的翻译。”我们又凑近了一些，齐波里向我们透露了

他向那俄国人和他妻子作的许诺：让他们住到老人院去，由他负责其余生中的需要。“他们能从微薄的养老金中拿出多少就交多少，那俄国人将教我如何战胜疼痛和克服对死的恐惧。”

“你太太知道这个交易吗？”哈莱维问。看来这是提及清单问题的恰当时机。但是，齐波里再次借助绳子坐了起来。“他也是明天做手术，”他不理睬哈莱维的问题，自顾自地说。接着，他又大声朝对方说：“路德维希·库托夫，你太太来过了。她等不及了，得赶紧回去喂猫咪。”他的意思是让我们好好看看这位摆脱了对死的恐怖的人。库托夫平躺在那里，面前放了一个棋盘。他在完全凭着记忆自己跟自己下棋。

“起初你太太拿不定主意，”齐波里继续说。“但后来，想必还是觉得猫咪比你更重要。”接着，他压低声音对我们说，这个俄国人和他妻子都对自己以后的安葬问题大伤脑筋。他们已经同一名东正教牧师签了合同，但那牧师原来是克里姆林宫的一个伪装的特工。他们不想再次落入克格勃的手中。所有这一切，齐波里都是在有一天一名患者——一名占星术士——给其他患者算命时了解到的。库托夫向那个术士问到自己死后会葬在哪里。这是他魂牵梦萦的问题。“两位朋友，也许你们能给他提个好建议，”齐波里得出这样的结论。

哈莱维展开了那个清单，但就在这时，那俄国人手里拿着棋盘加入了谈话。“埃内斯蒂娜对你们说起了猫咪的事吗？”他问道。此人个子很高，骨骼粗大，十分健硕。齐波里把我们的名字告诉了他之后，又进一步向我们披露了他的一些背景：库托夫的父亲修过横贯俄罗斯的铁路，懂得爱因斯坦的理论，是一个研究托尔斯泰的学者、涅夫斯基的后代。“曾骑马伴随过沙皇哩！”他补充说。

接着，库托夫讲起，他和他太太有一天往窗外望的时候，看

见一帮孩子在把一个黑球踢来踢去。后来他们意识到那黑球是一只猫，埃内斯蒂娜便急忙跑出去，把它抱回家。

莫根施特恩也凑过来听我们在谈什么。他的手又小又胖，手中拿着的那张公报上的油渍清晰可见。库托夫把棋盘放到齐波里的床上，重新又陷入了沉默。

这时，索洛米尔进来了。他掀了掀帽子向大家致意，抖掉没系扣子的皮大衣，然后便从库托夫身旁走过来，把刚从大衣兜里掏出的一张纸放到了棋盘上。他显然非常着急，一副时间很紧迫的样子。“她想知道在哪儿，其余的钱在哪儿，”他说。

齐波里把那张纸举到眼前。他用一根手指与字行交叉移动，而他的嘴唇却沿着纸边移动。他把那张纸放低了些，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望着我们。他的嘴角在抽搐，好像有一个点在跳动。哈莱维朝他的椅子探过身去，看了看那张纸。“我也有一张类似的，”他说着把手中已经拿了好一会儿的那张已打开的清单交给了齐波里。

齐波里把两张纸都凑近眼睛，开始对它们进行比较。由于他的脖子和后背都不能动弹，他只好移动那两张纸头。那不是复印件，而是两张单独的清单，都是肖莎娜的笔迹。他把一张纸放在另一张上，对折过来，撕成两半，然后又对折过来，撕成四块。“我在为死做准备，”他说：“可我妻子关心的是什么？我快死了，我妻子却让派人拿着清单到我这里来！我给自己找好了安息地，安息地，安息地……！”

他把那两张单子撕得粉碎，而且还在不停地撕着，显然这样做让他觉得很舒坦。他的嘴角不再抽搐。“女人！女人！钱！”他一边把碎纸撒在床边的地板上，一边大声念叨。毯子上留下了几小片碎纸，他用两个手指像捏死苍蝇似地一片一片地捏起来，扔到地上。突然，他两臂伸向空中，大叫起来：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他从身后抓过枕头，狠狠地掼到地板上，接着开始用力捶他的鞋跟，高声喊道：“我的头边不要有鞋子！”

那俄国人向前走了几步，把两只手放在齐波里的双肩上，轻轻地向下压，直至他躺下来，耗尽力量不再动弹为止。他捡起滑到地上的棋盘，拿到齐波里的面前。他一边摩挲着齐波里的脸颊、擦去脸颊上的泪水，一边像对小孩子那样柔声地说：“咱俩下盘棋吧，你可要把数字记牢啊。”他等了一会儿，然后示意我们离开，喊了一句：“小卒 h 4。”我们站起来，走出病房。我们在向外走时，听到那俄国人又喊出了他的下一步棋。

通过走廊上那一排敞开的门，看到病人们斜靠在床上。走廊不时会有一段是黑漆漆的。索洛米尔打破了沉默，对我们谈起他在齐波里的老人院里当上巡夜人之后不久，就发现了几叠钞票，以及当他把钱拿给肖莎娜看时她几乎昏了过去的事。换了任何别的人，都很容易把那些钱装进自己的腰包，而且谁也不会发觉。自那以后，肖莎娜就紧紧地盯着齐波里喜欢藏钱的所有地方，每天早上、中午、晚上以及临睡前都要检查一遍，确认那些钱没有被动过才放心。

哈莱维对索洛米尔的表现持否定的态度。要不是索洛米尔如此鲁莽行事，他可能早就同齐波里达成某种协议，使他说出其余的钱藏在什么地方了。要有耐心！他自己有多少次靠着对客户的耐心消除了他们的不信任？“有什么必要那么着急让肖莎娜插手此事？”就在我们来医院的路上，哈莱维还曾对自己获得了肖莎娜的心照不宣的信任感到得意哩。她没有同大夫、心理医生、甚至也没有同拉比商谈此事，而是把她的秘密告诉了银行，还把那张清单交给了他。

“我亲爱的索洛米尔先生，操之过急对任何人都不会起作用

的，"他说。在走廊尽头，一位护士叫住了我们。就是那位在齐波里的病房内看到我们但又不知是否应当要我们离开的护士。此刻她客气地同我们打了招呼，然后又把哈莱维叫到一旁。他跟着她走进一间办公室。索洛米尔把皮大衣的扣子系上。那大衣的袖子上镶着棕色和灰色的夹条——是女式的，一定是他在某个地方买来的便宜货。

在休息室内，一些患者在围着一张圆桌打牌。其中有个人手里拿着牌竟睡着了。他很像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把公用电话的听筒凑到耳边的人——鼻子尖尖，下巴低垂。收音机在播报新闻，打牌者吵吵嚷嚷。其中一个人拍了一下那打盹的人的肩膀。那人醒过来，张着的嘴张得更大了。他打出一张牌后，马上又睡着了。

哈莱维和那位护士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竟像老朋友似的道了别。"我会很快打电话来，"她说。见到索洛米尔那询问的表情，哈莱维喜不自胜地回答说："一个新客户。"

对哈莱维来说，下这层楼梯要容易多了。外面的风直接灌进来，门厅内很冷。年轻的女兵仍然坐在那里啜泣。

"在这样一个下雨的夜晚，我们的骑士陪他的恋人到什么地方去来着？"哈莱维转向索洛米尔问道，并同时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还有一种幸福感。他的坏情绪从来都是转瞬即逝的。

"送她去同朋友打牌，"索洛米尔回答说。

"还有你的博物馆开幕的事，定在什么时候？"

"问他吧，"索洛米尔说着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

开幕式的请柬都已经打好，只要填上日期和时间便可以了。索洛米尔已答应德沃拉·米肖里要把捆画的绳子解下来，把画全都挂到各个房间内，然后再带她到他新建的画廊去参观一下。

我在他的院子里见到德沃拉的那天，他让我作了他打算兑现他对她的许诺的见证人，还邀我分享了他为贵客准备的食物。穿着一身黄色的衣服、足蹬一双锃亮的浅色皮鞋的他把我们带到了小矮屋，并在门口躬身向我们做了一个很夸张的欢迎姿势。屋内弥漫着正烧着的饭菜的香味。索洛米尔还把他床上的亚麻床单换了下来，铺上了德沃拉送给他的那包书里装着的新床单。桌子旁边已没有空地儿，德沃拉坐到了床上。由于临时增加了客人，索洛米尔的刀叉不够用，碟子也少一只。他自己干脆直接从锅里喝汤：把锅沿的一侧抬高一点，咕嘟咕嘟地喝起来。这时，他的眼光落到了德沃拉给他带来的一本书上。他翻开扉页，出声地把书名《斯宾诺莎的道德观》读了出来，还把其中的一条定理朗读了一遍。他仔细地看了贴在封面上的斯宾诺莎像，发现德沃拉与这位阿姆斯特丹的哲学家有点相像——那发型、那微笑、那眼神。于是，他便以“斯宾诺莎小妹”称呼她。

当德沃拉把双脚放到床上时，索洛米尔向我暗示是我该告退的时候了，而且，就在我穿上大衣往外走的时候，他站在德沃拉身边，对她滔滔不绝地讲起斯宾诺莎的神学概念来。

我们三个人离开医院来到汽车站时，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我们竖着衣领站在屋檐下，谁也不说一句话。每个人都在等待着把自己送回家去的公共汽车。

第三章
在去看望里默尔的途中

索洛米尔来了，他要带我去看看耶胡舒阿·里默尔住的地方。银行需要里默尔的签字，然后才能用他的钱购买肯·贝协会的股票。他已经不在电影院门口的台阶上卖面包圈了，但是没有留下转信的地址，说邮差是不可能找到他那个地方的。他住在镇上的贫民区内，索洛米尔离他不远，而当时他自己也正好要回家。德沃拉·米肖里正在他家里等他呢。她请了几天假，帮他打扫他的小屋。"她也把我给彻底清理干净了，"他补充说。她的钱已经从特拉维夫的银行转到了我们银行。索洛米尔想让她投到他的博物馆和图书馆里。一旦她成为一个正式伙伴，他们就可以在其他城市开办图书馆了。但是，德沃拉用她的钱买了肯·贝协会的股票，而且，哈莱维给她看过一些图表，那些图表表明她正在获得多少利润。"他干吗要管那么多闲事，净往她脑子里灌各种各样的花言巧语！"索洛米尔一边嘟囔着，一边把腋下的包夹得更紧些。

我们穿过没有围墙、堆满污物的后院，沿着狭窄的小路向前走。一辆汽车开过来，逼得我们只好把后背紧贴着墙。地上有一只被轧死的猫。它那被碾碎的皮已经干了，平铺在沥青路面上；大张着的嘴里还看得见牙齿。从垃圾箱里跳出一只接一只

肚皮松弛的花猫。坡下的山谷中，有些人住在棚屋和牲口棚内。我们从一块空地朝下面望去，看到的是一些胡乱搭建的屋顶，屋顶上布满石头、铁棍和一块块的木头。一块翘起的锡板在风中忽闪忽闪地摇晃。一些房子的墙皮都已剥落，用湿灰浆补的东一块西一块的。一扇窗户上挡着花窗帘，很惹人注目。一个有围墙的院里长着一棵树，树枝的顶部已触到我们旁边的那道矮墙。我们听到那个后院内有个男人在叫嚷，有只狗在狂吠。那天风很大。海风把浓淡相间的云彩吹散，显露出一片片晴朗的蓝天。

“他变得很厉害，”索洛米尔一边从石墙上探过身子往下看一边说。他在想哈莱维的事。

“他眼睛盯着肯·贝协会的那个职务，”我说着，同时也在往下面看。那棵树秃光光的。一个老头和一只狗在彼此对嚷着。

“那个差事实际上不就是他在干吗？”索洛米尔问。

哈莱维那天在医院里向莫迪凯·莫根施特恩作自我介绍时自称为肯纳德·贝伦森的代表，这未免言过其实了。还有几个人在争取这个职位，他们都在推销肯·贝协会股票，力争超过另外几个对手。竞争大大加剧了，而哈莱维无法知道其余几个人的成绩如何。但是，他老觉得自己落后了，因此他的情绪总是由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有时，他干着干着事情，会突然站起来，拍着脑袋朝窗外望。有时，他口授别人写信给瑞士，但那些信从来没有寄出过，而是放到那只塞满未处理文件的抽屉。过一两天又会口授一封。他老是把写字桌上的各种物件挪来挪去——台历啦，名片啦，电话旁边的那盆仙人掌啦。那三截仙人掌又长起来了，于是阿纳钦送了一棵给哈莱维。哈莱维开始根据客户对肯纳德·贝伦森协会的态度来评价他们。他们买没买肯·贝协会股票？有时他会陷入一种哲学意境，引述《传道书》中的

这样一句话:"一个人从他的劳动中得到了什么利益?"再不就抓住某人的胳膊,问人家听说过肯纳德·贝伦森这个人没有。

"他几时会到这里来?"索洛米尔问道。他自己也在等待肯纳德·贝伦森,好同他谈谈他的博物馆和图书馆的事,同时也谈谈依地语在这个国家的总的状况。他心中盘算着,将来钱多了,可以干成一些大事。他听哈莱维说,由于贝伦森出面阻止,波士顿交响乐团、瑞士的一家演出公司和特拉维夫歌剧团才得以避免被解散的命运。索洛米尔已经想好了他的博物馆的名称,展品的详细目录也即将整理完毕。

"肯·贝协会会议定于夏天举行,"我说。在两度推迟之后,会期终于确定下来了。正因为如此,我们忙得不可开交。每天早上,我们都比其他职员早上班,而且每天都要加班加点才能把眼前必须做的事情处理完,不太紧的工作都推到以后再说了。以前,我们早上来后的第一件事是清理积压的文书,现在这项工作已经免掉了。就连比较紧迫的事情我们也一下子顾不上了。那些塞满各种颜色的文书、未剪下的息票、未回复的信件的抽屉我们根本不打开了。我也不再向那些已故的客户发通知要他们到银行来领取盖了"只限本人领取"印章的债券了。

"那些事都可以缓缓再办,"哈莱维小声嘟囔着说。

还在乘车来上班的路上,我的脑子里就浮现出我们银行内一大早那种祥和景象了:我刚一把门关上,就直往我鼻孔里灌的那一股消毒水和陈旧纸张的气味;一张张还没有人坐的光滑干净的写字桌;罩着灰色和绿色塑料套的打字机和计算器;长着一口暴牙的红头发看门人一大早就坐在桌子旁填写足球博彩票。在他对面,隔着一道铁栅,出纳员忙着为保险柜准备钞票。就像一个进行默祷的犹太人那样,他一边数着钱一边用眼睛扫视着大厅内的桌子和墙壁,嘴唇随着拇指一张张捻数钞票而不出声

地翕动着。从隔栅中间可以看到，他那昂起的脸会不时地处于静止状态——尽管眼睛仍在不停地转动。这时，他嘴巴四周的黑色短髭就呈现出“〇”的形状。有时，这两个人会心不在焉地相互对视，直至那位出纳一边数着钱一边打一个大哈欠，脸上再次出现一个大“〇”。这清晨时分的大厅内，充满着湿气和凉气。保险柜上方那只圆钟旁边的日历仍显示着昨天的日期。

索洛米尔挺了挺身子。树根旁的一只装满被丢弃的书籍的箱子引起了他的注意。要不是因为那个被惹火的老头子和他的狗的狂叫，他本来会上前询问那箱子里是否有依地语书籍的。他仍然与我并肩而行，只不过是走走停停的。有时他会停下来回忆某个单词，有时会转个方向去找一个过路的人，有时又会到垃圾堆里去翻找可供他的博物馆陈列的东西。他的脑子里总是同时装着太多的事情——德沃拉·米肖里的钱仍没弄到手，里默尔近来老是不在家。他本想让里默尔与他合伙办博物馆和图书馆。他打算趁着里默尔的钱还放在银行里，没有投到肯·贝协会股票中去的时候同他谈谈这件事。即便没有里默尔的钱，哈莱维也完全可以凑合。一旦他加入了肯·贝协会，他反正是要离开这个小城的。再说，他已经为哈莱维提供了不少客户。索洛米尔想知道的是：“他现在还把银行的利益放在心上吗？”

每天清晨，哈莱维到银行后来不及脱掉大衣也来不及坐下，便要把肯·贝协会股民的名单浏览一遍。我也总是紧挨着他，眼睛随着他的手指由上到下、再由下到上地移动。他的手指有时移动很快，有时移动很慢，这要视他当时的情绪而定。他相信，有了这么长的一个股民名单，肯纳德·贝伦森认真考虑他担任驻以色列代表的候选资格这不是不可能的，说不定还会把他提升到高级经理的职位上呢！倘若如此，他就会常常出没于伦敦、法兰克福和苏黎士这些地方了。他甚至把我也列入了他的计划。

"我们将成为全城人谈论的对象，"他不止一次这样对我说。而且，如果他奉派到纽约去的话，他会让我到那里去当他的助手。他曾多次向我许诺过："我不会忘了你的。我会让你扬名立万。"有一次，当我把澳大利亚金融家、在贫民区内拥有一些房产的莱布·西尔弗带到银行来的时候，哈莱维当着他的面对我的功劳和忠诚赞扬备至。当他得知西尔弗和我多年前在墨尔本就是好朋友时，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向西尔弗保证我会前途无量："不论我到哪里去，他都会跟我一起走的。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

就连阿纳钦在从哈莱维那里听说我同澳大利亚百万富翁有交情之后，也一边装着烟斗一边凑到我的写字桌旁。他扬起眉毛，狡黠地眨着眼睛，故作严肃地责怪我有这么重要的信息居然瞒着他。他嚷道："嘿，你注定是个前程远大的人！"他的声音很大，银行的一半职员都听见了。

我们从一个宽敞的大院旁边走过。院子里的一片被践踏的草地上，泥泞的小路纵横交错。在一些大石头的周围，一年前的蓟草虽然枯萎得只剩下尖尖的草茎，但却依旧迎风直立。一个裹着披巾只能看见脸的老头坐在一个大石头上，一声不响地盯着我们。

"哈莱维为什么不把阿纳钦弄到他那个部门去呢？"索洛米尔提议道。"要是那样，你们就不至于忙得如此不可开交了。"

"阿纳钦不肯与我们共事。"

"是不肯屈尊吗？"索洛米尔问。他在我们银行里非常随便。如果我们太忙，他就坐在阿纳钦桌旁。与所有员工一样，会有人给他上茶，而且他还常常就钱的问题出一些主意。他知道阿纳钦对股市问题很在行，也知道他在参与股市交易方面陷得多么深。

“不，是出于道德考虑，”我说。在乘公共汽车去上班的路上，阿纳钦和我已经并排而坐了。他后来对我说起他对两家保险公司的股份进行的一项研究。他把自己的论文提交给为纪念维利·阿夫尼-施泰纳而举办的一次竞赛。论文的小标题依次是“它们的兴起”、“它们的发展”和“它们的衰落”。哈莱维一直鼓励他参加比赛。他是那次比赛的评委，而且说服阿夫尼-施泰纳家族向获胜者颁发优厚的奖金。举办那次比赛的目的是把年轻的一代吸引到股市交易所来。哈莱维还表示愿意在我们那个部门为阿纳钦谋得一个职位，一旦他离开银行到肯纳德·贝伦森协会去供职，处在那个职位上的阿纳钦就很有希望升迁和获得大幅度加薪。但是阿纳钦谢绝了。他认为，在他本人进行股票交易的时候，由他来向别人提建议是不道德的事情。他知道有不少人由于赤裸裸地牟取私利而吃了苦头。但是，我们急需有经验的职员，而且没有时间去教会没经验的人了解这项工作的种种细节。阿纳钦的保留态度使哈莱维很生气，他提醒阿纳钦注意：实际上他并不是在做股票交易，而只是在做股票交易的尝试。他这番话在他们之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口角。在阿纳钦看来，进行股票交易同进行股票交易的尝试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他决不打算牺牲他的原则去换取加薪和升迁。

他同哈莱维争吵后的次日，当我在公共汽车上背对着阿纳钦从他旁边侧身走过时，我感到他拉了拉我的衣袖。“请坐！”他边说边急急忙忙地把铺开在膝盖上的报纸卷起来。他预感到哈莱维会报复他，在纪念阿夫尼-施泰纳的论文比赛中不投他的票。这与他本人的正义感是背道而驰的。毕竟，他为研究那两家公司的股票花费了那么多时间。这两种股票甚至进入了他的睡梦中。他梦见自己在股票上不停地爬行，就像爬在尖尖的石块上。股票和股份的确已经渗透到他的肌体之中了。但哈莱维

并不因此而有权利要他做些不道德的事情。他只是为未来退休时着想才花费这么多年的时间研究特拉维夫股票交易所各种股票的表现。

"哈莱维的确没投他的票,"索洛米尔说罢便放开我的手臂,扫视了一下那个大院。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同坐在石头上的那个老者打招呼,还对我说,过一会儿他会把那老头的事情讲给我听。那老者没有理睬他的问候。他两腿前伸坐在石头上,使他那双已穿烂的旧鞋刚换过的鞋底更加显眼。如同他的鞋一样,他这个人也显得十分苍老,红兮兮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俨如一只被冻僵了的拳头。

"谁得了头等奖?"索洛米尔问。

"阿莫斯·沙伊。"

"他是何许人?"

"是特拉维夫的一名年轻的职员。"

"是哈莱维在老人院中赞不绝口的那位吗?"

哈莱维在银行里也曾对那人赞不绝口过。一天清晨,他把一张剪报放在我的桌子上,要我读一读那篇题为《面对着股票交易所的年轻一代》的文章。阿莫斯·沙伊的照片下面有这样一段说明:这个年轻人的雄心是"把他的客户的口袋里装满钱"。

"这很像我年轻时的样子,"哈莱维指着这位身穿开领白衬衫、相貌英俊的年轻人的照片这样说。连他脸上的表情也像照片上的人一样坦诚。文章说,阿莫斯·沙伊"一天二十四小时所吸入的都是股票交易所的紧张空气",他的年轻的妻子"也与他一道融入这种气氛之中"。哈莱维把一只脚放在椅子上,在出纳员和看门人面前演习起他要在老人院发表的演讲来。

哈伊姆·齐波里出院后,哈莱维和戴维·奥拉米一起发表了演讲。哈莱维谈到特拉维夫股票交易所的未来,奥拉米则大讲

在欧洲的犹太人墓地的现状。聚集在老人院食堂中的听众不算少，其中包括住在附近一所宾馆中的客人、一位来自耶路撒冷的游客、一位坐轮椅的残疾人，还有一位本·古里安第一任政府中的前部长。哈莱维称股票市场是国家局势的敏感的晴雨表，说至关重要的事情是目前还在执掌大权的那些老派人物要给年轻一代让路，还强烈呼吁把股票交易所的大门向年轻人敞开。“难道我们还生活在俾斯麦时代吗?”他向听众问道。

索洛米尔开始对奥拉米另眼相看了。此前，他不敢同奥拉米沾边，惟恐染上他的忧郁。然而，奥拉米的讲话感动了他，到那次演讲会结束时，竟邀请他到自己的博物馆去看看那里收藏的碑石。

“结果呢?”我问。

此时我们正从一座已坍塌的房子前面经过。那房子只剩下两堵墙，旁边还有半截土路。

戴维·奥拉米对他所看到的索洛米尔的收藏品并不怎么赞赏。他躬着背，板着脸，缓步而行。一会儿走到这个碑石前，一会儿走到那块碑石前；一会儿看看正面，一会儿看看反面。但他认为，墓碑是很私人的物件，在陌生的环境中会失去它们的私人属性。“他连一块钱也不能借给我，”索洛米尔补充说。

像哈莱维一样，戴维·奥拉米也寄语年轻的一代，呼吁他们重视先辈留下的古老文化。他谈到他拜谒过的墓地，还借助幻灯介绍了他在那些墓地看到的景象。一张幻灯片记录了他在海涅祖母的墓旁诵读犹太教祈祷文的情景。在他祈祷的过程中，一名非犹太教徒不时插入虔诚的“阿门”。那是在汉诺威市。在另一张幻灯片中，奥拉米站在一块刻着罗特希尔德的名字的墓碑旁，名字的下方用比较小的字体刻着：“城里的非犹太人将这位市民——阿德勒布森市最后一位犹太人——葬在这里。”华沙

的那座墓地位于一片松树林内，通往墓地的道路已被厚厚的松针所掩盖。负责放幻灯的是丽达·奥拉米。

奥拉米夫妇从欧洲回来后，丽达便背着她丈夫，用卖掉一些土地和在本亚米纳的一套公寓换来的钱和通过模仿奥拉米的签字取出的钱买了肯·贝协会的股票。这些钱全都是现金，所以别人不会知道钱是从哪里来的。她是把自己手袋中的粉饼、口红、香水等女人手袋中少不了的东西倒出去，把钱装到手袋里拿到我们银行来的。我把她领到隔壁堆满文件纸张的房间里，当着她的面把钱点数了一遍。

"他的病没好，"她对哈莱维说。"还是忧郁症，只是换了一种伪装而已。"

自打做起肯·贝协会股票交易之后，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不再那样矜持了，对哈莱维已开始以教名相称，也不再把头发染成蓝色了，而且还患了失眠症。遇到下大雨的日子，她无法到银行来，便不停地打电话询问她的股票是否涨价了。直到这时，她才明白什么叫金钱癖缠身。有时她会提着装满钱的手袋，风风火火地走进银行。这时，不论我正在干什么，我都得停下手中的活儿，把她领到我的写字桌后面的那间小屋子里。那间屋子到处堆放着塞满文件的箱子、盒子和架子。但丽达看来并不在乎它的杂乱，只要没有人知道她在那里数钱就行。我以东方方式蹲在那里，她则坐在一只卖牛奶的小铺子里常见的那种高凳上。

"现在我们老是吵架，"她说。

我还没把一只口袋里的钱数完，她就把手伸到手袋里去掏另一只口袋。由于没有其他人在场，所以她就对我讲起那些旅行是如何令她筋疲力尽。奥拉米的脾气变得很坏，而且报复心很强。她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再使他满意了，她说的每一句话

都会遭到他的抢白。他们经常怀着怨恨默默地行走于墓碑之间。只是在切斯特乔夫他才恢复了往昔的好性情。那天他们遇到了一位年轻的非犹太妇女,她带着女儿在丈夫墓前默哀。奥拉米为死者的灵魂吟诵了送葬祷文,留下了那年轻寡妇的住址,而且那一整天对她丽达也表现得很温柔。

“他向一座寺院捐赠了很大一笔钱,”索洛米尔说,“让那里的和尚去照管犹太人的墓穴。”关于此举是否明智,老人院里的人颇有异议。他们悲叹道:“瞧他把我们犹太人的历史交给什么人去掌管了!”

丽达·奥拉米也提到过这件事。但从她在高凳上的坐姿中就可以看出她对此并不介意:她一只脚放在地板上,另一只高翘着,还在神经质地不停摇晃。她早已不再抱怨家中无人可以讨教或者无人可以敞开心扉了。她也不需要有什么知心朋友来向之倾诉心中的隐秘。只要不花她的钱,由波兰神甫来照看犹太人坟墓就不关她的事!美国那么富,完全有条件雇用照料在欧洲的犹太人坟墓所需要的全部护卫——尽管一个集团军的人力也不见得够用!奥拉米打算拍一部介绍在欧洲的所有犹太人墓地的电影,以便引起世人的注意和愤怒。在波兰的某个偏僻之地,她把他扔在一座墓地的中间,自己开着车回到下榻的饭店。“我要和你离婚!”他在她后面大声嚷道。

丽达·奥拉米会呆在那间小屋子里等着,直至我把她的钱锁进我们的保险柜后,提着那个空手袋回来。她从皮大衣的口袋里把粉饼、化装包、镀银梳子、香水瓶和各种手饰掏出来,再放回手袋内。有一次,一串珍珠从她手中溜下来。看到我伸手接住并加倍小心地递到她手中,她不由得笑起来。这些珍珠在我看来无疑是非常珍贵的。“这是假的,”她说。她把那串真的卖了。为了不让她丈夫生疑,她买了一串看起来与原先那串一模一样

的赝品。在举行演讲会的那天晚上，她又交给哈莱维两口袋钞票，并在第二天到银行来取走收据。

“最近她疯得不得了，甚至找了一个情人，”索洛米尔说。

“那是个什么人？”

索洛米尔把头伸进后院的一个缺口。那院子有一半地方挂满晾晒的衣服。一块窗玻璃上贴着一本妇女时装杂志中的彩页，窗户后面可以看到一张人脸的一部分。房子的外墙上歪歪扭扭地用油漆刷着“制衣店”这几个字。我以为他会回答我提的问题，但哈莱维在他的脑子里仍然占据着首位。在老人院的那天晚上，他得到的印象是哈莱维已经成了肯·贝协会的一位名副其实的经理了。但当时哈莱维还不知道阿莫斯·沙伊本人也在争取那个职位。一家报纸报道说，肯纳德·贝伦森已亲自向沙伊许诺要把该协会驻以色列代表的位子给他。阿莫斯·沙伊也援引过哈莱维呼吁在股市问题上让年轻一代拥有发言权的讲话。他在致哈莱维的一封信中曾要求他给予特别推荐。

自那以后，我们银行中就没有人再提及阿莫斯·沙伊了。哈莱维和阿纳钦又和好了。工作不忙时他们会默默地坐在一起，就像刚刚进行过一番长谈似的。这时，他们中的一位吸他的烟斗，另一位则轻拍自己的秃顶，两人时而会撇撇嘴角，露出不自然的微笑。有时我也会坐到他们旁边，听他们谈论生与死的话题：人上了年纪就已经够糟糕的了，要是又老又有病，那就更糟了，更不要说得上那种久缠病床又求死不能的病了。“你的上司是一位哲学家呢，”阿纳钦有时会对我这样说。

哈莱维现在经常冷不丁地向我提出一些问题。有时，正当我忙于某项工作之际，他会走到我身后，看看我在干什么，然后问我在澳大利亚时是做什么工作的，或者问我澳大利亚的银行是否享有特殊地位，或者问及有关基布兹中的生活方式的问题。

到傍晚该下班时，他会拉开一个抽屉，在里面的过期纸头中翻找一通，抬起一摞文件的边角，从中抽出某人于多年前写给我们但一直没处理的一封信，仔细研究信末的署名和日期。

索洛米尔踩到一个坑里，摔了一跤。我把他扶起来，捡起从他腋下滑下来的那个包裹，交还给他。

“包里包的是什么？”

“是给韦格的礼物。”

韦格已经好几天没到齐波里的花园里来上班了。他住的地方离里默尔不远，索洛米尔想把那个包留在里默尔那里。“是一双旧雨靴，”索洛米尔补充了一句。

我也设法为韦格搞到了一双雨靴，可惜小了一点。

“我给他弄到的这一双，他可以在里面游泳了。”

索洛米尔是在路德维希·库托夫的住处弄到这双靴子的。那天他和哈伊姆·齐波里到那里去察看库托夫家都有些什么东西，告诉他们在往老人院搬的时候哪些东西值得带走。路德维希·库托夫手术后又住了几个星期的医院。哈伊姆·齐波里没做手术。在我们去探视他的第二天，他发了高烧，手术便被推迟了。不过，他现在好多了，所以被暂时允许出院了。

肖莎娜坚决反对让库托夫夫妇搬到老人院来。据她估算，他们那点微薄的养老金加上他们应得的国民保险费根本不够他们的开销，更别说赚钱了。她气愤至极。齐波里不仅直到现在也不肯把其余的钱藏在什么地方告诉她，而且现在还死命要以低于半价的收费把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弄到老人院来！这根本不符合他的天性！肯定是那个俄国人用催眠术把他弄迷糊了，使他应承下来的。她竭尽全力要打掉这个计划，调动了整个家族的人来帮忙：她给远在美国的儿子写信，要他回来同他父亲谈一谈，还劝说她丈夫的一个侄女从加拿大到这里来，说服她的叔叔

放弃这个打算。齐波里向他那位年轻漂亮的侄女透露，那些钱一分没少地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到时候他自会主动讲出来藏在哪里。他想知道，难道一个男子汉如今已经没有权利保守自己的秘密了吗？但是肖莎娜快要失去耐心了。她的脑子里整天装着这个问题；即便当她在考虑其他问题时，她的眼睛也在不停地东转西转。有时，正同人说着话，她的眼睛就被衣柜或其他家具顶上的一个什么东西吸引住了。这时她会把它牢牢记住，过一会儿要搜寻一番——说不定那里会藏着什么呢——尽管有时会发现自己以前已经搜过那个地方了。有时还有这样的情形：在她刚要入睡之际，她突然想起扔在某间后屋的某件东西。于是，她便会真的从床上爬起来，前去搜寻一番，结果却发现那东西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她现在已经不知道自己该向谁讲心里话、不该向谁讲心里话了。不过她确曾把一位拉比对她讲过的话告诉了老人院的厨子。她曾要求那位拉比去探望齐波里，好好教训教训他。她保证，如果拉比能说服齐波里不再把钱藏起来，而且把他在医院里被库托夫灌输的那套罗马人的哲学从他头脑里清除掉，她将从找到的钱中拿出百分之十捐献给慈善机构。齐波里出院时穿了一件天知道从哪里弄来的罗马官服，而且回来后便开始奉劝老人院中的人开始过自制的生活，用一颗平常心去看待一切事物，因为归根到底，生活不过是由一些虚幻的东西所构成的。"那些罗马人就不能想出些好点的东西吗？"她向拉比问道。那位拉比本人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打着现代领带的高个子青年，已是六个孩子的父亲。他向她解释说，这不是罗马人想出来的，比罗马人早几百年的所罗门王就讲过"万物皆空"的道理，说着他便不假思索地翻开了《圣经》，把写有那段话的地方指给她看。他的手纤细柔软，手指修长。只是出于对他的尊重她才没有反驳他。她算老几，

竟敢对拉比的博学提出疑问？但是，如果换了别人，她就会问：所罗门王是否因为参透了这一点而让出了他的宫殿、散尽他的金银财宝或者放弃了他的众多后妃或赛马？她还曾向一位当心理医生的远亲讨教过。她对他说，路德维希·库托夫和埃内斯蒂娜·库托夫根本不是俄国名字，这两口子甚至可能是装成俄国人的德国人。德国人把她家族中的大多数人都杀害了，她可不想把反犹分子或沙皇的任何亲戚弄到她的房子里来。她希望那位心理医生证明哈伊姆·齐波里精神不正常，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现在连死都不怕了，"她对那医生说。

"是一位律师给她出了个好主意，"索洛米尔说。他告诉她可以怎样利用齐波里的病。首先，他建议她去弄一份证实齐波里有病的证明。有了这样一份文件，就可以争取到各种免税待遇。例如，众所周知，进口汽车的关税往往比在国外买车高出好多倍。因此，律师建议她去开一张医疗证明，然后把那辆旧车卖掉。有了这样一份文件，他们就可以买一辆崭新的车子——Sedan牌、雪佛莱牌、沃尔沃牌，随你买什么牌都行——关税将是微不足道的。用这样一桩买卖带来的进项充抵依旧藏匿着的无论多少钱，都一定会绰绰有余。残障程度越高越好，最好是百分之百的残障。现在，填写表格和向政府的各个部门申请高免税率已经成了哈伊姆·齐波里的主要工作。必要时肖莎娜还会亲自出马。起初他们得到了百分之四十的免税率。那天晚上她在坐下来听演讲之前对哈莱维说，他们刚刚得到了百分之六十的免税率。

索洛米尔打开包裹，让我看他从库托夫那里找来的靴子。库托夫夫妇住在山上一座老楼内。楼内有一套建有拱形窗户、屋顶很高的房子，他们住着其中的两个房间。房间内所有物件都笼罩在一种单调而俭朴的氛围之中。家具是深色的，笨重而

又陈旧,是很久以前买来的二手货。厨房用品布满凹痕,而且被煤烟熏得很黑。他们的全部内衣和外衣用两三个手提箱足可装下,但书籍和鞋子却很多。两只书箱内装满了拉丁文、希腊文、俄文和德文古书,德文书用的是老式字体。有些书背面的烫金字母仍然闪闪发亮,另一些的封面看来却已发霉,蚀迹斑斑。然而,装在第三只箱子里的那些靴子却全都擦得锃亮。那里面各式各样的靴子都有,有的是打猎时穿的,有的是接受检阅时穿的。库托夫还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扈从中的一名年轻军官时,就开始收集靴子了。由于他是从布尔什维克政权下逃出来的,所以有一大批收藏品都留在了俄国。他对收藏的酷爱就是在出逃之后也不曾稍减,这些年中他又有了一批新的收藏。

"看得出来,你在这方面是个行家,"看到我仔细审视打算送给韦格的那双军靴——那绑腿、那铜扣、那鞋钩和鞋眼、还有那皮条——而且用力闻了闻那真皮和做鞋用的胶水的气味,索洛米尔这样说。到这时,我对索洛米尔的童年也有了一些了解,因为他为了证明自己并没有无所事事地浪费时间,有时会打开德沃拉送给他的录音机,让我听他录下来的讲述他的往事的录音。他的父亲是个蜡烛匠,但更喜欢酒瓶子。没过多久,"酒鬼伊德尔"就比"蜡烛匠伊德尔"更闻名了。索洛米尔满十一岁时,他妈妈给了他一个大面包,把他送上一列开往大城市的火车,让他到那里谋生去了。她还把她精心保存了这么多年的传家之宝——拿破仑时代的一枚系着蓝绶带的金质奖章挂到他的脖子上,为的是使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能有所依靠。

这时,那双靴子已经由我拿了一会儿了。他在库托夫家看到的那些书使他想起了自己的收藏品。那些东西至今仍然堆在他那座小房子的各个房间内。他既缺时间又缺钱。由于缺少时间,他连寻找希娜·罗歇尔都顾不上了。尽管他一度几乎查到了

她的踪迹，但后来又断了线索。至于钱的问题，德沃拉不肯当他的伙伴。他希望她至少能借点钱给他，他甚至准备付给她利息，让他好歹把他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开幕的日期确定下来。但是德沃拉一个钱也不肯借，说拉辛在世时告诉她决不要动那老本。他苦苦地对她解释说，自拉辛去世到现在，那本金已经生了好多利息，大概比本金还要多了。可他怎么说也没有用。德沃拉永远也搞不清楚她自己的账目。她分不清什么是本金，什么是利息，也不知道哪些是本、哪些是利。拉辛在世时她还多少明白一些，可他去世后她就全都忘光了。在她看来，最近的总数永远都是那个碰不得的本金。“同死人打交道真不是件容易事!”索洛米尔说着接过了那个包裹。光是德沃拉，他也许还能谈得拢，但他现在要对付的是在有关她的钱的问题上仍然在为她制订法律的拉辛。他用各种脏话咒他骂他，说基布兹让他去逮苍蝇真是太对了，他也只适合干这种营生。“只是一堆可悲的骨头!”他嘟哝着说。

我们去敲韦格的门时，他已经睡下了。他穿着很暖和的长睡裤和很厚的毛袜子，站在那里把我们让进屋去。然后他走到床边，坐到床沿上，等待我们说明来意。索洛米尔把包裹放到桌子上，开始察看他的房间。他一会儿往微开着门、里面空空如也的衣柜后面看看，一会儿从地板上捡起一张德文报纸，一会儿又把脸凑近挂在墙上的洋葱状的挂钟。“这位女士是谁?”他从一个架子上拿起一帧镶在镜框里的照片问道。没等对方回答，他又把一只锅的盖子打开，嗅了嗅锅里那几只煮熟又放凉了的土豆。他觉得用不着同韦格客气，因为他们在德国是同时读大学的。当时韦格受到以叔本华为首的悲观派哲学家的影响，索洛米尔却至今仍能整章整章地背出当时十分流行的诗歌。为了能把韦格弄到我们银行里来，他甚至请他吃过一顿饭。他还竭力

邀他正式加入他的博物馆——因为他不想放过哪怕是最小的机会——但韦格对此大摇其头。“生活把他戏弄得太狠了，”他曾这样对我说。

韦格戴上眼镜，从索洛米尔手中接过照片。此时索洛米尔已经坐到一张柳条编的矮脚凳上了。“试试这双靴子吧，”他打开放在膝上的包裹对韦格说。韦格的袜子发出一阵恶臭。他仔细看了看这双靴子，然后弯下身子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手提箱，从箱子里拿出另一双靴子，也就是我拿到银行送给他的那一双，那是我到基布兹去看望一位去世的管理员的遗孀时向她讨来的。

“这双不是太小吗?”索洛米尔不解地望了我一眼。

“他把它们撑大了，现在可以穿了。”

当我在银行里把靴子交给韦格时，他真的很感动。就在我总是替丽达·奥拉米数钱的那间屋子里，他试穿了那双靴子。那一次，哈莱维认定韦格购买肯·贝协会股票的时候到了。所以，韦格刚走出那间小屋，哈莱维就把他叫到自己的桌旁，同他谈起他手中的德国马克的事。就在那天下午，韦格又来到银行，把他账户上的一万马克兑成以色列币。同时，他又拿出一个名单，要我给耶路撒冷盲人协会、海法盲人协会以及另外三个慈善机构开支票，而付款人的名称则写上“匿名捐助者”、“同情之源”和“天佑”等等。哈莱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明显地克制着怒气，把韦格拉到一边，向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他的这些捐款是从本金中拿出来的，还是从利息中拿出来的？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抛撒金钱的？他知道那些协会是什么人办的吗？为什么不先买肯·贝协会的股票，再从赢利中拿钱行善？韦格并没有回答所有的问题。自从他得到战争赔偿金以来，他每年都向盲人协会捐两次款。他还在德国生活时就这样做了。盲人协会收到捐款后总是写来非常热烈的感谢信。后来他又收到

另外一些机构写来的请求捐款的信，尽管他不知道它们是如何搞到他在德国的地址的。这一次，为了对我们为他弄到的靴子表示感谢，他决定提前寄去捐款。

哈莱维告诉韦格，现在有专门买卖捐赠者地址的黑市，地址的价码完全取决于捐赠者的慷慨程度。为了弄到他的地址，那些机构想必付出了很大的价钱。韦格擦了擦眼镜。他的蓝眼睛变得明亮了一些，红鼻子也泛出光泽。他似乎感到很不过意，于是便开始从军大衣的所有口袋里翻找零钱。他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愿意出钱去买他在德国的地址——那只是战前几位老朋友的房子中的一个小阁楼。他曾为那些朋友伺弄花园，他们则向他提供食宿。

哈莱维对他的不可理喻非常生气，简直要发火了。他毫不怀疑，那些既不写真实姓名又没有确切地址、只有信箱号码的所谓的慈善机构，不过是一批骗子而已。他们用一些关于可怜的孤儿、穷困的寡妇以及其他各种不幸者的令人心碎的故事来诱你上钩，然后把骗来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他同韦格谈了很长时间，竭力使他看清周围发生的事情，使他认识到这种骗局所在多有。他应当先调查一下那些机构的可靠性，然后再向它们捐钱。他已经捐了的钱是找不回来了，但他建议韦格先把余下的马克投到肯·贝协会的股票中，然后再把所有这一切查个水落石出。为了使韦格不致把肯·贝协会股票当成名不见股市的无价值的东西，哈莱维特地拿出了已经把全部家财都投到肯·贝协会的那些人的名单给他看。这名单上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有商人、工人、领养老金者、年轻人、寡妇。本地禽肉店老板平沙西克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把他的禽肉店卖掉买了股票。以前他和他妻子一直合不来，经常吵架，时刻有离婚的危险。而现在，他们把禽肉店卖了，把钱投到肯·贝的股票中，夫妻两人靠股票的收

益生活，小日子过得可和美了。卡车司机茨威·明茨和他的妻子格拉也学他们的样子，把卡车卖了，将卖得的钱投到肯·贝协会的股票中，以便尽快赚到钱。医院的一位护士把她的全部积蓄都拿到银行来，要他替她投资，直至她的男友复员，他们可以结婚的时候。富商阿夫尼一施泰纳的一个儿子仿效他父亲理财的精明，自已也开始进行股票交易。"肯纳德·贝伦森协会，"哈莱维总结说，"是一个讲究理性的企业。"

他说的这些人，韦格一个也不认识，因此这个名单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决心。犹太人捐赠钱物向来都是匿名的。这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规矩。一旦他开始怀疑或者产生疑心，他就会感到困惑，不知该相信什么人、不该相信什么人。他从兜里掏出他收到的那些感谢信，但哈莱维连看都不想看。

我开出了五张两千马克的支票，韦格检查了一下，看看支票是否已按要求填好。这样一来，哈莱维就没办法再做任何工作了。他显得心力交瘁。好在当时银行已经关门了，大厅内空无一人，职员也走光了。看门人站在门旁，把挂着那把大锁的铁链缠在手指上。出纳员打开了保险柜上方那盏小小的夜灯。电话不停地响着，但没人接听。大日历上显示的今天的日子现在看来已经过时了。哈莱维拍着他的秃顶，朝窗外的夜色中望了一眼。出纳员和看门人看到哈莱维在自言自语，便装出一副惊恐而又略带不敬的样子。他们无法理解他如此激动究竟为了什么，他不停地称之为"无赖"、"骗子"的究竟是些什么人。

离开韦格的住处时，我们看到了他向之借德文报纸的那位邻居。从后面看，她像是一位少女；但从前面看，她活像一具僵尸。她九十多岁了，而且已经完全失明，所以每天寄给她的报纸全都归韦格了。"他最讨厌的就是女人，"索洛米尔说。韦格有一次向他吐露真言说，他从来没同女人睡过觉，但过后又怒斥他

用一些鲁莽的问题套出他的隐秘。"他总是使别人同他保持距离，"索洛米尔说。他把库托夫的靴子放到韦格的铁床架旁，同时告诉他，他的袜子太臭了。他要不是有急事要办，一定会当场教他一个不用肥皂洗袜子的省钱的办法。

室外的新鲜空气简直令人陶醉。晚风不时送来零星的雨点。远处，落日的余晖穿透云层。索洛米尔看了看表，这才发现时光已经不早了，德沃拉大概已经在家中等着他了。他不应当让她自己呆在那里，因为她有极强的洁癖。她已经把他的一些重要手稿放错了地方——一份他在几年前为一位年轻朋友之死所写的讣告，还有他的自传的开头几页——这两样东西直到今天也没找到。我们当时正朝着索洛米尔的小房子走去。这里离里默尔住的地方不远，但索洛米尔担心我自己找不到。他本人最近到里默尔那里去过好几次，但他都不在家。自从参加了总工会组织的旅行后，里默尔就不着家了，一有机会就去参加免费旅行。

"他如今在公墓已经小有名气了，"索洛米尔说。他曾与里默尔和他那帮乞丐哥儿们一起参加过一次到耶路撒冷去的免费旅行。但他们到了特拉维夫中心汽车站便不再往前走了。乞丐们看到那里那么热闹，便都下了车，不肯再回到车上来继续旅行了。这件事所产生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作用是，从那以后乞丐在我们那座城市就绝迹了。以前想过的各种办法——保证提供非全日就业机会、改善居住条件、甚至准许开小铺——均告失败，而从这次旅行之后，许多乞丐都转到特拉维夫去干他们的营生了。他们每天黎明时分乘头班公共汽车去，晚上十点半才乘末班车回来。"里默尔还在那里找到一个情人呢，"索洛米尔说。

我们往旁边闪了闪，好让诺德尔的马车过去。他把两个手指伸到牙齿中间，吹了一声口哨，示意我们跳上车去。那条小路

是在一个陡坡上，诺德尔突然来了个急刹车。车的后轮“吱”的一声停了下来，在后面的沥青路面上留下了一道车辙。他的车上已经坐了一个人，那就是贫民区的一些房子的房东莱布·西尔弗。

“他到这儿干什么？”索洛米尔不解地问——尽管他已经听说过诺德尔同西尔弗做交易的事。据诺德尔说，西尔弗许诺给他一笔可观的钱——如果他能腾出他的房子，并把他院子里的那些把周围都熏得臭哄哄的动物全都弄走的话。长期以来，诺德尔坚持说，那一带的房租之所以一直很低，这不是由于政府的慷慨，也不是由于房东的好心，而是因为他的后院里发出的那股气味，所以他的邻居们应当对他感恩戴德并为他提供的服务付钱才是。当索洛米尔搬进他隔壁的小房子的时候，诺德尔就曾露骨地暗示过他：要是拿点钱去贿赂他一下，那决不会吃亏。“有谁听说过政府和房东向穷人施舍吗？”他曾这样宣称。

索洛米尔私下里也一直纳闷，人家为什么以这么低的租金把那座小房子租给他，尽管这对他的确是件喜出望外的事。在离开萨费德之前，他踏遍了半个国家，想找一个适合开办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地方，但就是在一些偏远小镇，房租也贵得吓人，更不消说较大的城镇了。要不是找到了这样便宜的地方，虽说办这两项事业很有意义，但他还是留在萨费德的好。“要是西尔弗明白过来，让我补交租金，那可就糟了，”他心里想。

我们跳上马车的平板，双脚耷拉着。清脆的鞭声响起，那匹马的头部打了一个激灵。这时，诺德尔咧着牙齿不整的嘴，朝我们笑了笑。他是新移民中住在这一带的最后一个人。其他人在混好了之后全都搬走了。诺德尔这些年混得也不差，又添了两架车和一匹马。夏天他卖水果和蔬菜，冬天就卖煤油。此刻他是从旧货市场回来。他从一些人家的门口捡了一些被扔掉的衣

物、家具和厨房用品，拿到旧货市场去卖了。那些人什么都往垃圾堆里扔！今天市场上交易很清淡，所以他又把一只铜壶、一个汽油炉、几只生锈的平底锅、一个装满旧鞋的袋子、一堆女人衣服和一把扶手椅拉回来了。那扶手椅的布面已经开了线，里面的填充物都掉出来了。小路依旧蜿蜒而下。那匹马的后腿停住不动，挡住了车厢下部的护栏。莱布·西尔弗坐在一个箱子上。他长着一张圆圆的脸，有点少年白头。他每个月都要到他所有的房子这儿来转一圈，收取房租，而他的大多数房客也都手里拿着钱在门口等候他。起初，索洛米尔只把他当成收房租的人。他不大相信像西尔弗这样有钱的人会屈尊去干这种低下的事。但是，西尔弗向来愿意同卑微的人交往。他虽有钱，却没有养成有钱人的坏毛病。我仍然记得他飞快地蹬着自行车在墨尔本走街串巷向肉店老板兜售牛肠子的情景。那肠子是论码卖的。在那之前，他在他叔叔开的酒馆里维持秩序，负责把捣乱的家伙轰到大街上去。当他由于很快把顾客都轰跑了而被炒鱿鱼之后，他到我爷爷那里去学裁缝。但我爷爷看到他那双大手和香肠般的指头后，便对他说，这些指头永远也不能把线穿到针眼里。爷爷还对他说，真正的裁缝学是学不成的。他认为，真正的裁缝是天生的。

在诺德尔门口，我们大家都下了车。西尔弗掸掉黑色大衣上沾的一些草屑。除了大衣之外，他身上的所有其他衣服都是深浅不同的淡蓝色。就连他那浓密的头发也有些发蓝。“喂，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他转向我说。听那口气，就好像我闯入他的地盘而被抓住了似的。

前面说过，本镇贫民区的房子几乎全是西尔弗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他到以色列定居后不久，便提出了一项改善领养老金的穷人生活的计划。根据这项计划，政府把那一带的房

子以最低价格卖给了他，而且向他提供一笔长期低息贷款。在这笔交易中，西尔弗自己连一分钱也没掏。他把每月收的房租用于偿还贷款。他所赚的钱都来自出租房子收取的押金——这押金的数额视房客的年龄而定。七十多岁的房客交得多一些，八十多岁的少一些，超过八十岁的就只交很少一点钱了。从长远来说，得失是相等的，因为年纪大的房客，其周转率也比较高。他从来不把房子租给年纪较轻的房客。

“这是银行的生意，”我说。

“是肯·贝协会的股票，”索洛米尔甩了这么一句。尽管他急着想让德沃拉知道他回来了，但他还是站在我们旁边。索洛米尔依旧担心西尔弗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总的说来，他一直同西尔弗保持着距离，在像所有别的人一样手里拿着租金在门口等候他的时候，才简短地回答他几句。索洛米尔竭力不让西尔弗到他的后院和小房子四周察看。“院子里塞满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兴许不记得我从他那里租来时是什么样了，”当我们还坐在车上的时候，他小声安慰自己说。如果关于西尔弗要付给诺德尔和其他人一笔钱，请他们搬走，好使他能够将那一带重建一番的传闻确有其事，那他可就惨了。上天保佑，千万别让他带着他的全部家当，带着他的那些书籍、墓碑、古董搬走。“这是我现在最不想做的事啦，”当马车停下来时，他这样说。

“你说的是什么股票？”西尔弗像听力不好似的把一只耳朵凑向索洛米尔这样问道。当时，周围一片寂静，只能听到那匹已卸下鞍具的马跺着蹄子，打着响鼻。

“肯纳德·贝伦森股票，”索洛米尔重复了一遍，又补充说，这一带有许多人都把钱投到这种股票里了。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请问，这位肯纳德·贝伦森又是何许人呢？”

当索洛米尔谈到他本人也买了肯·贝协会股票，以增加他那微薄的收入时，西尔弗又凑近了一步，贴近索洛米尔的脸，问道："这个美国人靠得住吗？他可靠吗？"

"你所说的可靠是什么意思？他可是拥有一个极大的公司呢。"

"你是怎么知道的？"

"瞧你问的这个问题！你说我是怎么知道罗特希尔德家族的！"索洛米尔笑着说。

"嚯！他现在拿自己同罗特希尔德相比了吗？"西尔弗说这话时，一手抓住索洛米尔的胳膊，另一只手不停地揪着自己厚厚的下唇。

"他们成为伙伴了，"索洛米尔说。

"谁告诉你的？"

索洛米尔指了指我，还提到哈莱维的名字。西尔弗松开下唇，伸出手来挡住我，不让我打断索洛米尔的话头。他的动作还像年轻时一样。诺德尔把马牵走了，西尔弗也放开了索洛米尔的胳膊。"如果真是这样，我也要买这种股票。你说他叫什么名字来着？肯纳德·贝伦森，对吗？买多少都行吗？"

"没有上限，"索洛米尔借用了哈莱维的说法。

这时，诺德尔从院子里喊我们到他房子里去。我陪西尔弗朝诺德尔的门口走去，索洛米尔则回去向德沃拉打招呼，说他一会儿就来。

"那是个骗子！"西尔弗瞥了我一眼说，因年老而松垂的皮肤聚集在他的鼻子及颌骨四周。他脸上的表情使我觉得他是要继续探讨这件事的。然而，他却向诺德尔做了一个已听见他的喊声的表示，然后告诫我千万别轻率地搅到这种冒险的事情当中去。记得有一次，他到我这里来，说服我不要离开基布兹。他以

前也这么做过。这一次,他又像那一次一样,引述了我刚加入基布兹时给在澳大利亚的他写过的信中说过的话。当时我劝他离开这个盛行两面三刀的世界上的尔虞我诈,到我们基布兹来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挤牛奶、犁地、牧羊,在宽敞的饭厅内与所有基布兹成员一道进餐。"以色列的城市也同样是弱肉强食的地方,"他对我说。由于我没有理睬他当时向我提出的忠告,离开基布兹到城里当上了一名银行职员,现在他便建议我除了日常业务,别的什么也别干。肯纳德·贝伦森和他手下那伙人全是骗子。他们为了把人们的钱骗到手,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你可不要往火坑里跳啊,"他拉起我的手臂,把我领进诺德尔的屋子。"那都是圈套!"他如此评价哈莱维的雄心。

在诺德尔的家中,黄绿色的小鸡仔儿在我们的腿间叽叽咕咕地叫着。一些煤油罐和几只板条箱——有些箱子是空的,有些装着少量的水果和蔬菜——被摞在墙边。一只小兔儿的长耳朵从墙角的一只筐里伸了出来。诺德尔那位体态肥胖的妻子雷塞尔坐在床边,把一只狗放在膝盖上喂食。那是一只个子不大的黑狗,年龄已经不小了。它的脖子四周还带了一个围嘴儿。桌子上盖着几页依地语报纸。一只棕灰色的猫咪把腿蜷缩在身子下面,眼睛盯着一个锡盘子里面没肉的干骨头。当我们走进屋时,无论是雷塞尔还是那只猫咪,都不曾抬眼看过我们。诺德尔忙着为我们拖出一只凳子和一只木箱,让我们坐下。他把半瓶威士忌放在桌子上。他在到厨房去取三只厚玻璃杯时,还弯下腰去把一只夹在两只箱子之间的小鸡解救了出来。然后,他递给我们一人一根胡萝卜。"自家菜园里种的,"他说。

当他来到这个国家并被送到这里来的时候,他立即开始在后院筑起篱笆。他种果树、蔬菜,还养一些家禽家畜。在实行经济紧缩的那些年里,他那里从未断过水果、蔬菜、新鲜鸡蛋或宰

杀的鸡鸭等等，而且，他卖这些东西的价格也很公道。他们全都是外来移民。在那个年代，谁也不会瞧不起别人。邻居们向他学习如何种土豆、栽柠檬树、给葡萄喷杀虫剂，任何人都不曾有过任何怨言。麻烦是从人们开始耸鼻子、抱怨他后院里的气味、甚至把他告上法庭时出现的。他们搬走后，西尔弗来了，用极低的价钱把所有东西都买了去。诺德尔斟上威士忌。他对自己的资产是很有数的。别看他既不能读也不能写，所有数字都牢记在心中，而且，必要时他的雷塞尔还可以帮忙。她出身于哈西德教派的家庭，是这座房子中惟一有文化的人，每天都阅读报纸。他本人则来自铁匠和马车夫的家庭。他老家的人都是马贩子兼干养鸡的营生。“我家没有念书的人，没有裁缝，也没有鞋匠，”他说。我们呷着威士忌，诺德尔则等待着西尔弗提出最新建议——他称他为“西尔伯曼先生”。

雷塞尔喂完了狗。当她抓住它脖颈上的厚皮把它放到地上的时候，那畜牲痛得尖声叫了起来。她笨重地站起身来，蹒跚着走进一间小黑屋子。那只狗则拖着一条后腿跟在她后面。那猫咪也站了起来，伸开四条腿，无声地打了个哈欠，然后更加无声地从桌子上跳到凳子上，再跳到地板上，跟在雷塞尔和那条狗的后面进了小黑屋。

我把胡萝卜放进口袋，道了声“再见”，便走到外面。我从那里听到诺德尔的喊声：“雷塞尔，我要去饮马了！你也想喝点什么吗？”

我走进了索洛米尔的后院。那里一切照旧。那些石头和陶器仍像以前一样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只是草更长了，用波纹马口铁皮做的屋顶下的树枝长了许多树叶。从萨费德带来的拱门斜靠在树干上，上面罩了一块麻布，遮住了希娜·罗歇尔的名字。

“她走了，”索洛米尔从屋子里大声通知我。厨房已经收拾

整齐了。里面摆放着一个二手冰箱和一只煤气灶。各种厨具挂在四周墙壁的钩子上。当初用来挡门的那张桌子现在与物品架并排靠墙放着。一向堆满旧报纸、杂志和书籍的架子上,现在整齐有序地放着玩具小人和动物——一个吉普赛女郎、一个日本玩偶、一个哈西德人、一个修女、一对新娘和新郎、一头骆驼和一只鸵鸟。从天花板的一根横梁上垂下一个由塑料洋葱和蜡制胡萝卜编成的花环。此外屋内还四处点缀着红色的甜菜。

"书籍让她感到憋得慌,"在我们来这里的路上,他对我说过。他有两天没在家,外出去查找希娜·罗歇尔的行踪。当他回来时,他都快认不出自己的厨房了。此时他在隔壁的屋子里翻找什么东西。所有那些画依然用绳捆着,竖在那里;那些书也照旧放在纸箱、口袋里或胡乱堆在地板上。他搬起一只未打开的纸箱,往箱子底下看了看。"她打牌去了,"他听到我的脚步声后这样说,但却没有抬眼。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对赌钱会如此上瘾。德沃拉不是适合在基布兹中生活的人。索洛米尔认为,要不是她每周两次出来打牌,她会觉得那里的生活难以忍受的。基布兹和赌博是不相容的。看来那里的人谁也不知道她数年来每周两次进城都是为了去打牌。自从她有一次在车上睡着了,坐过了站,被困在靠近边界的一个地方之后,拉辛就总是到大路上等她乘末班车回来。他会示意汽车停下来,蹬上踏板,朝过道里大声喊她的名字。所有司机都认识他。他去世后,德沃拉便再也不敢在车上打盹了。而且,从大路走回家的那段路也使她没精打采。

索洛米尔正在找德沃拉放错了地方的那些手稿。当这些手稿放在手边时,他本来有许多机会坐下来把描写他的青年时代的那本小说完成。那时他真是下笔如有神呐。但今天,要他绞尽脑汁把多年前放下的东西再从记忆中翻出来,那是不可想像

的事。另一方面，他对那篇讣告几乎还能逐字逐句地背下来。当时那位编辑对这篇讣告的写作风格曾大加赞扬，并预见到他在文学方面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索洛米尔一会儿抬起一只箱子的一角，一会儿掀起一只口袋的袋底，一会儿趴到地上往书堆的后面窥视。要不是因为他热恋着德沃拉，他早就跟她彻底绝交了。“她非要按照自己的心意整理房子不可，”他说。他在翻看几只箱子的时候，胳膊肘不小心把一摞书碰倒了。“那是从你的国家澳大利亚来的，”他指着身边一个箱子上的地址对我说。箱子上用黑墨水写着“米尔博物馆收”几个大字。那是索洛米尔给他的博物馆起的名字，同时这也使人想起他的名字。他的祖先世世代代居住在波兰的米尔市。现有的一些文件证明，索洛米尔的一位祖先曾受到卡西米尔王的邀请，要他到波兰来定居，帮助发展他的王国。那位祖先非常有名，人称米尔市的什洛莫先生。他的那些比较俗气的后人后来把这个名字波兰化了。

索洛米尔再次蹲下来，把散乱的书籍收集起来。我也帮他忙活着。他不时打开一本书，看看书名。“你听见西尔弗和诺德尔在说什么了吗?”他随口问道，并立即自己作了回答。“诺德尔是不会从这里搬走的。”在他看来，房价下跌并非因为有人在自己的后院内饲养动物。诺德尔开始摆架子了，到处放风说西尔弗准备出大价钱，而且付现金。有谁听说过有钱人到处大撒金钱? 据诺德尔说，对方曾表示愿意给他很大一笔钱，使他足以买一处新住所，而且可以退休享清福。但是，他在计算了一下如果他从这一带搬走，其他房子的价值会涨多少之后，便把那价码提高了百分之五十。“哪个头脑正常的人会愿意住在这里?”索洛米尔问。

“从美国来的犹太阔佬会愿意，”我说，因为当西尔弗还在澳大利亚的时候，他就琢磨着要把一些已被宣布不宜居住的地区

变成充满新生机的居民区。刚才在诺德尔家，他给我看过一篇从澳大利亚报纸上剪下来的图片，上面拍的就是他在那里取得的成就。

索洛米尔直起身子，坐到一摞书上。他对犹太阔佬会愿意住到这个区来的说法嗤之以鼻。不过，他回过头来想一想又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只要他能想办法把自己在这里建的博物馆和图书馆维持得长久一些。诺德尔会搬走，富裕的犹太人会到这儿来定居，使他那亟需有人捧场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兴旺起来。他伸手把一摞书朝自己身边拉了拉。“那样的话，这些书会发挥什么作用呢?”他一边问一边一本本地翻着那摞书，还自言自语似地慢慢读着书名和作者的名字：肖伦·阿什写的《玛丽》、赫什·戴维·诺姆伯格写的《优柔寡断的人》、约书亚·珀尔写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及莱布·奈德斯、莫伊希·库尔巴克、斯宾诺莎的著作和梅莱奇·拉维奇的诗。他在读到后面几个人的名字的时候，声音很大，就好像一个一个地喊他们上台有什么有关他们每个人的事要说似的。诺姆伯格所描写的女主人公口袋里总是带着毒药，随时准备自杀。肖伦·阿什的女主人公玛丽是依地语文学中第一位冲破束缚到非犹太人世界中去寻找幸福的现代妇女，但最终她却挺着个大肚子回到了自己人中间。梅莱奇·拉维奇把斯宾诺莎的教导带到了波兰最偏僻的小城谢特莱奇的犹太人茅屋陋舍。“这些都是宝贵的书籍！不是应当扔到垃圾堆的东西!”由于激动，他的声音变得尖厉颤抖起来。他问道：“它们这样被运来运去、无人照管的状态还要持续多久?事情真的惨到这种地步了吗？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鲁道夫·勒克尔是谁?”我翻开一本书，读出了书名：《革命与倒退》。索洛米尔也能说出这位作者的一些来历。此人生于德国，皈依犹太教后，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并开始用依地语

宣传他的主张。

“我可以借来看看吗?”我之所以求借是因为这本书使我想起无政府主义鼻祖克鲁泡特金亲王,他曾是我父亲的偶像。

“那一本不行。那是个孤本,”索洛米尔说着从我手中拿走了那书,放到他身后很远的地方去了。他也不肯借给我别人所著的任何一本书——不论是肖伦的、库尔巴克的,还是梅莱奇·拉维奇的,而且每次都能找到一个不同的理由抓住他手中的那些书不撒手。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对他来说特别宝贵。这是他能够称为己有的第一本书。他在十二三岁的时候便梦想拥有一所自己的图书馆了。他爱书的癖好就是在那个时代形成的,尽管那时这是远远超出他的经济能力的事情。他的一位朋友是个装订工人的儿子。有一次,这位朋友从父亲的装订工厂捡来一本散了页的书。那正是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他从头读到尾,什么也没明白,但那里面的每一个字他都喜欢。多年来,他对书籍的拥有欲丝毫不曾减退,连睡梦中也梦到它们。有一次,他梦见大街上黑压压的全是人,他们抬着一些黑色的钢琴排着长长的队伍游行。“我要那些钢琴干什么?”他问。一些钢琴的顶盖被打开了,好让他看清那里面的琴键、音锤等等全都被卸掉了,里面装满了书。他顺着密集的人群放眼望去,目光所及的钢琴全都装满了书。人人都给他送来这么珍贵的礼物,这令他感激不已,于是便站起身来向众人发表了讲话,因为他一向有公开演说的爱好。“先生们、女士们,不论你们年长还是年幼,请行动起来吧!请行动起来!”他醒来后,总觉得他所梦见的不是游行,而是一支送葬的队伍。

索洛米尔站了起来。他从我手中拿走那本《伦理学》,并对我说,他还有许多问题想探讨呢。例如,一个民族为什么要批判自己的语言?我们将如何回答迟早要面对的这样一个问题:“你

们从海外流落地回来了，你们带回了什么？”

天色已经不早了，我们还得到里默尔家去。索洛米尔把所有书籍都放回纸箱内（这一次不要我帮忙了），又重新寻找他那被放错了地方的手稿。他从我的公文包中拿出一份澳大利亚报纸的剪报，那上面有一幅莱布·西尔弗的照片。这幅照片夹在另外两幅的中间。左边那幅照的是一条荒凉的街道，两旁排着人力三轮车；右边那幅拍的是一个人头攒动的购物中心。三幅照片下面的说明是：“过去和现在。”根据西尔弗的设想，我们这座依山傍水的小城的贫民区也有同样光明的未来。索洛米尔盯着那些照片看了一会儿。当我们从屋内走出来，关上房门并锁好吊锁之后，他说：“你知道吗，有朝一日，所有这一切准会使我想要大哭一场。”

在我们到里默尔家去的路上，索洛米尔从一个发霉的草包下面抽出一个变了形的镜框。他反过来掉过去地仔细研究那镜框的木头，把它贴在自己的身上，竭力要把一个弯了的钉子弄直。在去里默尔家这一路上，他一面不停地摆弄那颗生锈的铁钉，一面尽其所知地向我讲述那位穿着换过的鞋掌、依旧坐在大石头上的老头的故事。他自称是格林伯格的阿方索，可实际上是个立陶宛人。他在安哥拉住过好多年，把许多钱都投到以前的某国政府发行的债券中了。现在住在以色列的他仍然三天两头给这个国家的新领导人写信，要求把欠他的钱还给他。他怀疑所有的人，从不让任何人进他的房子。有一次，索洛米尔把他带到我们银行里来。他不停地咀嚼着，把已经变成球状的口香糖从嘴的这一侧送到另一侧。

我们来到里默尔的小屋时，天还没有全黑。索洛米尔把那镜框靠在墙边——那颗生锈的钉子依旧伸在外面。他从关闭的百叶窗上的一个缝隙朝屋里望了一会儿，然后向我示意，让我也

过去看。里默尔站在窗的对面,嘴里念念有词,想必是在做默祷。他的双手拿着祈祷书,平伸在前面,一只手的食指夹在合着的书页中。他的眼睛一会儿睁开,一会儿闭上。他身上穿着一件深色长袍,头戴一顶有着硬硬的宽边的黑帽,唇边留起了短须。

“坠入爱河使他焕发了朝气,”索洛米尔小声对我说。有相当一段时间,他一直劝里默尔离开那座散发着臭气的破房子,离开他的那些下层社会的粗鲁讨厌的邻居。用德国给他的钱他可以在高尚住宅区给自己买一套房子,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或许她正呆在屋里呢,”索洛米尔把耳朵贴到百叶窗上仔细谛听。里默尔是在乞丐们每天乘车去特拉维夫的过程中认识她的。有一次,她坐在与他隔着通道的相邻座位上,行车过程中睡着了。突然,一些硬币滚到地上。帮助捡拾散落硬币的乘客以为钱是里默尔的,就都交给了他。这时那女乞丐又睡着了,而且她的脑袋隔着通道歪过来,碰到里默尔的肩膀。硬币又开始往地上滚。这时,除了她自己,大家都清楚这些硬币是从哪里来的了。“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索洛米尔说。我刚要说句什么,但他阻止了我,因为他想听清里面的动静。但是他听不到里面有任何声响。里默尔的床铺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画。我用两手遮着眼睛上方,想看得清楚一些,但是,由于灯泡的亮光反射在玻璃上,我根本看不清楚。突然,里默尔大声唱起来:

哦,雅各布,他们的帐篷多么华丽,
哦,以色列,还有他们的圣堂!

他身上穿的一切都是崭新的。那胡须给他增添了一丝绅士气派,使他那扁平的鼻子也变得挺拔一些了。我现在认出那画

上画的是肖洛姆·阿莱赫姆(1859－1916,俄国犹太人,依地语作家,著有小说和剧本四十余种,有犹太人马克·吐温之称——译者注)。这幅画是索洛米尔不久前送给他的。这时,里默尔停了下来,又从头开始唱,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两句。我们在外面等了好一会儿,他才完全停下来。我们敲门,他没应。于是,索洛米尔便按住把手,把门推开,我们走进屋内。里默尔远远看了我们一眼,好像不认得我们似的。他穿着那身新衣服,看起来像是自己家中的一位客人。翻开的祈祷书此刻内页朝下放在桌子上,作书签用的丝带从桌子边上垂下来。这本祈祷书相当新,就像里默尔脚上穿的鞋子一样。

是谁深更半夜来敲我的门?
是流浪汉施密尔克尔吗?

他用一首古老民歌的歌词问道。索洛米尔向前走了几步,然后围着里默尔转了几圈,打量他的新衣服,查看衣服的质量,追问每件东西都花了多少钱,因为他知道有个地方可以用里默尔所出价钱的一半买来全新的或者看起来全新的东西。他在四处搜寻依地语书籍的过程中,遇到一位卖死人穿剩的衣服的犹太人。他们彼此交换了地址。那个人发现了依地语书籍总是告诉索洛米尔。索洛米尔此刻穿的皮大衣、高领套头衫和与之相配的浅黄色裤子以及那双红色毛袜子,都是从他那儿买来的。他本来可以带里默尔去找那个人,用很少几个钱就把他从头到脚打扮起来的。

里默尔挥了一下手,打断了索洛米尔的话头。他从不浪费一个子儿,总是量入为出,但谈到衣服,他可一定要买崭新的,而且质量务必要好,要耐穿。他解开大衣和大衣里面的上衣的扣

子，卷起裤腿，来证明他可不是瞎吹牛。他从裤子里抽出衬衫的下摆，让索洛米尔亲自摸一摸，看那面料是多么平滑柔软。对于穿衣服，他从来不吝啬。穿衣服是为了博得别人的尊重！冬季里穿衣服只是为了暖和。他列举了他在一个严寒的日子里穿过多少长衬裤、法兰绒内衣和袜子。就是此刻，今天晚上，他也穿得很暖和。尽管夏天应该到了，外面吹进来的风仍然很冷飕飕的，把他的骨髓都要被冻僵了。他解开衬衫下部的扣子，让我看看他穿的是什么内裤。

他的手指上也长着一撮撮黑毛，就像他的两只耳朵里一样。他的胡须硬硬地向上翘着，都翘到眼睛下面了。他之所以不能容忍那个瘦干摄影师呆在电影院的台阶旁，就是因为他所穿的衣服的缘故。这些年来，即便是在最冷的时候，那家伙也只穿一件薄薄的衬衫，系个领结——只要看他一眼就会把人冻僵。他里默尔从心里瞧不起那些舍不得买衣服的人。他本来会当着他的面这样对他说的，无奈他不知道该怎样向那个保加利亚人解释那句依地语谚语，而且，就是依地语怎么说的他也忘到脑后去了。

“人靠衣服撑门面，”索洛米尔提示说，但是里默尔根本没听。他脑子里装的全是他自己的事，此刻正耿耿于怀地回忆着当他第一次穿着这身新行头出现在墓地的乞丐中间时，他们曾以什么眼神看他。

“你看起来就像从某个遥远国度来的使者，”索洛米尔说。他还向里默尔表达了他个人的问候，说那条街上的人不停地打听他的情况。他在电影院台阶上的位置至今空在那里，因为没有人愿意取他而代之在那里卖面包圈。里默尔很同意他的说法。他认为，这一代年轻人只想过舒服日子。他们穿得像乞丐，行为却像老爷。说老实话，他以前在电影院门口卖面包圈时，

主要任务是赶跑那些孩子。你一转身他们就来偷你的面包圈，一千只眼睛都不够用。他记得，还在罗兹的时候，他就听人们在议论年轻的一代要垮掉了。

里默尔拿出了要签字的表格。但是他和索洛米尔还在喋喋不休地讨论每件衣服的价格与质量。索洛米尔正在试穿里默尔的大衣，里默尔则在箱子里翻找着什么。先前那箱子的拱形盖子上蒙了几条毯子。他从箱子里拉出各种各样的内衣，把其中的一些搭在胳膊上，手里拿着另一些，而且展开袖子让索洛米尔一件一件地估价。

由于此刻离得近了的缘故，墙上的那张画看得清楚了。那上面画的是坐在一张柳条编的圆桌旁的肖洛姆·阿莱赫姆，一条腿翘在另一条腿上，一根文明棍横放在他的膝头。他那中间凹进的浅色草帽搁在桌子边上，一只用来喝赛尔脱兹矿泉水的杯子吊在他的脖圈上。画的下款写着“肖洛姆·阿莱赫姆在卡尔斯巴德”。

索洛米尔脱下了大衣，里默尔也把所有内衣装回箱子。空气中仍可闻到一股樟脑球味。从那些毯子里滑出了个什么东西，“哐啷”一声掉到地上。索洛米尔捡起一个装满硬币的圆形锡罐，出声地读了上面写的一行字：“行善可保长寿。”

“这也是新的吗？”他摇着那罐子问。

“猜猜那里面有多少钱？”里默尔说。

索洛米尔更用力地摇了一下，又设法掂出罐子的分量，还把它凑到耳朵边，再次摇了摇。

“让他也试试，”里默尔指着我说。

我抓住机会把要他签字的表格交给了他。哈莱维催我办这件事已有好长时间了，因为他看到里默尔的名字仍旧没有被列入肯·贝协会股东名单。我已做好准备，倘若里默尔表示疑虑、

提出毫无意义的问题或者想要退出的话，我就一遍又一遍地强调，尽管没有利息，但资本的价值在不断增加。我还带来了一些图表，这些图表用图形和数字说明，如果里默尔早些同意把钱投到肯·贝协会的股票里，他会比现在阔多少。但是，里默尔没提任何问题，索洛米尔的帮助也成了不必要的。尽管如此，仍把那钱罐子抓在手中的他还是开始向里默尔解释起来。他大讲特讲从哈莱维和阿纳辛那里听到的有关不同种类的资本的差别，告诉他如何能使他手中的资本生钱。他对里默尔说，他自己的资本已经比刚投放时增加了两倍。那是用银行向他提供的一小笔贷款——没有他自己的一分钱——开始的。尽管哈莱维估计五年之后才会有大笔收益，但事情的进展比预计的快得多。倘若他动手更早一些、借的贷款更多一些，现在就是另一番光景了。

里默尔坐下来签署文件了。我从索洛米尔手中拿过那个钱罐，不停地摇动。当他把表格交给我时，我把钱罐交给了他。

“说说看，有多少？”他满怀期待地问。

我耸了耸肩。

“三个葬礼的钱，”他说。

现在该告辞了。索洛米尔说，他得赶紧回去，因为家里有人在等他。

“是女人吗？”里默尔问道。他把钱罐放回箱子盖上的毯子里，不等索洛米尔回答就唱起一首有关一名犹太小伙和他年轻的妻子的民歌来。自从他成了墓地唱诗班的成员以来，他有了很大的变化。这变化就连售货亭里的那个女人也发觉了。有一次，当哈莱维和我路过那里，到她那里去买冷饮时，她指着对面电影院的台阶，用两个手指抹了一下嘴唇，就好像那个人不值一提似的。但她还是说了一句话：“以前他老是打瞌睡，现在他总爱唱歌。”

索洛米尔也哼起了那首关于犹太小伙子的歌，同时把一只手放在里默尔的肩上，用另一只手指着那幅画像说，毫无疑问，正是肖洛姆·阿莱赫姆使他心境如此愉快。他还会再送一幅肖洛姆·阿莱赫姆的画像给他，让他挂在那光秃秃的墙上，使他的房间更加充满欢乐。他在来时的路上甚至还为这幅画像找到一个镜框。只需刷刷漆，把接头地方拉拉直，它就成会为一个极棒的镜框，可以用来镶嵌另一幅画像。他不想为此收他的钱。让里默尔核计核计他是他的一位多么诚实而忠贞的朋友吧。

里默尔爬到床上，取下了那幅画像，把它还给了索洛米尔。他说，他的屋子里要这种小丑没什么用处。不论他朝哪个方向转身，那家伙的眼睛都在盯着他，咧着他那长着山羊胡子的嘴朝他傻笑。脖子上竟然挂着一只杯子，多么滑稽！有一次，他半夜醒来，觉得墙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动。他辨不清窗户在哪一边，那画像又在哪一边。那杯子在不停地颤动，就好像挂在真人的脖子上。他再也睡不着了，整个后半夜翻来覆去地折腾，脑子里想的全是罗兹。

索洛米尔站到床上，把肖像又挂到墙上。不能这样把肖洛姆·阿莱赫姆赶出去！这些年来他一直在收集肖洛姆·阿莱赫姆的肖像、素描和照片。他曾经倾其所有来放大一张他的照片，宁肯饿肚子也要得到一帧肖像的复制品！当他滔滔不绝地向里默尔大谈肖洛姆·阿莱赫姆的美德时，他那本来就有些发红的脸庞因愤怒而涨得通红，他的嘴唇抿成了更细的一条细线，他的眼睛露出了悲哀的神情。他说，肖洛姆·阿莱赫姆是一位幽默大师，三代人以来，犹太人一直随着他笑。他从床上跳下来，大步走到里默尔跟前，向他问道："躺在床上想罗兹有什么不好？"

里默尔一言不发，再次把那幅肖像从墙上取下来。倘若不是索洛米尔伸手接住镜框，那玻璃肯定会在他头上碰个粉碎。

我们离开里默尔住所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们相互搀扶着，免得被路上的石块木头之类绊倒。从海边吹来的风又湿又冷。一股动物腐尸的臭味从我们身旁飘过。当我们走了很远一段路之后，索洛米尔才想起放在里默尔屋外的镜框没有拿。于是我们又折了回来。屋里没有一丝动静，我们也没有再往里看。我拿着那幅肖像，索洛米尔拿着那个扭曲的镜框。在沉默了很长时间之后，索洛米尔哼起关于雅各布的帐篷的那首歌谣，而我则竭力回忆里默尔唱的那首暗指一个女人在等待索洛米尔的关于犹太小伙子和他年轻的妻子的民歌的歌词：

他们有个独生子，
有个独生子，
有个独生子。
他们的独生子，
已经死去，
已经死去。

“他以为他是什么人？这个蠢货！肖洛姆·阿莱赫姆不配受他敬重！”索洛米尔一边说着，一边停下来竖起大衣的领子，同时把镜框夹到另一只手臂下。“无知！要不是看在他的钱的分上，我才懒得理他呢！”

我们离开了那片大院区，走上了一条通往索洛米尔小木屋的窄路。我上车的巴士车站在相反的方向，于是我把肖像交给他，向他道了晚安。他迈着僵直的步伐离我而去，海风吹拂着他的大衣的下摆。在萨费德时他就经常在寒冷的夜晚到小路上溜达，以便找个人聊天，因为在阴雨连绵的白天，希娜·罗歇尔总是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屋里，一言不发，而且也从来没人到他们家来

做客。现在到了我们这个小镇上,情况略有改善。他在银行的投资及到他家里来陪他的德沃拉·米肖里大大地减轻了他的孤寂。他不再需要在后院的石棺里暖身子了。有德沃拉躺在身边,他感到非常暖和。她在床上可真是个尤物！她的花样很多,让他惊愕不已。他过去也有过风流韵事,一次是在柏林上大学期间,另一次是在埋葬波兰国王的瓦维尔附近的克拉克夫。但德沃拉比她们都强。“想必她以前是干这一行的,”他曾这样说过。

他在一盏路灯底下停住了脚步,把那幅肖像夹在两腿中间,举起那个扭曲的镜框,凑到灯前,然后又翻转过来,又拉又拽,直至把一边拉开,耷拉下来。然后,他又把它扯下来,把整个镜框卸开。在把每一条木头仔细地研究了一番之后,又一条一条地甩到路旁的矮篱笆后头去了。然后,他把肖洛姆·阿莱赫姆的肖像紧紧地夹在腋下,转身朝自己的小木屋走去。

我把一只手伸进大衣口袋,找到了刚才诺德尔给我的那个胡萝卜,在去巴士车站的路上把它消灭了。

第四章　展　览

在夏末的一个炎热的安息日，索洛米尔的博物馆开张了。

当我在将近傍晚时分冒着窒人的暑气赶到那里时，他正坐在门廊里。只见他身穿黄色裤子白色衬衫，衬衫的袖管卷到胳膊肘下面，只露出袖口。一张带有很粗的雕花桌腿的木桌上放着那个录音机，他正在听录音机里放出的他自己的声音。桌子上还有一只瓶子和一只玻璃杯，但两者都是空的。

“肯·贝协会的股票有什么新消息？”他在问我时，脑袋依旧朝录音机那里歪着。现在可以听到录音机里有人哭泣的声音和其他各种声音。就肯·贝协会的股票而言，眼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不久前，这种股票下跌了，起初只跌了一点点，接着就大跌起来，弄得股民们人心惶惶。不过，还没等这种恐慌扩散开来，股票又回升了，而且升得比原先还高，于是，恐慌便让位于焦虑不安了。现在谁也不知道下一步可能出现什么情况。一些人持有某种看法，另一些人又持截然相反的看法。专家们把两种可能性都考虑到了。不论你走到哪里，肯·贝协会的股票都是热门话题。哈莱维关于贝伦森的名字会家喻户晓的预言看来真要应验了。

肯纳德·贝伦森在众多朋友的陪同下，驾着私人飞机亲自到以色列来了。这些朋友中有些是出席在这里召开的会议的代表，不过所有人都是参加他的婚礼的客人。婚礼在西墙举行。新娘还是那个据认为已被他抛弃了的女孩。报纸上刊登了婚礼

的照片，还有那些在购买肯·贝协会股票之前从来不知股票为何物的人们的照片。哈莱维早就预见到，这个婚礼要比预定召开的会议更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就连老人院中的人也都跑来向他咨询，怎样才能快快发财。是索洛米尔把他们带到我们这里来的。为感谢他的服务，银行又向他提供了一笔贷款。

"给客人拿冷饮！"他透过窗户向屋内喊道。

我走到门廊内，坐在桌子旁边。我的衬衫似乎粘到我的皮肤上了，所以我不停地掀动领角，以便凉快凉快。伴随着录音带上的讲话声，不时可以听到锤子敲击木头的声音。那是艾哈迈德·纳阿拉尼在钉牢支撑墓碑的托板。索洛米尔雇了他来摆放这些古董石头，使他的后院看起来能像一座公园。在一个角落里，从萨费德运来的那个无框的门微敞着。在刻着希娜·罗歇尔的名字的那个部位的上方，有一个红笔画出的细细的箭头，指向院子的深处，那里有两排细高的古代陶罐排列在小路的两侧，小路上铺了一层干净的沙子。一些残缺不全、高矮不一的白色石柱围成一个大圆圈。那口罗马石棺被推到了一棵树下，上面盖了两块木板，板上蒙着灰色的毯子，此刻权作一条长凳。院子中所有其他空地都被扁平的磨石、大肚子瓦罐、里面刻着烛台的石板以及一些怪异的石人占满了。其中一个石人的脸上裂了一道口子，另一个的眼睛破了。屋檐下，顺着整个门廊拉起一道不宽的麻布横幅，上面用很大的字母写着："欢迎参观米尔博物馆。"

"其他客人都到哪儿去了？"说话的是德沃拉·米肖里。她从屋里出来，翘起脚尖张望着，看看是否有客人来。她身后的两张铺着白色桌布的桌子上摆满了小吃。她自己则穿着一件深绿色的拖地长裙，头发也新做过了。她用手遮住阳光，看了一下手表。时候已经不早了。城里到处都贴了通知——公告牌上、售

货亭里、墙上甚至连外面的一棵树上都有——告诉人们博物馆下午四时开张。可现在已经快六点了，似乎每个人都来过了，但是四下看了看，又都走了。

“人们都还在海滩上呢，”索洛米尔眼也没抬地说。他把耳朵向录音机凑得更近了些，把音量也开大了些。他们刚才吵架来着，吵架的缘由在于那些墓碑。索洛米尔让纳阿拉尼把它们分散地摆放在院子里，有的歪着，有的斜着，有的陷在地下；而德沃拉却反对在她鼻子底下搞一个荒冢。她也不喜欢从萨费德运来的那个门，差一点把它烧了。她不会告诉他，她把希娜·罗歇尔的照片作何处理了。她甚至不会承认见过那些照片。“是脸黑黑的、鼻子很长的那个人吗？”有一次当他遍寻那些照片而不获时，她这样问。所有这一切都使他很不痛快。所以，当他拿到第二笔贷款后，他立即在报纸上做了一则广告，呼唤希娜·罗歇尔回家来，他会成为一个供养家人的好丈夫。他摆脱不了这样一种幻觉：她忧伤地在萨费德那些狭窄的小路上踯躅，热切地等待着他。她对那个画家的爱此时想必已经枯竭，她大概在盼望索洛米尔回到她的身边。这就是他最近回萨费德去了一趟的原因——希望能见到她，尽管他向德沃拉保证此行只是为了办理离婚手续。如果光是为了办手续，他本来不必与她见面，把文件寄给她就行了。不过，他之所以不想把离婚的事了结，还有别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国家的时局。在像现在这样动荡的时期——恐怖分子、边界事件——办这种事不合适。

萨费德也变了，与以前不一样了。这座城镇变小了，陌生了，土气了，很难找到什么人可以与之正经地谈谈天。他以前住过的房子已被推倒。他看到，在它的地基上搭起了高高的脚手架，准备盖新楼。他看到一个看门的阿拉伯老头，那老头身边有一只睡眼惺忪的狗。他向他打听正在盖的楼是干什么用的，可

那老头一问三不知。邻居们也都不知道，而且谁也没看见过希娜·罗歇尔。他在他们发现过可陈列在博物馆中的古董的地方徘徊。在他的记忆中，他仍然能够听到在他们从一堵坍塌的墙壁下面拖出刻有她的名字的那扇门时她发出的笑声。他们是一起把门拖回家的。他在萨费德没能找到希娜·罗歇尔，他担心他再次失去了她。她决不会像德沃拉那样处处找碴儿，也不会拿一些愚蠢的问题来烦他，诸如“人们为什么宁愿在海滩上度过一天，而不去参观美术馆”之类。希娜·罗歇尔喜欢那种爱思考的人。看到他在深思的时候，她总是不作声。事实上，他并不喜欢很多人来参加开幕式。按他的想法，几位好朋友一起喝点“莱海姆”就可以了。他曾试图说服德沃拉，不要太张罗，不要烤那么多蛋糕和饼干。但她不听。她也没有那份耐心去听他往录音机里录的那些东西——那是他为自己打算写的一本书作的笔记。早在好多年以前，一位编辑就预言他搞文学会大有前途的。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说的话，就好像这是昨天发生的事。现在，他的博物馆办起来了，那些书都放到该放的地方了，那些画也挂起来了，他可以抽出工夫专心地写自己的书了。要是希娜·罗歇尔在身边的话，他写起来要容易得多。她会咯咯地笑着听他给她讲这讲那。他老是对德沃拉说，她其实用不着嫉妒她；他对希娜·罗歇尔的爱早已荡然无存——除了还记得她的笑声以及还有后院那扇从萨费德运来的门以外。

德沃拉走到桌子旁，用手指按了休止键，把录音机关上。刚才索洛米尔正在讲日本的一个教派来到耶路撒冷，到西墙去跳舞的事。在参加肯纳德·贝伦森婚礼的客人们预定在西墙集合之前的两三个小时，那些日本人手拿小旗，蓝色长袍上别着白色六角星，在靠近西墙的地方边哭边唱，唱的是希伯来语的《圣经》。索洛米尔到婚礼现场去了，他想亲眼看看这位肯·贝协会

创建者的尊容，看看在二十年中变成腰缠万贯的富翁、使全世界都跟着他转的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如果哈莱维的话可信，他便是为巨额融资这个圈子注入了新精神的人物。在此之前，把持这一行的都是一些古板的大亨。他们僵化矜持，一副贵族派头，裹着一层厚厚的神秘面纱。如今，这些人已经让位于这个来自民间的年轻富豪了。这就是肯纳德·贝伦森不远万里到西墙，来到普通人中间，穿着休闲服来出席自己的婚礼，向在场的人大撒金钱的原因。他的客人都衣饰华丽、卓尔不群，而他却穿着牛仔裤、T恤衫，头戴一顶无沿便帽，帽子正中有一个六角星。那新娘是个十七岁的女孩，已有八个月的身孕。

"他们来参加这位富贾的婚礼就好像是来看什么昙花一现的光景似的，"德沃拉嘟囔着。相形之下，她自己那两张摆满食品饮料的桌子却无人问津，令人好没面子。本来也会有人准时到来的。在基布兹中，决不会有这种事。你接到邀请，就一定要去。幸好她没有请基布兹中的任何人。要是他们来了，说不定背后怎样讥笑她呢！为做这些吃的东西，她累得到现在手还在疼，可是那些点心在大太阳底下晒了三个小时，都变得干硬了。她本想当第一批客人来时再把点心拿出来，可索洛米尔坚持说，按规矩永远是点心等客人。他回忆说，国外举行开张仪式时都是这样做的。她还向纽约、伦敦、巴黎和其他城市发出了邀请，现在仍在等待回音，因为索洛米尔向她保证，一定会接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贺电。索洛米尔本人则总是提着那个录音机走来走去，今天往里录音，明天放出来听。她说什么也弄不明白哪有那么多东西要说，而且她对那些日本人、对希娜·罗歇尔、还有那个肯纳德·贝伦森，从心里烦透了。"拉辛在世时，这个录音机从来不用，"她说。索洛米尔真想顶她一句。拉辛都入土为安了，可至今还在对她发号施令！"你为什么那么讨厌肯纳德·贝

伦森?"他确实想知道这一点。

在她看来,他不过是个使人赔钱的自命不凡的家伙。她本人现在刚刚开始明白那些账户是怎么回事。她怀疑哈莱维和索洛米尔在合谋欺骗她。不然的话,他们就应当在股票下跌之前告诉她抛出去,在开始回升之前再买回来。那样她就会赚上一大笔。那对任何人都没有害处。除了他以外,她还能向谁讨主意呢?她的女儿吗?自从她和她那个半异族男友离家出走,住到某个莫夏夫(以色列的一种土地私有、本人劳动的农民合作社——译者注)之后,她就完全把她妈妈忘了。她和拉辛甚至不能把赢钱的事告诉她,害怕那个异族小子会全部据为己有。拉辛知道该如何保守秘密。有时,在基布兹参加某人葬礼时,她会避开众人,站到他的墓旁,向他述说她是如何处置那些钱的。她至今仍然埋怨他因不慎而溺水。一个大冷天,又不是周末,怎么会想起去游泳!他以前从来不是那么喜欢游泳的呀!这下可好,他自己走了,留下她去为他们的那些账目伤脑筋。她把账算清楚后,告诉他倘若银行及时给她通个气,他们的钱会比现在多多少。那样,她就会用只相当于原价三分之一的价钱把全部股票买回来,从而获得高出八倍的利润。让他自己去算一算吧。数学毕竟一直是他的强项。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会有那么多钱。她用这些钱干什么呢?钱使你感受到自由,有了钱就没有你办不到的事。她要抽空去巴黎拜访一位童年时的朋友,或者乘飞机去巴西她妹夫那儿。她听说她妹夫赚了大钱,现在和一名非犹太女人同居。至于基布兹嘛,她也将考虑为它做点什么。只要有钱,就无需什么借口。眼下这个肯纳德·贝伦森就是最好的例子——尽管她一点也不喜欢他。他把自己的婚礼和一次会议安排在同一时间举行,使所有人都围着他跳舞,好像他是个金牛犊(古代以色列人崇拜的偶像——译者注)。所有报纸都报

道了有哪些人到西墙来躬逢其盛——他们中有著名的拉比、国会议员——实际上，半个政府都出动了。在他看来，肯纳德·贝伦森的所作所为完全超出了礼仪的限度。他在国外怎样生活不关她的事，但这里是以色列，他本应表现得谦虚一些才是。她对那种心无所专的浪荡的百万富翁是一百个看不上眼。而且，别忘了，他早已不再年轻了。报纸上说他已经四十七岁了。他那撇细细的山羊胡子和那微驼的肩膀，使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老得多，她觉得他很像她老家迈斯里奇镇的那个弱智人纳奇切。大家给纳奇切找了个五十岁的肥胖老处女作老婆，眼前这个人也只能找一个蠢女人，而且还怀孕八个月了！

“今天到此也该结束了，”她沉默了一会儿后较为平和地说。

索洛米尔朝四周看了一眼。太阳已经落得很低了。院子里那些石头人像的影子正在拉长。他温柔地瞅了一眼德沃拉，希望两人能和好如初。但她刚转过眼去查看桌子上的糕点和水果，他便背着她用手势对我说：只要她发泄一通之后平静下来，她就不会再反对他开录音机了。他了解这种女人——性情暴烈，情绪无常。“爱是通向女人心灵的惟一途径，”他小声地说。他还偷偷地告诉我，她在床上热情似火，就是大白天也毫不在意。那种时候她会喊他“我的宝贝”。但是，她若发起脾气来，无论什么宝贝都逃不过她的数落。趁着她忙于查看点心时，索洛米尔的手一点一点地放低——以此来试探她的怒气已经平息到了什么程度——直至最后停在录音机的按钮上。他按动了那个按钮，打开了录音机。背对着我们的德沃拉打了一个激灵。她掀起一条单子的一角，往单子下面看了看，然后拿开一个盘子，把一堆葡萄放到别处，腾出地方来放了一只装橄榄的碗。做完这些后，她又把一绺头发掖到耳朵后面。

录音机里传出了嘈杂的说话声。我想起这是索洛米尔在西

墙旁边录下来的。我们两人与哈莱维、阿纳钦一起都到那里去了。肯纳德·贝伦森和他的客人们迟到了，那些日本人仍在那里跳舞。他们唱完了《以赛亚》中的诗句之后，便朝哭墙跑去，在跑的过程中一边哭一边推开在那里祷告的其他人。一个犹太人唱诗班被推到一旁。那个领唱抬起头来往身后望了一眼，发现唱诗班的人全都不见了。他嘴里仍然念念有词地祷告着，从眼镜上方看着那些穿着蓝色长袍、背后缀着一个很显眼的白色六角星的人从四面八方朝他围拢过来。其中一个人把脑袋伸进他前面的一个人的两腿中间，一只手竭力伸向哭墙，并且嚎啕大哭起来。他们哭声震天，淹没了那位领唱者的声音，使他不得不四下寻找他的唱诗班的人。他把长披肩的两端系在一起，用颤抖的手指扶了扶无沿小帽，把披肩向头上抛去，嘴里停止了祷告。他搞不清楚他们是什么人，在这里做什么，想把哭墙怎么样。当索洛米尔向他解释说他们是异教徒时，那人翘起了他那长着短须的下巴，露出脖子上的白皮肤，开始大声喊起来。

德沃拉突然来了脾气，把两张桌子上的单子猛地拉到一边。由于用力太大，桌上的苹果和橘子滚了起来，靠近桌子边缘的三明治托盘也掉到了地上。她等得不耐烦了。她要把桌子上的食物全都收走，把门锁上。她尖叫着说，如果有谁胆敢再来，她就把他们全都轰出去。她的叫声就像录音带上那位因困惑至极而变得结巴的领唱者在呼唤他的唱诗班时发出的声音一样："犹太异教徒！先生！你说'犹太异教徒'是什么意思？"索洛米尔关掉了录音机。德沃拉依旧气咻咻的。他站起身正打算去捡拾被揉皱的单子，但却突然停了下来，宣布有客人到来了。

迈着四方步、嗑着瓜子的诺德尔正朝我们走来。他那装瓜子的锥形纸筒紧贴在脸上，所以乍一看他的下巴特别长也特别尖。他从来自萨费德的那扇门旁走过，穿行在古代陶罐中间，然

后走进了白色石柱围成的那个圆圈，一路上不停地吐着瓜子皮。到他从树荫下走出来停到门廊的台阶上的时候，他的妻子雷塞尔也出现在萨费德之门的旁边了。她也拿着一个装着瓜子的锥形纸筒，那纸筒也贴近下巴。

"这就是从海滩上来的人，"德沃拉甩出这么一句。诺德尔两口子在这个当口来，这简直是火上浇油！她到他们家去过一次，但是那股臭味让她连一分钟也忍受不了。她觉得自己要窒息了，便立即跑回来洗了个澡，换了衣服，以便除掉留在身上的臭气。她无法理解，索洛米尔何以能在他们家呆上几个小时。但是，他对她说过，他是在农场附近长大的，在这种气味中他感到很自在。她本人在基布兹中也习惯了与鸡只和牛群呆在一起，不过这与诺德尔家的气味不能相比！此刻诺德尔两口子在安息日傍晚溜达了一圈之后跑到这里来，把这个地方变成垃圾箱！为了不起灰土，她把整个地面都洒了水；为了把丢弃在地上的所有纸屑捡起来，她的腰都要累断了。然而，这一切都白费了。她一边用手帕擦着突然冒出的汗水，一边哼着《我美丽的祖国》从诺德尔身边走过。那是在电台广播里经常听到的一首有关保持国家美丽清洁的歌曲的副歌。诺德尔穿着他的安息日最体面的衣服，笑容可掬、彬彬有礼，鞠了三个躬——最后这一个是朝我鞠的。他对自己受到的欢迎感到高兴。他指着正走在放陶罐的小路上的雷塞尔解释说，他带她到这里来看看那些吊在小木屋里面墙壁上的那些小人儿。不过他本人对那些东西并不感兴趣。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整理这个星期从人们的房子周围捡来的东西。但雷塞尔整整一周来一直缠着他，要他把这个星期六下午留出来，好同她一起到邻居这儿来。"那里会有好多有学问的人，"他引述她的话说。为了到这里来，她一上午都在忙着穿戴，衣服试了一件又一件，帽子

换了一顶又一顶，在镜子面前转过来掉过去，“就像一位伯爵夫人，永远等着别人来求爱”。在其他时间，她同他根本不是天生的一对。他是战争期间在俄国某地认识她的——一个犹太姑娘，是个处女，孤身一人。“是个不结果的，”他补充说。她未能为他生下一男半女。他没有抛弃她，虽然在以色列这个地方，他本来很容易这样做，弄个年轻点的取代她。会生孩子的，能让家里处处都是小孩子的身影。他一度也动过这种念头，但从来没提出来过，为的是不让她难过。她是个孤儿，是个可怜人，在这个世界上举目无亲。正是因为这一点，这些年来他一直拼命做事，从不让她缺这少那。每逢星期六，他在整理他捡来的东西之前，总是让她先挑，衣服、鞋、饭锅菜锅，只要她喜欢，就让她拿走。而且可挑的东西可着实不少。他好多年都没有给自己或给她买过衣服了。这个小镇使得他们丰衣足食。“这个世界上的人可真愚蠢，”他笑着说。

雷塞尔此时正从陶罐间走出来，踏进那一圈石柱群。又矮又胖的她穿着一件礼服，长裙的后摆拖在地上。头上戴的一顶毡帽上缀有一个铜扣，侧面有一个蝴蝶结。诺德尔一边喊她动作快一些，一边把揉成一团的那个锥形空纸筒扔到身后。这个纸球碰到树上，又滚到那石棺的基座旁边停了下来。德沃拉故意扭过脸，不去看它，但她的眼睛却扫到了诺德尔的短大衣口袋，那里面装满了纸筒，有的纸筒已经被揉破了，有的纸筒的锥尖却直直地露在外面。她向索洛米尔示意，要他想办法别让诺德尔把这个地方弄得脏乱不堪。当索洛米尔还在忙着捡起那些单子，把四散的三明治和水果收到一块儿的时候，雷塞尔已然来到了门廊上。诺德尔庄严地叫着我们的名字，她则微扬着脑袋、半闭着眼睛有礼貌地表示听到了。当她走上那两个台阶之后，诺德尔用臂肘推了她一下，把她领到靠墙放着的长凳那里，让她

在长时间行走之后坐下来喘口气。

“现在，我的雷塞尔要向你们宣读一样东西，”他一边落座一边宣布说。他很舒服地坐在那里，就像准备拍照似的整理一下领结，拉一拉裤脚，使裤线能够显露出来。雷塞尔依旧垂着眼帘，把手袋放到腿上，用长裙的宽大下摆把它盖起来。诺德尔显然很激动。他刚一坐稳就用臂肘推了推雷塞尔。她呢，就像早已彩排过了似的，接到信号便从手袋内拿出一副用电线拴着的眼镜和半页依地语报纸。她把头上的帽子往上提了提，好使耳朵周围有一点空间，然后用手指指着报纸上的字行不出声地读起来。看她嘴唇嚅动的样子，就好像先要试一试那些字句，然后再发出声音似的。

“西尔弗要把他的房子卖掉了！”不等她出声，诺德尔迫不及待地嚷道。他从口袋里又掏出一袋瓜子，同时环顾了一下四周，估摸一下他宣布的消息产生的影响。至于他自已，他不再呆在这里了。他同莱布·西尔弗达成了把房子腾出来的协议。协议签字后，他从西尔伯曼那里得到了占总钱数四分之三的预付金。这些钱足够为自已买一幢新房子，剩下的钱还可以存到银行里用以维持生活。直到这时，雷塞尔才能发出声音来。诺德尔看到自己的这一招击中了要害，便向我打听肯纳德·贝伦森的事。不过，他改不了总要把人家的名字搞错的毛病，称他为“肯尼什·伯尔曼”。他让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已经成了股东，而且是在股票跌到最低点这样一个恰当的时候买进的，买完价格便升上去了。“已经升了两倍了！”他大声说。他提到股票就像提到他的马一样。“你得扒开它们的嘴看一看，再抽它们一鞭子，让它们跑起来！”由于买了肯·贝协会的股票的缘故，他也发现了西尔弗在报纸上做的广告，因为他不再舍不得给雷塞尔买日报了，只要她能把报纸上有关股票交易所的消息和他的股票看涨还是看落

慢慢地读给他听就行。“我自己是大字不识的，”他说。

把散落在地上的水果收拾好之后，大汗淋漓的索洛米尔重新坐了下来。他用身旁的一块毛巾擦了把汗，瞄了一眼报纸上的广告，然后瞅了瞅正走进小木屋的德沃拉。她实在没有必要这么凶巴巴地因为诺德尔的举止而大发脾气。起初连萨费德的人也不懂得艺术和文化是什么东西。一位画家在那里开了个画廊。他只能等待某个不认路的游客闯进来，根本无法维持生计。后来情况就改观了。每逢安息日，家人外出逛街时，总要到各画廊去转一圈，看看那些画。在这里，他也想在树下摆上两张桌子和长椅，好让来参观博物馆和图书馆的人坐下来喝点茶，吃点点心，使他们感到就像在家里一样。他转向诺德尔，问道：“你们什么时候搬走？”

雷塞尔头上的帽子饰着的宽丝带，活像一对蝴蝶翅膀。他觉得这帽子好眼熟，但一下子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了。正在嗑瓜子的诺德尔表演着各种各样的动作，令人目不暇接，简直就像在演奏交响乐。他每次吐瓜子皮，都与上一次姿态迥异。索洛米尔常常看到他在温暖的安息日光着膀子从屋里走到后院来整理他捡的废品时做这样的表演。他从不独自在后院工作。他的马在大声地嚼草，一只山羊在咩咩地叫，小鸡在他的脚边跳来跳去。他在一只折叠梯的梯级上放了一些装满水的托盘，那是为口渴的鸟儿们准备的。鸟儿们在热天时经常到这里来饮水解渴并在水中嬉戏。他的两个锡顶小棚子装不下那么多废品，因此，院子里到处都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在一株枝叶茂密的大树上，吊着好几个磨碎机、一些木杓、一辆自行车的手把、几盏生锈的煤油灯、一架旧唱机的大型扬声筒以及几只铜炒锅。每当风从树枝间吹过，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就会丁丁当当地响个不停。诺德尔并不总是急于把他的货全部脱手，而是留下一些等到旧

货的需求增加、有许多人要买便宜货的时候再拿出来。安息日上午，当雷塞尔到犹太教堂做礼拜时，他就会在后院里四下转悠，对他的马说话，对那只瘸腿狗叫唤，往梯子上的托盘里注水，用重物把翘起的锡板压好，用一根绳子把树和篱笆绑在一起。有时他干脆就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评估他的财产。单是那五彩缤纷的颜色就够让人赏心悦目的了。

至于他打算什么时候搬走？据诺德尔说，还得过些时候。他本想先买套公寓，再把剩余的钱存入银行生利息。可是哈莱维把他说服了，他决定趁肯·贝协会股票跌价，把所有的钱都买成这种股票。公寓什么时候都能买，但迅速发财的机会可不会那么快再来。他对这笔交易一点也不后悔，因为股票刚一涨上去，他就把它们卖掉，把这一大笔钱如数拿到手里，后来又重新买进。他付出了一些代价，但这是值得的。亏个十块八块的没什么了不起，与手指间夹着崭新票子那种感觉相比更是算不了什么。他现在手中有的钱买上三套房子也绰绰有余。“你等着瞧吧，要是西尔弗知道了，他肯定会嫉妒得哭天喊地！”不过，他只会在他的股票再涨一些之后才告诉他。“等涨到十倍的时候，”他说。

索洛米尔后悔自己没有抓住那个机会。要是他趁肯·贝协会股票低位时把那第二笔贷款投到这种股票中，那他现在就会很阔了。但他需要这笔钱把博物馆办起来。他本来应当知道西尔弗会从中捣乱的。那个家伙令他讨厌透了。索洛米尔从一开始就对他没有好感，一直设法不让他与闻自己的事情。你什么时候在报纸上做那个卖房子的广告不好，偏偏选在他的博物馆开张的这一天！“不过，谁会愿意停办一项兴旺的事业呢，”他一边这样自我安慰着，一边把那张报纸递给我，并让我见到西尔弗时同他说一说。

“主任呢，他今天会来吗？”诺德尔在问这话——他指的是哈莱维——的同时提醒我别忘了把报纸还给他。哈莱维这时也该到了。他到一个小型沙龙聚会上去发表有关股票和证券知识的演讲，演讲结束应当直接到这里来。现在全镇各处都在举办这种聚会，以便随时掌握有关肯·贝协会以及股票市场情况的最新信息。人们开始对股市的运作感兴趣了。他们急切地想要知道利息和红利、债券和股份有什么区别，什么叫升水或发行，我方账户是什么意思，银行手续费指的是什么，什么时候叫牛市，什么时候叫熊市。这种小型聚会的参加者有学者、店主、工人、球迷、巴士司机等等。还有一些小组有固定成员。丽达·奥拉米是属于平沙西克那个小组的，因为在老人院中，人人都竭力不让别人窥探自己的私事。就算他们在银行里碰到，彼此也都装着没看见。格拉·明茨——就是在那个下雨的冬夜因为一只瘦鸡被平沙西克用很难听的话骂了一通的那位妇女——也同她的丈夫茨威一道参加了平沙西克的小组。她是看在他们都买了肯·贝协会股票的分上才忍下那口气，与他重归于好的。哈莱维喜欢用她的例子证明股票交易所使人们团结起来了。

“作为贝伦森的左膀右臂，他有权迟到，”德沃拉从屋里走出来时这样说。她已经恢复了常态，正在往桌上摆放冷饮。

“你说什么？他已经得到那个位子了吗？”索洛米尔颇感惊讶地问。他因为忙于筹备博物馆开幕的事，已有好几个星期没到我们银行去了，因此对这期间发生的事情毫无所知。不过，哈莱维仍然在银行工作，尽管肯纳德·贝伦森驻以色列代表的职位一直为他留着。他只是在等待书面任命，他估计瑞士那边在几周之内就会下达这种书面任命。这就是他之所以对股票的下跌如此忧心忡忡的原因。他把股票的下跌看作对他本人的打击，自己焦躁不安，也不让别人安生。他让客户尽量多往肯·贝

协会的股票中投资，希望以此来阻止这种股票的跌势。我们给所有人打电话，到所有人家中去拜访。哈莱维一听说诺德尔同莱布·西尔弗做成了交易，便到他家里去了。他家的臭味一点也没有妨碍他的兴致。他对索洛米尔最近一直不露面感到气恼至极。他就找不到更好的时间张罗他的博物馆的事，非得赶在肯·贝协会股票下跌这个当口儿？哈莱维觉得，肯纳德·贝伦森一定会感谢他为他所做的一切，因为现在正值困难时期，别的人都离他而去，只有他哈莱维还是那样忠心耿耿。他那次同肯纳德·贝伦森的会见对他产生了惊人的效果。他现在很少在家了，还请了一位名叫拉蒙达的私人秘书，陪着他出入各个小组的沙龙聚会。她就是愿意盲目地跟着他进入股市的那个把金色的头发剪得像个男孩的客户。现在她志愿为他工作。一旦他得到那个职位，他会付给她可观的薪水。所有这一切都使他焕发了新的活力。在银行里长时间工作之余，晚上和安息日还要出席许多沙龙聚会，但他却没有显出丝毫倦意。早上他不再点数名单上的姓名，看看有多少客户买了肯·贝协会股票，而只是把那一摞交易单放在手中掂量掂量。有一天，他给我看了他最大的对手阿莫斯·沙伊给他写的一封信，信中表示愿意向他买那个职位。哈莱维咯咯地笑着把那封信塞进专装"无需处理文件"的抽屉。"为了钱出卖自己？""放过加入肯纳德·贝伦森班子的机会？"他把脸转向窗户，拍着脑袋这样问道。"我一直在寻找一位我所钦佩的人，"当时他对我说。

院子里宾客济济，所有人都在等待哈莱维的到来。索洛米尔对来宾们说，他不能在哈莱维不在场的情况下举行开幕式，因为没有哈莱维给他的贷款和忠告，他决不会有今天。此外，哈莱维还打算在这次集会上谈谈肯·贝协会股票问题。

"只需再等十五分钟，"当韦格从口袋内掏出我们在他家的

墙上看到过的那个葱头状的怀表来看时，索洛米尔这样安慰他。韦格在擦眼镜，尽管这并不是由于天热的缘故，而是因为他是穿着那套令人喘不上气的行头：在一件扣子扣到下巴的棕色衬衫外面罩着一件羊毛夹克。他来这里，只是为了让哈莱维收回那天他在银行讲的那番关于慈善机构带着它们得到的捐款溜走的话。“他凭什么要咒骂他们，称他们是骗子？”他问索洛米尔。但是，忙于接待客人的索洛米尔要他去向银行提意见。事实上，韦格已经到我们银行去过好几次，但是由于我们那里总是有很多客户，他无法找到一个肯听他唠叨的人。他每次去，银行里都挤满了购买肯·贝协会股票的人。从一清早还没开始营业的时候起，客户就堵在门外了，直到下班以后很久我们才能松口气。不过，有一次韦格在排了很长的队之后还真轮到机会了。他手里拿着他所支持的那几个慈善机构——它们是“同情之源”、“天佑”和“匿名捐助者”这三个组织——的来信，要求哈莱维当场读一读那些信并承认错误。他说他做过调查，访问了一些人，还有人带他在耶路撒冷转了一圈，亲眼看到许多人——包括那些年老多病的人，那些穷困的寡妇，那些无助的孤儿，的确需要那些机构的援助。哈莱维厌烦地瞥了一眼那些信，又瞥了一眼韦格，告诉他等肯·贝协会的会开完再来找他。

韦格把那些信拿出来，让索洛米尔看一些著名的拉比在信上的签名。他说他从来不信教，他所拥有的与宗教有关的惟一纪念品就是那只表盘开始变黄、带有罗马数字的怀表。自从他在十三岁那年参加成人仪式至今，这只表一直走得非常准。“是的，我尊重宗教！”他几乎喊起来。哈莱维一天不承认自己对那些诚实的人不公正，他就一天不罢休。索洛米尔把韦格领到桌子旁，让他自己拿点东西吃。“他会消气的，”他悄悄地对我说，因为在老人院里，他通常都能用一点好吃的东西把他争取过来。

根据谈工作时达成的协议，韦格在老人院吃饭。清早摆桌子吃饭的时候，他会多给韦格一份果酱、一杯牛奶。有一次，他还邀请韦格到他家里去吃晚饭，为的是让哈莱维看看他是怎样说服韦格向肯·贝协会股票投资的。他对德沃拉说过，这是看在他们两个都在柏林研究过悲观主义哲学家的分上。肚子都快撑破了的韦格因酒足饭饱而满脸放光，但他从未买过肯·贝协会股票。

索洛米尔前去迎接耶胡舒阿·里默尔。他们有很长时间没见面了。索洛米尔自然是因为忙于筹备他的博物馆，里默尔则是忙于为生计奔波。“还在老地方干吗?”索洛米尔本想再多问两句，但是看到他那精心刮过的胡子、光鲜的衣着和擦得锃亮的皮鞋，便改变了主意，决定以后再问。里默尔打扮得那么整洁，与他在电影院门口的台阶上卖面包圈的时候相比真是判若两人。只有他的那顶黑色宽边帽子还使人想起我们从他家的百叶窗朝里张望、听见他在唱赞美诗的那天晚上的情景。那天之后不久，索洛米尔陪他去见了拉比，证明里默尔这些年来一直鳏居。那一次，里默尔还向拉比问起，可否把他一年来做的祈祷算在将与他结婚的那个女乞丐的名下。里默尔现在介绍我们认识她了。她个子比他高，极瘦，微驼，戴着一副长长的耳环，两颊红红的。“什么时候办喜事啊?”索洛米尔问。如果里默尔不在场，他会认不出她来了。他曾在特拉维夫中央车站碰到他们两人在乞讨。那天他在那个区内寻找希娜·罗歇尔，一直找了一整天。当时天色已经很晚了，他急着去赶回家的末班车。他在惟一没关门的售票处买票时看到了他们。除了间或有个把行色匆匆的人走过，消失在黑黢黢的地下通道内之外，车站几乎看不到人，卖报的人已经把他的报纸杂志堆在一起。一个面目阴沉的老头儿在用一柄已经磨损的大扫把扫着地，但是那些粘在黏乎乎的水泥地上的废车票和纸屑却依旧留在那里。一股水流从一根细

细的黑色水管里淌到地上。此时，弥漫在这一带的尿骚味比白天更加刺鼻。那个女乞丐坐在一块纸板上，向前伸着腿，正无精打采地摇动着讨钱的盒子。耶胡舒阿·里默尔把一只胳膊肘靠在一个石柱上，俯向她，在她的耳边唱歌：

新娘新娘好福气，
新郎的珠宝送给你。

里默尔和那女乞丐感到很拘束。他们没有站在一起，显出很紧张的样子，眼睛望着别处，别人同他们打招呼，他们也不大愿意答话。索洛米尔把他们带到门廊上放食品的桌子旁。里默尔说，有关他攒下一些钱的事，他的女伴全都知道，但对银行给他的收据却有些不大相信。所以他今天把她带来，好让她亲耳听到他当场向哈莱维询问他投资买下的那些票证现在值多少钱。他一直忙于生计——一周有三天在墓地，其余时间是在特拉维夫——所以未能亲自去银行问个明白。

“你那气喘的老毛病怎么样了?”索洛米尔问道。里默尔从桌上拿起一块饼干，默默地祷告了一句，然后咬了一口。他十分悠闲地嚼了嚼，眼睛哪儿也不看，一心品尝那饼干的味道。然后说道：“你说那个吗? 它一抓住我，我就把它咳出去，让它完蛋。”

石柱群那边传来库托夫的笑声，他是冲着肖莎娜·齐波里在笑，因为她恭维说他至今仍然英俊得令女士心动。她不能原谅自己当初反对让库托夫夫妇搬进老人院的态度。他们根本不是一文不名的。他们从原先那套房子搬出来时，别人给了他们一大笔钱；他们卖一些值钱的东西也有少量的收入；此外库托夫还有点退休金和社会保险。因此，他们能够支付一年左右的开销。然而，他们搬进来还不到一个月，埃内斯蒂娜·库托夫就发

现了哈伊姆·齐波里把另一部分钱藏在哪儿了。

索洛米尔正在感谢齐波里夫妇给他准备的惊喜。他们带来了足够举行一次宴会的食物。艾哈迈德已经在帮助他们的车夫从车上往下卸东西和在院子里放支架搭桌子了。两名系着白围裙、头戴折边纸帽的女仆正忙着铺桌布菜。索洛米尔已经不再受雇于他们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奖赏他在做他们的打更人期间的忠诚服务。他被深深地感动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莱布·西尔弗那则广告所引起的不快。一想到所有的房子都将卖掉、所有那些领养老金的人都将被赶出这个居民区,他的情绪就会低落下来。也许明天,也许后天,也许下个星期,他本人也可能被赶走,又要居无定所了。带着这么多东西,他到哪里去呢?不过,他还是掩饰起自己的忧虑,装出很开心的样子。看来,这消息还没有透露出去。幸好那张刊有该广告的报纸此时没在诺德尔身上。没有这张报纸,谁会有耐心听他讲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他看见诺德尔依旧挨着雷塞尔坐在长凳上,两人都瞪着眼睛盯着新来的人。

"我觉得这一切挺好笑的,"在我们起身欢迎齐波里夫妇之前,索洛米尔对我说。这使他想起在萨费德为一位著名人物举行的聚会。到场的人远远超过原先的估计,接待员急忙从后门搬来更多的椅子和长凳。这时,有人宣布说,主宾今天不来了,聚会取消了。但是,在后面的接待员没听到这个消息,仍在抱怨增加了的工作量。他们也不知道前面的客人已经散去,还在不停地搬来椅子和凳子。

"不过,现在就不用担心了,"他边说着便握住齐波里的手,那手比以前健康多了。齐波里等索洛米尔讲完了他表示感谢和赞扬的话之后,便又恢复了先前的谈话。他说,他的妻子现在不论爱上谁都可以直言相告,这对他不再会有任何触动了。他早

就不再是以前那个爱吃醋的丈夫了，而且，对他而言，嫉妒和羡慕属于那些只注重无谓小事的人。他猜想，埃内斯蒂娜也不受这类情绪的干扰了，因为她把全部的爱都献给了就连此刻她也抱着的猫咪身上了。这个坏家伙刚才抓破了他的手，此刻又在嗷嗷狂叫，因为索洛米尔朝它的背部狠抽了几下。埃内斯蒂娜把那猫咪举起来，指了指它那只少了一块的耳朵。难怪它又野又凶，她解释说，它既要同老鼠搏斗，又常被一些残忍的孩子当作足球踢来踢去。

"她很像我那位托尔斯泰主义的叔叔，"库托夫插言说。关于他这位叔叔的故事，已经被索洛米尔录了音，因为他正在搜集各种逸闻趣事，以便使他打算写的那些人的生活更引人入胜。我所听到的埃内斯蒂娜发现齐波里藏匿另一笔钱的地方的经过是这样的：那是在她和肖莎娜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之后的事。埃内斯蒂娜向她透露，库托夫的祖父的确是德国人；而肖莎娜则让她看了她胳膊上纹着的德国死亡集中营的号码。现在，有关这所老人院的管理问题，她不首先征求埃内斯蒂娜的意见是很少作决定的。而埃内斯蒂娜给人忠告时，总是使对方觉得那全是自己想到的。她在其他方面也起了有益的作用——她能使某个脾气乖戾的老者变得温顺，使另一个老者解开他深锁的愁眉，使陷入悲痛的人得到慰藉。有埃内斯蒂娜在，人们吵架似乎也比以前少了。肖莎娜说，她在犹太人中间从未见过有她这样天使般性情的人。

一个雨天，当齐波里为了提高他的免税级别的事离家到另一个政府机构去的时候，埃内斯蒂娜向肖莎娜招了招手，示意她到窗户这边来看她的丈夫。她问肖莎娜，她有没有发现近来他的样子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肖莎娜望着他一步步走下台阶，直至从她的眼中消失，但却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异常。埃内斯蒂

娜记得他的肩膀总是低垂着的，现在突然显得高而隆起了。实际上，肖莎娜没有注意他的肩膀，而是看着他如何把拐杖挂在台阶的扶手上，把他那件平时极少穿的藏蓝色风衣的带子扣上，看着他那颤抖的双手如何费力地把风衣带子的一端穿到搭扣中。她看到当他的手颤巍巍地去拿拐杖时他的脖子是怎样地僵直，看到他侧着身子走下台阶时，先把拐杖伸出去，接着迈出一只脚，然后再迈出另一只脚，简直就像一具僵尸通过模模糊糊的窗玻璃。正因为如此，她没想到要仔细看看他的肩膀。那天早上，直至齐波里回来，一切都不对劲了。她手中的东西不断地往地上掉；一点小事也会使她大发脾气；她无缘无故地朝厨师发火；她还冲着电话大嚷大叫，而且连一分钟前自己想干什么事都回忆不起来。她说，齐波里以前是那样地健壮，在换床单时他会毫不费力地把病人抱起来、换完后再把他放回床上。关于他，她本来有许多事可以告诉埃内斯蒂娜。如果不是心里太乱，她本来会坐下来大哭一场，哭诉自己是多么可怜。不过，她还是抽出时间去问了一下埃内斯蒂娜，她怎么会注意到他的肩膀，并猜到他把钱装在那里面。除了埃内斯蒂娜，谁还能想到这种可能性！

那天深夜，当老人院里所有的人都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整个院子沉浸在黑暗与静谧之中时，她和埃内斯蒂娜踮着脚走进厨房。索洛米尔正在那里呷着热茶，懒洋洋地翻着一本花花绿绿的画报。他为她们斟了茶，然后，那件风衣被铺开放在厨房的一张大台子上，并被从上到下搜查了一遍。最后，肖莎娜拆开了肩膀周围的几针缝线，用拇指和食指从里面掏出了一张又一张钞票。天哪，那全是瑞士法郎！如果是一天比一天不值钱的以色列货币，那本来没有什么用处。在把那些钱数了一遍并把总数记下来之后，所有钞票又都被放了回去，重新把缝仔细缝好，使齐波里永远想不到他的风衣已经被人做了手脚。

从那时起，肖莎娜对凡是经过她手的他的每一件衣服都不时地仔细检查。她简直就像患了魔症。现在看来，他在昏倒那天身上所带的钱中只有一小部分丢失了。她常常情不自禁地观察他的肩膀。每当他穿着那件藏蓝色风衣出去时，他的肩膀都像是有些鼓鼓囊囊的。“天哪，他要是再在大街上休克该怎么办哪！”现在，他每次离家出去，她都如坐针毡，直到他回来。埃内斯蒂娜对她讲的那些关于人的天性的话令她惊愕不已。通常她极少在那些无聊的想法上用脑筋，因为她有太多的杂事需要料理，老是有这个那个事情要她操心，有无数的决定需要她即时作出或者推迟作出。再说，沉浸在联翩的浮想之中也不符合她的性格。正因为如此，她希望埃内斯蒂娜给她解释一下，一个像齐波里这样整天宣扬克己至上的人怎么会把钱藏在衣缝里？埃内斯蒂娜用她那双依旧清澈明亮的碧眼望了望肖莎娜。除了眼睛之外，她在所有其他方面都显得比库托夫苍老。她的背是驼的，头发已经全白，皮肤干巴巴的，还长了一些棕色的斑点，当年曾长着一个酒窝的右颊上现在出现了一道深沟，而且还长出一些又短又硬的须毛。埃内斯蒂娜一直对肖莎娜说，一个人的灵魂中存在着很宽的、不可弥合的裂隙。肖莎娜以她自己的方式来理解这个道理。“归根到底就是说，一只手不知道另一只手在干什么。”

此刻，站在白色石柱围成的圆圈里，她望着她那位正在大谈羡慕和嫉妒的丈夫。她觉得他的身体状况很不好。他的脖子更加僵直了，他非得把整个身子转过来才能看到旁边的东西。刚才，她看到他讲着讲着话突然把眼睑紧闭了好一会儿，而且她记得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就好像眼前一阵发黑或者一阵疼痛突然袭来。他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文件——百分之百的残疾证明。拿到证明后，他们立即卖掉了那辆旧车，一个子儿也没添就

买来一辆崭新的免税汽车。但是，齐波里自己已经做不了任何事情，就连搬张椅子这样的活儿都干不动了。他现在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凭记忆同库托夫下棋上了。偶尔老人院中也会有别的人同他们一起下棋，希望在下棋之余还能向他们学习如何忍受疼痛。看来，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死亡本身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没有痛苦就行。以那种方式下棋使齐波里耗费很大的精力，但他坚持说这是一种能够提神的疲劳，使他倍感轻松。肖莎娜听人说，凭记忆下棋的好处是它能使人排除所有杂念，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三十二个棋子的位置上。但是，尽管人们对他做了那么多的暗示，他决不透露他把其余的钱藏到了什么地方。她甚至请出了库托夫来帮忙，但齐波里顽固地坚持说他也把钱投到肯·贝协会股票中了。既然人人都在这样做——卖房子、卖店铺、卖贵重物品——他为什么要例外呢？但他没在我们银行买股票，所以，哈莱维建议肖莎娜在家里找一找，看有没有用电脑打着数字的购买股票收据。一个客户开立秘密账户是常有的事，如果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赚了多少钱的话。她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却什么也没找到。她怀疑他讲的不是真话。“或许他在耍弄我们大家呢，”她说。

德沃拉招呼客人们坐到堆满齐波里夫妇带来的食物的桌子旁。他们什么都想到了，想必花了不少钱。如果他们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索洛米尔，那一定是值得他们这样做的。她自己也更加敬重他了。于是，她用一种和好的眼神请求他原谅自己刚才发脾气，说这都怪天气太热的缘故。

索洛米尔陪着一位又一位客人来到桌子旁。阿纳钦正好在人们要开始吃饭的时候到了。他送给索洛米尔一件礼物——他撰写的有关在特拉维夫股票交易所上市的两家保险公司股份的简短历史。他多印了几本，准备送给同事和熟人。索洛米尔用

鼻子吸了吸那新纸张的气味。书籍永远使他感动。他向阿纳钦承认，每当他听说什么人出了书，他总是抑制不住一股艳羡之情。多年来，他一直怀着要写一写自己这一生的热切的愿望；他已经想好了这本书的轮廓。一开始要写他的那些在米尔镇定居以帮助重建波兰的祖先，描写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习俗，讲一讲那些著名的拉比和那些同但泽做生意的富商。他要用阿莱赫姆式的幽默来为他的叙述增色。肖洛姆·阿莱赫姆是惟一没有忘记人的天性的人物。他真是个天才，如今没有什么人能望其项背了。这就是他之所以迷上他，对他的书读而不厌，到处收集他的肖像的原因所在。"那个肯纳德·贝伦森，书里也着重写了他吗？"索洛米尔一边翻着阿纳钦的书，一边问。翻到一处画着高高低低、急剧升降的图表的地方时，他停了一会儿。阿纳钦让他太太去给他拿点吃的东西来。他一直专注于撰写那两种股票的历史，对肯纳德·贝伦森协会没有怎么重视。不过，近来他改变了主意。那是被派来筹备肯·贝协会会议的一位贝伦森代表抵达以色列以后的事。此人恰好是新加坡政府的一位前部长——戴维·斯塔福德爵士。二次大战期间，阿纳钦与他在同一座教堂作过礼拜。战后，戴维爵士退出政坛，加入了肯·贝协会，担任它的国际金融顾问。一天早上，从收音机里听到戴维爵士的名字又在报上看到他的照片之后，阿纳钦冲进银行，向哈莱维和我大声宣布了这个大好消息。他一脚尚未跨进大门就这样做了，竟忘了这样不得体的喊叫是不符合我们银行职员的行为规范的。职员们通常在进门时，都带着一种专注的表情，对别人的问候也很少理睬，因为提高声音讲话似乎是对银行尊严的玷污。那天阿纳钦没干什么工作。隔一会儿就跑到我们的写字桌前来讲讲他回忆起来的在新加坡时的某件事情。他已经同他联系过也叙过旧了。从那以后，他把他所做的试验性记录中的所有其

他公司都勾销了，专门研究肯·贝协会股票。那时，该协会的股票刚刚急剧下跌，但没过多久就又大幅度回升了。单凭这件事就足以证明，在股市问题上，纯粹的逻辑不是一个可靠的依据。他开始在我们这个部工作了，为的是一旦意料之中的肯·贝协会对哈莱维的任命到来，他就可以接过哈莱维的职位。他已经得到了提升和加薪。如今，每当需要他签字的时候，他总要把他的名字的中间部分——贝尼迪克特——加上去。

索洛米尔此时正盯着阿纳钦太太阿黛拉的背影。她又矮又胖，正一摇一摆地朝着不少人已经在取用食物的桌子走去。"是一位十足的贵族，"索洛米尔在提到戴维爵士时这样说。他回忆起在肯纳德·贝伦森的婚礼上曾在西墙附近见过此人。他对这个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高的个子，银白的头发，胡子刮得很干净，洒过香水，鼻子和满是褶皱的脖子有点发红。索洛米尔甚至录下了他的声音。"我为自己生为犹太人而骄傲！"他对着录音机大声说。正是由于他的缘故，阿纳钦才被当作肯纳德·贝伦森的亲信，而且，他和哈莱维都担负了照看贝伦森的老母亲的责任。那位老太太被带到这里来，是为了把她的儿子领到婚礼上去。她个子很小，也很干瘪，不停地抱怨她实在没有力气消受儿子对她的这份孝心。她真想留在布鲁克林老家，她在那里过了大半辈子，她所有的朋友都在那里，知道她的邻居是谁，而且总能找到个人说说话儿。可她的儿子非要把她接到瑞士去不可。但那里整天吵吵闹闹的，她的脆弱的神经真受不了。"上帝保佑你们！上帝保佑你们！"她冲着索洛米尔的录音机喊道。

阿黛拉拿着两个碟子回来了，还一口气列数了她看到桌子上摆放的各种点心，说她都不知道该吃什么好了。阿纳钦没来上班的那天，她到银行来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当时她坐在哈莱维的写字桌旁，不喘气地数落阿纳钦近来的恶行——在家中

同他那个新朋友喝得酩酊大醉;他们扯着嗓子唱下流歌曲;把黄色照片扔得到处都是。自从与那个家伙混到一起之后,她的丈夫就像疯了似的。他从来不是放荡的人。他以前总是平平静静地过日子,从来没有特别亲密的朋友,只喜欢下棋、看电影和研究股市。两口子总是相安无事。

阿黛拉递给他满满一盘子食物,又从自己的盘子里挑起一块肉,看看底下有没有开胃的东西可以先吃。

"那位戴维·斯塔福德爵士,他还在以色列吗?"索洛米尔问。他们两人都没应声。阿黛拉的脸色阴沉下来。阿纳钦则在专心致志地吃东西。落日的余晖照在他的秃顶上,又从高举着的盘子里反射回来。

哈莱维是在人们快吃完饭的时候才到的。他来后立即跳到放在树下充当长凳的石棺上,宣布他将散发美元。他挥舞着刚从兜里掏出的一叠嘎嘎作响的美元,希望看到人们伸过手去的场面。肯纳德·贝伦森本人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酒店开会期间就干过这种事。他说这是为了展示作为他的协会信条的平民资本主义的概念。这时,许多人还都四散在院子各处,手里端着盘子或坐或站在磨盘、陶罐、人像和墓碑周围。拉蒙达招呼他们聚集到树下。哈莱维在等着人们围拢过来的当儿,向已经站在他周围的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场的各位有谁见过不想拥有美元的人吗?反正他没见过。为了证明他的论点,他讲述了自己不久前碰到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证实了他的下述看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时刻,哪怕是在半夜被叫醒的时候,都想获得美元。这件事就发生在他自己住的那栋楼里。一天半夜,盗贼闯入楼里引起的骚动把住户惊醒,人们纷纷来到大街上。他也来到外面,想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那应该是凌晨两三点钟吧。他的邻居们有的穿着睡衣,有的穿着晨袍,聚集在一名正在记录目击

证人证词的警察周围。警察认出他——那警察也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之后，那盗贼、盗窃事件以及先前的骚动统统都被忘到脑后去了。这时，那警察和所有在场的人全都围拢在他身边，急切地听他告诉他们如何在股票交易所赚钱。

这当儿，所有人都聚集到树底下了。哈莱维突然把手中的美元抛撒出去。那些纸币在人们头上飘舞着，人们则拼命去抢抓，尽可能多抓一些。但是，所有钞票又都回到哈莱维手里了。“不错！”他踮起脚尖，用英语大声说，“每个人都想要美元，但美元是用线拴着的！”（英语中“用线拴着”这个短语是“带有附加条件”的意思——译者注）说罢，他指了指钞票上的那些从他口袋里伸出的细线。他说，这个英语谚语浓缩了肯·贝协会的全部基本思想。还没等人们平静下来，韦格就挤到哈莱维身边，把慈善机构的那几封信伸到他面前，要他当场承认错误，并为自己对诚实的人们使用过难听的词语而道歉。哈莱维伸手接过那几封信，像刚才挥舞美钞那样挥舞着，大声重复了韦格要他做些什么，好让大家都听到。然后，他对那些所谓的“慈善机构”发动了更猛烈的攻击。如果哈莱维刚才对于是否从韦格手中接过那些信还有些许犹豫的话，那他现在却一点也不急于还给他，而是用它们作证据，证明当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无数小公司利用本国有利的经济形势和肯·贝协会的成功时，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它们起的名字听起来与肯·贝协会十分相像，派出代理人冒充股市专家，许诺会让人们发大财，把他们的钱全部骗到手后便溜之大吉。他还把肯纳德·贝伦森比作一只海中怪兽，而其他人都不过是依附于他的小鱼小虾，设法捡点从他嘴边掉出来的饭渣吃吃而已。那些代理人到人们的家中去作宣传，使人们毫不疑心地成为他们的骗局的受害者。有那么一个代理人甚至到他家里去过，而且用欺骗手段把一家叫做 A.K.B. 协会的公司发行的

股票推销给了他的太太。她签了一份合同，还在一些远期支票上签了字。当晚他回到家里，她向他夸耀说她买了一些肯·贝协会的股票，价格比银行里卖的便宜得多，而且还可以分期付款。但是，不等她付清一小部分债款，利息便把最初交的那些钱全吞掉了！他竭力向她解释 A.K.B.股票同 K.B.A.（肯·贝协会的缩写）股票的区别，但她就是不听。原因无他，她只是不能接受自己上当受骗这个事实而已。不过，哈莱维没有对他的听众讲起他同达妮埃拉发生的其他一些争吵。发生那些争吵的原因是，他整天东跑西颠，到处给人出主意，大谈如何快快发财，但她从未见过财运到她家。她只知道他在为别人赚大钱，却从不考虑为自己挣点钱。他只对树底下的听众讲达妮埃拉不愿意听的那些话，说所有那些冒牌货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而肯·贝协会却会永远兴旺发达。他不否认肯纳德·贝伦森有敌人，因为任何成功都会招来嫉妒。他的敌人散布恶毒的谣言，说贝伦森伪造文件，导致法国一家著名银行的破产；还说他强暴了一名少女；说奥地利判了他徒刑；说英国下院中提到与肯纳德·贝伦森有关的金融丑闻。就是这些谣言使得肯·贝协会股票大幅下跌。但是，该协会的股票又反弹回来，甚至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事实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那些谣言是没有根据的，真相总是要大白的，就像油总要浮到水面上一样。哈莱维也像肯纳德·贝伦森在希尔顿饭店会议上所做的那样，用高喊这样的口号结束了他的讲话："肯·贝协会股票万岁！它们将越升越高！"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那几封信还给韦格，同时把莫迪凯·莫根施特恩——即那个当过音乐教师的人——叫上去，与他并排站着，把他手中那张招贴画展开，因为他要向在场的所有肯·贝协会股东宣布一个好消息。莫根施特恩站到了哈莱维旁边。他现在与住院时完全不同了，真可谓判若两人。他穿得很

漂亮，黑色的套装，带饰边的衬衫，锃亮的皮鞋。出院后，他把他所有的钱都转到我们银行里来了，成了哈莱维的追随者之一。他会整天整天坐在我们银行里，密切注视公告牌上肯·贝协会股票的行情。他还会带来登有贝伦森在世界各地活动或与名人在一起的消息的最新剪报(他已经积攒了厚厚一摞这种剪报)，向我们通报他从每天的报纸上搜集到的有关肯·贝协会的信息。不仅如此，他还发现自己同肯纳德·贝伦森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是很小就成了孤儿，年轻时都吃过不少苦，都是在陌生人中间长大的。

莫根施特恩展开了那张画着一幅地图、有着大字标题的招贴画。哈莱维宣布了肯纳德·贝伦森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达成的协议，这等于是做成了数十亿美元的买卖。他说，光是这个事实本身就会使肯·贝协会股票的交易量大增，即刻使它们在世界各地股票市场上的价格飙升。在那张招贴画上，在"非洲的伟大朋友"这几个字的下方，可以看到肯纳德·贝伦森站在那里，一只手指向前面的黑色大陆。

这时，天色更暗了。院子里亮起了许多小灯。小木屋里的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了。它的三个房间内摆满了书、画、羊角等祭祀用品、八个枝杈的烛台、香料盒、两个写有希伯来《圣经》的卷轴、挂在一帧西奥多·赫茨尔肖像旁边的镶在玻璃镜框里的一份用花体德文书写的古代婚约。其余的画全是肖洛姆·阿莱赫姆各个时期的肖像。"从出生到去世，"索洛米尔在开幕讲话中这样指出过，尽管他没有按年代顺序张挂这些肖像。例如，正对着门的远处墙上挂的是肖洛姆·阿莱赫姆临终时的画像，而挨着它的却是他在卡尔斯巴德的那幅画着喝赛尔脱兹矿泉水的杯子从腰部的练子上垂下来的那一幅。他想用这些画像来强调他本人的人生观。他在开场白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肖洛姆·

阿莱赫姆真的死了吗？生与死的概念是否只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他是在外面发表讲话的，因为小木屋里太闷热，同时它也太狭小，无论如何不能同时容纳所有的客人。小屋的墙也挂不下他的所有画像。尽管德沃拉希望他只拿出几幅来展览，可他决不忍心让阿莱赫姆的任何一幅画像受到忽视和不被人看到。因此，他把它们重叠起来挂上，此外还扯了两条绳子，一条在墙的上部，一条在下部，离墙面大约十五厘米。他把每幅画的角度摆得恰到好处，使它的一面靠着墙，另一面贴着绳子。要想看得清楚，你得把头钻进两幅画之间，使人产生一种与每幅画上的阿莱赫姆单独交流的感觉。

先前被哈莱维占据来阐释肯·贝协会的哲学的那个长凳现在由索洛米尔占据着。他在竭力探讨对自己刚刚提出的那个问题的答案。在他看来，生与死远不是可以用简单的"是"或"否"来回答的定义明确的概念。他说，一个人即使跨越了生死界限，仍可以保持为无尽宇宙的一部分。

索洛米尔在开始讲话之前曾关照过我找到莱布·西尔弗，并设法同他谈谈报纸上的广告的事，向他问清楚是否这个贫民区中所有的房子都要被卖掉。于是，我便开始寻找莱布·西尔弗，最后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他。他到那里去是为了看看一位澳大利亚捐赠者所捐的一些书，而且要核实索洛米尔是否像他保证的那样把他西尔弗的名字刻在了挂在那些书上方墙上的一块饰板上。这位捐赠者没有继承人，所以在遗嘱中要求莱布·西尔弗在以色列找一处合适的地方存放他的书。西尔弗还把那人的棺材运到这里来重新安葬。在墨尔本时，我也认识那个人。我记得他是那种不安分的人。我听人说他曾同他的女儿和她的黑人丈夫离开美国到了苏联，为的是在那里帮助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后来他们全都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去了，但他又设法从那

里逃了出来。在美国拒绝他重新入境之后，他移民到澳大利亚，在墨尔本办起了一个依地语图书馆。我掏出那份登有西尔弗的广告的报纸。他忍住微笑盯着我看了一眼，奇怪我为什么要过问别人的事情。他想知道我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注意人们在报纸上做的这些小广告了？他记得我曾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物质主义的东西是嗤之以鼻的。有一次，他到一个基布兹去参观，我对他谈到一些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还带他在那个基布兹转了一圈，向他介绍那里的人们如何生活，如何养育孩子，如何照料牲口。如果他没记错的话，我还给他讲了一番人在这个世上应当怎样生活的大道理，因为我甚至从我饲养的绵羊的身上学到了一些东西。"有点草嚼嚼就很满足了，"他一字不差地引用了我的话。

从敞开的窗户外面传来嘈杂的讲话声。不过听得最清楚的还是索洛米尔的声音。他不再谈论生与死了，而是在告诉他的听众，他是如何在阿莱赫姆的感召下变成一个依地语书籍的收藏家的，以及那些不肖子孙们是如何把这些书扔到垃圾堆里、而他又是怎样把它们捡回来办起图书馆的。他还向全世界的犹太人发出了呼吁，这一呼吁得到了回应。响应呼吁的有阿根廷、乌拉圭和澳大利亚。他提到澳大利亚的那位捐赠者——莫里斯·米什金，此人捐了摆满整整一墙的书。"你怎么啦?"西尔弗一边说着一边递了一本书给我，同时又为自己取了一本。他让我把扉页打开，仔细看看我们那个时代读的是些什么书。一本是格里茨的《犹太民族史》，另一本是肖伦·阿什的《玛丽》。两本书都已残破不堪，被撕破的书页用黄色胶条粘着，有些段落已模糊不清，有些书页已经不见了。只有莫里斯·米什金图书馆的椭圆形图章依旧清晰可辨。西尔弗和我就是在那座图书馆里认识的。那时他在他叔叔的酒铺里当保安，在叔叔家后院的马厩里

栖身。我们常常坐在空酒桶上，整晚整晚地读那些书。有一个基布兹成员做朋友，他感到很荣耀。他认为，我现在这种失落感完全是由于我放弃了开拓者的生活后当上一名银行职员所致。“而且还是那样微不足道的一名职员，”他嘲讽地说，一名周末没有别的事好干而只好浏览报纸上的广告的职员。“你们这些人在以色列都养成了什么习惯？”他问道。

这时可以听到窗户外面索洛米尔在颂扬我们银行并颂扬哈莱维本人，说他给了他那个极好的建议，使他终于得以在经济上实现自立；说他们第一次见面哈莱维就向他阐明了肯·贝协会的基本原则，告诉他贝伦森本人曾保证建立一笔基金，以促进依地语文化在以色列的发展。

西尔弗抓住我的胳膊，不让我打断他自己的话头。他前段时间外出办事，回来时发现以色列人变得让人不敢认了。他们全都迷上了同一个东西——肯·贝协会股票。大家都在股票交易所买进卖出。他的一位生意上的好朋友（他是一家大企业的老板）告诉他，尽管农民仍在种地，楼房仍在拔地而起，人们仍在工厂里做工，但是在他看来，这一切都不过是在装样子而已，真正的好处来自肯·贝协会股票。事实证明，他的朋友丝毫没有夸大其词。他所看到的那些聚集在各银行外面的人群就是说明问题的证据。在那里挤挤攘攘争看最新股票行情的什么人没有？哈西德派教徒、妇女、军人！一天深夜，当巴士已经收车的时候，他甚至看到一名清道夫拄着扫把、一个跛子拄着双拐在浏览行情公告牌，还有一对恋人则站在公告牌前面拥抱接吻。

这时我们听到索洛米尔又在谈论生与死的问题了。他一边挥动着被撕成一条条的稿纸一边说，死是永存的链条中的一环。我把格里茨和肖伦·阿什的书放到身边的一张桌子上。西尔弗没有理睬我提出的有关报纸上的那则广告的询问，而索洛米尔

却急切地想让我设法说服他打消那个念头，因为他担心新房主会提高房租——天晓得他会提到多高！“西尔弗不是你的朋友吗？”他这样问过我。

哈莱维牵着拉蒙达的手走进小木屋。他显得兴高采烈，但是一看到西尔弗，他的眼神就暗淡下来了。上班时他常常讥笑我未能说服我的朋友购买肯·贝协会的股票；说许多比他阔的人都清楚地懂得该拿自己的钱怎么办。当已故的阿夫尼—施泰纳的儿子们开始投资购买肯·贝协会股票时，哈莱维特地把电话听筒伸到我的耳边，好使我能向西尔弗通报这一情况。他咯咯地笑着对我说：“把这件事告诉他。”他说这话的意思是，西尔弗这样不信任他，有朝一日他会让他感到后悔。他会直截了当地把真实情况讲给他听，而不再拐弯抹角。

西尔弗曾给他起过一个外号：“假摩西的追随者。”西尔弗要我赶紧告诉他，整天跟在哈莱维身后的那个头发剪得像个男孩的金发女郎是谁。还没等我回答，两人却已经笑容可掬地相互打起了招呼，亲切地询问对方身体可好，生意可顺利，家人可安康，并对他们何以这些日子很少见面表示奇怪。西尔弗承认，他确实应当抽空到我们银行去同哈莱维好好谈一谈了。

“你不会后悔的！”哈莱维说。在这种形势难以逆料的时候，谁不来向他咨询有关钱的事啊！就连一些穷人也来买肯·贝协会的股票了。他们卖掉传家之宝，甚至卖掉房子。哈莱维引述了诺德尔的例子。他拿到西尔弗给他的预付款后，把买公寓的事先往后放一放，把那笔钱全都投到肯·贝协会股票中去了。诺德尔用现有的利息就足可以买三套这样的公寓了。倘若西尔弗早一点来找他，他本来会建议他晚一些再把预付款交给他的。

西尔弗表现出很感兴趣的神情，使得哈莱维又把诺德尔那笔交易的细节复述了一遍。他向哈莱维保证，一俟他把所有的

房子都卖掉，他就会去找他商量购买肯·贝协会股票的事。

“他做证人，”哈莱维指着我说。正当他要带着拉蒙达走出房间，去参观小木屋其他地方摆放的展品时，里默尔与那个女乞丐一起进来了。他要哈莱维当场告诉他，他的股票此刻值多少钱。他从兜里掏出银行给他的收据时，一张美钞掉到了地上。西尔弗停下来，捡起了那张系有一根细线的钞票。当里默尔与其他人一道往前挤，想问问哈莱维用的那句英语谚语是什么意思时，哈莱维把那张钞票当作礼物送给了他。

“现在你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了吗？”西尔弗一边把钱还给他，一边问。

里默尔显得很恼火。他把收据和那张美钞塞回口袋，不再想让哈莱维告诉他自己的股票值多少钱了。他没想到会在这里撞见他的房东，这是天底下最不该知道他有多少钱存在银行的人了。他像所有其他房客一样，他总是拿着交房租的钱——那钱数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在门口等着西尔弗到来，此外，任何别的事都不让他与闻。里默尔傲慢地说，他不是三岁小孩，当他还在罗兹的时候，那里的人就对这个世上的事情知道颇多了。“人嘛，”他说，“在许多事情上都是很盲目的。就算是这钱被线拴着，他也还是要去追逐它。”他朝四周望了望，寻找他的女伴。此时她手里拿着一本书站在旁边。“《玛丽》？”她说。“一本与我同名的书？难道有人把我的事写成书了吗？”她声音沙哑，加之脸很长、头发又被梳成无数小辫，很容易被当成吉普赛人。她不让里默尔从她手中拿走那本书，坚持说一定是有谁把她的不幸都写了下来。有一次，有人问过她这些事情，她毫不害羞地把一切都讲了。“这个肖伦·阿什是什么人？”当她和里默尔走出来的时候，她这样问他。“一个受过洗礼的犹太人，”他回答。

哈莱维和他的秘书离开房间后，西尔弗说，如果连乞丐都成

了肯·贝协会的股东，那么，这种病一定是像瘟疫一样在全国蔓延开了。在他看来，这一切定会以灾难告终；这个国家患了“嗜钱癖”，年轻人不去捍卫自己的国家，而是离开它，到其他地方去。诚然，在国外的犹太人都在从以色列物色新娘和新郎，但是，谁留下来使国家继续运转呢？是在哭墙那里为国家的解体而呼天抢地的犹太老人吗？我问他为什么不对哈莱维去说这些，为什么他使哈莱维觉得他要到银行来找他谈投资购买肯·贝协会股票的事，他简单地抢白说，他犯不着把他的真理去说给每一个阿猫阿狗去听。他站到一张椅子上，从墙上取下那块有着莫里斯·米什金名字的镀银饰板。他说，此人为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而奋斗了一辈子，还把他的全部藏书都送到这里。如今图书馆终于建立起来，可是人们谈论的惟一话题却是钱，是股票交易所。“顺便说说，以色列怎么会有人不知道肖伦·阿什是谁呢？”

我望着那块饰板上莫里斯·米什金的名字，心中在想：他的女儿和她的黑人丈夫多年前被发配到西伯利亚，他们现在怎样了？我记得，米什金从墨尔本向世界各地的名人发出过求助信。当英国女王仍是公主的时候，他给她写过信，还给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罗斯福夫人、作家罗曼·罗兰等人写过信。

“想听一个有关一块美金的故事吗？”西尔弗用一种较为和解的口吻问我。

外面传进来的声音有些嘈杂了。哈莱维突然跃到石棺上，同索洛米尔站在一起。他宣称，那个用花体德文书写的古老的婚约——刚才它就挂在墙上紧挨着赫茨尔的画像的地方，他相信大多数人都看到了——实际上是一张古老的证券。他把那份镶在玻璃镜框中的文件高举过头，让所有人都能借着挂在树枝上的许多小灯泡的光亮看见它。

西尔弗和我走出房间，来到院子里。待兴奋的议论声平息下来后，哈莱维解释说，那张证券是约瑟夫皇帝执政时期由奥匈帝国发行的，以很高的价格用英镑支付，由英格兰银行提供担保。所有这一切，他都是在刚刚参观博物馆时对这份文件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之后确定的。现在，他要请大家稍等片刻，让他同索洛米尔一起回到小屋里去，把那镜框去掉，好看看印在背面的条件是怎么说的。如果条件中规定这是一张有息证券，而且那担保是无限的，那么，这半个世纪的利息将使索洛米尔一夜之间变成百万富翁。不仅如此，这张证券是开给持有人的，也就是说，谁拥有这张证券，钱就付给谁。

索洛米尔茫然地站在那里。当哈莱维打断他的讲话，以耳语把这个大好消息告诉他，并征求他的意见是保守秘密还是公之于众的时候，他不假思索地同意他当场宣布。让大家同他一起高兴高兴吧。他到处与人握手，祝愿大家都有类似的好运，还对德沃拉说，这是有一天希娜·罗歇尔拿回家来的，他把它当作古代婚约了，因为那是她几乎没花什么钱从一个弥留之际的老太太那里得到的。他从未想过去鉴别它的真伪。他把它用镜框镶起来后，几乎把它忘到脑后去了。

他跟在哈莱维的后面走进小屋，阿纳钦也在那里。人们纷纷往里挤，把他们团团围住，伸长脖子要看看那份文件是什么样。就在这时，索洛米尔发现了丽达·奥拉米和她的丈夫。他不仅同意与她一起到这里来，而且还被人说动了，愿意为索洛米尔的博物馆留下一笔钱。“这些钱只给死者用，不能给活着的人，”他不久前这样向索洛米尔暗示，尽管索洛米尔现在没有他的捐款也很容易支撑下去了。可惜哈莱维打断了他的话头，同时也打断了他的思路。刚才有一个语汇已经到了他的嘴边，可是现在再也回忆不起来他要就生死问题以及肖洛姆·阿莱赫姆

的一生讲些什么了。相反,哈莱维提到的钱数一直在他的头脑里盘旋。

当树下的人减少了一些之后,哈伊姆·齐波里才在别人帮助下站到了石棺上。他呼吁大家安静,说他也有些话要对众人讲。毕竟,索洛米尔在他的老人院当过一段时间守夜人。有人递给齐波里一杯葡萄酒,这时有人高喊:"干杯!"他用他的拐杖敲击着石棺,要大家别嚷。待安静下来后,他大声喊道:"艺术和好运万岁!"还没等他呷一口杯中的酒,他就瘫倒在地,葡萄酒洒了一身。周围的人慌了手脚。有人还没明白过来刚才发生了什么事。人们不是在树下腾出空地,反而用力往前挤,想看看倒卧在地上的齐波里。有人跑去找医生了。埃内斯蒂娜把受了刺激的肖莎娜拉到一边,一个劲儿用手敲她的脑袋,竭力使她镇静下来。路德维希·库托夫在齐波里四周忙活着,到索洛米尔来帮他时,齐波里已经开始恢复知觉。他的眼睛没有目标地转动着,弄不清自己在哪里。库托夫对他讲了些安慰的话,帮助他回忆刚才在做什么。齐波里的眼睛里掠过一丝亮光。他竭力坐起来,但那个俄国人轻轻地按住他,不让他动,直到医生到来。然而,齐波里猛地朝旁边一躲,张开了嘴巴。他的舌头像肿了似的,塞满整个口腔。他开始讲话了,但发出的声音只是"嗒—嗒—嗒—嗒—"。

当医生赶来并让人叫救护车时,院子中的客人已经所剩无几了。索洛米尔手里拿着那张证券,送走这个再送那个。他仍处在兴奋状态,对适才发生的这一切还接受不了。回到小木屋后,哈莱维告诉他,那张证券是计复利的,其价值显然比他最初预计的还要大得多,因为那证券的背面注明,这是给予当时获得证券的人的一种特殊优惠。哈莱维解释说,在股票交易的历史上,这种现象是有先例的。执政的君主政权用过这种方式来奖

赏王室中那些有功之臣。哈莱维确信伦敦仍有一个专门偿还以往朝代欠账的俱乐部存在。

他在告辞时提醒索洛米尔，第二天一早务必到银行去一下，以便发一封信查询此事。他得立即同拉蒙达和莫根施特恩一起赶去参加另一个家庭聚会，但不知道莫根施特恩现在到哪儿去了。他们发现他坐在那个脸上有个缺口的人像的阴影里，醉醺醺地念叨着什么。"我们的贝伦森莱奇万岁!"——"贝伦森莱奇"是他为贝伦森的股票起的爱称。拉蒙达悄悄地走到他身后，用自己食指上的长长的指甲在他后脑勺上刮了一下，一直刮到脖子上。她很熟悉他的这种精神状态。他们在银行里常常见到他忧伤地坐在那里不停地自言自语。他至今仍在抱怨他父亲不让他从商，而是从小就把他送到一个基布兹去生活；抱怨他父亲老是不肯把他留在自己身边；抱怨他父亲在世时一个子儿也不给他；抱怨父亲催他结婚，在内格夫定居。但他在交女朋友方面总是不顺。即便在战争期间男人们都上前线了，而他留在基布兹里，他也把本来可能得到的机会错过了。莫根施特恩打了个激灵，站起身，跟在拉蒙达后来蹒跚而去。当他从索洛米尔身边走过时，他停了一会儿，看了一眼他手中的证券，小声对他说，他愿意花一大笔钱同拉蒙达在床上滚一夜。

索洛米尔本想躲开韦格，但没躲成。韦格到这时本该早就睡觉了，因为他总是天一黑就上床的。他说他准备从我们的银行里取走他所有的马克回德国去。他在德国那边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地方，没有人来干涉他的私事。他不能允许哈莱维诬蔑他所支持的那些慈善机构，也不能允许索洛米尔用一些放肆的问题把他生活中那些隐秘的细节套出来。事实上，他对这整个国家都感到厌烦了。几周来，他一直要求肖莎娜·齐波里买一把新剪子，使他能把她的树上的那些干枝剪下来；他隔壁的那个

老太太死了，每天寄给她的德国报纸也收不到了；煤油价格一天天上涨。能使他留在这里的最后一个可能性是，他被他第一次来以色列时呆过的那个基布兹所接纳。他已经给那里的一位朋友写了信，现在正在等回信。

"是书架上挨着台灯的那张照片里的那个人吗？"索洛米尔问，但韦格拼命摇头否认。

救护车来了。库托夫夫妇陪着齐波里夫妇上了医院。其余的客人纷纷告辞，当人们把支架和搁板装到物品车上之后，大家很快爬上车，随车走了。院子顿时变得空落落的。耶胡舒阿·里默尔和玛丽早就走了。他们的一周实际上是从黎明时开始的，因为他们必须赶头班巴士到特拉维夫去。另外，玛丽把小女儿一个人扔在家里。"是个瞎孩子，"里默尔说。不过，他仍然找到机会把哈莱维叫到一边，打听了他的肯·贝协会股票现在值多少钱，还让索洛米尔给他看了约瑟夫皇帝时代发行的债券。索洛米尔在院子里的一盏小灯泡下面把那债券展开来让他看了。"还记得你追在我后头大声喊着要我买彩票、而那彩票给我带来好运的事吗？"索洛米尔问。里默尔不记得了。但是，他意味深长地朝着正俯身看债券的玛丽那边挤一挤眼，对索洛米尔说，既然他已经成了阔佬，他该买套新衣服装扮一下自己了。"那时我再同你讲话时就不会感到丢脸啦。"

我跟随索洛米尔来到门廊上，把那张报纸还给诺德尔。他和雷塞尔还坐在老地方，同售货亭的那位寡妇谈论生病的人的事。哈伊姆·齐波里的晕倒使她想起她的丈夫，他多年患病耗空了她的全部积蓄。只是在他去世之后，她才得以攒下足够的钱购买肯·贝协会股票。不，她不想再结婚了。"我守寡已经五年了，"她说。雷塞尔把报纸放回手袋，他们三人一起离开了院子。只是在他们走出大门，还能听见他们说话的声音时，索洛米

尔才想起雷塞尔头上的那顶带有大蝴蝶结的毡帽以前是属于谁的。我们一起喝啤酒时，他问我可还记得他曾带一对老人院中的老夫妻到银行来，请我帮助查一查他们的多年账户中出现的一个错误？他们两人都很瘦小，脸上始终带着有礼貌的微笑，讲的是掺杂着希伯来语单词的德语。那位丈夫总是在他的大衣的深深的口袋中装着俾斯麦时代的金币，而那妻子则不停地从她的毡帽底下用一种忧虑的眼神四下张望。那顶帽子有一个镀金的铜扣，还有一条丝带，那丝带打着的结活像一只飞起的小鸟。她去世后，诺德尔从垃圾堆里把它拣出来带回了家。

索洛米尔问我向西尔弗打听到了什么——尽管现在看来已无所谓了。如果事情真像哈莱维断言的那样，他完全可以自认为是一位百万富翁了，对西尔弗卖这一带房子的事也就丝毫不会在乎了。哈莱维在把那证券背面的几段话又浏览了一遍之后，对这张证券的有效性已经毫不怀疑了。那些话是用四种语言印的，即英语、德语、法语和丹麦语。这些语言阿纳钦都懂，所以他对索洛米尔那意想不到的好运表现得甚是激动。他对索洛米尔说，自从长大以后，他一直梦想某一天能无意中发一笔大财。他设想自己消失得无影无踪，让人以为他已不在人世了，家人也悼念过他了，然后，他突然出现了，而且已经变成了一个百万富翁。

索洛米尔进了小木屋。他从德沃拉手中拿过扫帚，请她暂时停止打扫，听他讲话。不多会儿以前，德沃拉还为索洛米尔的好运感到欣喜若狂。他们将放弃这个小木屋，搬到一个好一点的地段去。有了这笔钱，德沃拉对于离开基布兹住到城里已无需再犹豫了。在卡梅尔山上拥有一套面向大海的房子是她向往已久的事。“为什么要提希娜·罗歇尔？”我听到从窗户里传出的她那带着哭腔的声音。

我赶紧走进另一间屋子，免得偷听到他们的争吵。在墙壁的一角，我看到了先前不曾注意的一行题词："我将为我的那些已故的亲人歌唱。"我想起来，索洛米尔刚才在讲话中问过大家是否注意到了这句话。我从一张阿莱赫姆画像旁走到他的另一幅画像旁。这张上画的是他在黑林山某地坐着，那一张画的是他头戴白草帽在瑞士的某一湖边散步。阿莱赫姆在伦敦、巴拉诺维齐、里加都住过。在圣彼得堡，他穿着俄式衬衫；在敖德萨，他披着领子向上翘起的披风。看到他弥留时的情景也不可怕。在卡尔斯巴德，他刚刚还从柳条椅上站起来，用挂在颈间链子上的杯子倒赛尔脱兹矿泉水呢。

就是在挂着阿莱赫姆画像的那个房间里也能听到他们争吵的声音。于是，为了不使索洛米尔难堪，我又走进下一个房间。在那个房间内，我拿起放在桌子上的两本书，把它们放回书架。我把莱布·西尔弗忘了挂回去的那个写有莫里斯·米什金的名字的饰板也放到了书架上。关于那个美元的故事与米什金的女儿有关，因为西尔弗事实上把米什金的话转告给她了。在一次到东欧做生意时，他决定顺便到苏联去一趟。他打通了所有关节，一直到了西伯利亚。在那里，他打听到了米什金女儿的下落：她住在一个偏僻的村庄里。她的黑人丈夫早就去世了。她自己则靠教英文勉强维持生活。她找了一处远离那些窥视的眼睛的地方，给他看了一块银元。这么多年来，她设法保住了这块银元。每当她深陷绝望之际，每当她的心因渴望回家、渴望友好的眼神、渴望见到自己的人、渴望自由而隐隐作痛的时候，她就找个极端隐秘的地方拿出那块银元看一看。

索洛米尔在窗外喊我出去。他处于一种紧张焦虑状态，在后院里来回走动。他没有提及同德沃拉的争吵，只是说他要找到希娜·罗歇尔，把她应当得到的那部分钱给她。我没敢把西

尔弗所说的有关房子的那些话告诉他，因为我怀疑他甚至对我也没讲真话。我猜想，他放风说要卖房子只是为了看看在公开市场上能卖到什么价钱。这是他估算自己资产的价值一个办法。

索洛米尔一直把我送到从萨费德运来的那扇门前。院子里摆放着那些石头、石柱、人像，还有这些东西的影子，显得很热闹。我出了门向前走了一段路后，又回头朝那个灯光明亮的院子看了一眼，就在这时，那些灯突然熄灭了，一切复又被笼罩在黑暗之中。

第五章　信　心

关于索洛米尔那张值钱的证券的消息在邻里之间传开了。客户不停地打来询问各种票证的电话。他们的心中充满艳羡也充满希望,希望自己的那些证券也能带来同样的财富。哈莱维竭力利用他们对金钱的渴望,向他们推销肯·贝协会的股票。银行里到处都能听到贝伦森的名字。我们的写字桌总是被焦急的人群包围着。国外的客户也不断地发电报来;预备役军人让他们的太太带着他们的电话指示到银行来。肯·贝协会的股票每天都在上涨。平沙西克把他那套房子卖了,而且同茨威·明茨一起在特拉维夫的艾伦比大街上为股票交易所做宣传。人们在收音机里听到他们在接受现场采访时宣称,股票交易所应当属于普通老百姓。报纸上也在报道一批来自民间的新型领导者的崛起。平沙西克和明茨成了哈莱维的左膀右臂,不断地把其他屠夫和车把式送到我们这里来。

索洛米尔带来了那位来自安哥拉的立陶宛犹太人格林伯格。他想亲自来了解一下有关索洛米尔的约瑟夫皇帝债券的详情。他带来了一只铁盒子,里面装着他的中国债券。那些债券一度价值不菲,每张值两千美元。当时这种债券利息极高,令他心动不已。这些债券是他在好几年的时间里买下来的。他在那个鬼地方苦劳苦做三十年,拼命把钱攒起来,为的是能到以色列来成家立业。他每用低于名义价格买进一张债券,就觉得是朝着他的目标走近了一步。那目标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处女,她将

为他生育合法的子女。他患有严重的胃溃疡，所以在等候同哈莱维面谈的时候到附近餐馆买了一杯牛奶泡面包吃。“我真希望他没有突然死掉，”他指的是中国的蒋介石。蒋介石活着的时候，美国一位律师常给格林伯格写信，告诉他他的债券仍有赎回的可能。哈莱维一听说格林伯格还带了一些钱到以色列来，立刻就让他把钱投到肯·贝协会股票中了。

就连库托夫夫妇也来谈过钱的问题，还带来了他们在沙皇时代购买、一直妥为保管的一捆债券。出院后，他们把这些债券拿了出来，掸掉几十年的灰尘，坐在那里把它们细细审视了好几个小时。这些债券以前的价值的零头就足够他们办丧事的开支了。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到时候他们将被埋葬在什么地方。他们同俄罗斯东正教济贫会成员的谈判破裂了，因为他们觉得那些人不过是伪装的克里姆林宫特务。他们还同英国圣公会的一位牧师联系过，但也未能达成协议，因为那牧师要求他们至少每周在他的教堂做一次弥撒。但是库托夫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他不肯崇拜任何神明。他坚信，信神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暂时状态，人的生命是一种一次性的现象，它随着人的死去而结束。人的肉体停止活动了，他生前所为之努力的一切也就完结了，死后没有什么灵魂存在。他所关心的主要是不能让他们的尸体被撂在停尸房里，直至某个基布兹志愿人员来为他们弄块地方当坟墓。他们以前在报上读到过这种事情，这令他们感到不安。在本—古里安第一任政府中当过部长的本·齐夫对他们讲过，他立过遗嘱，言明可将自己的遗体拿去进行科学研究。于是，库托夫和埃内斯蒂娜便决定学习他的做法。但当时医学院校和医院拒绝接受遗体，除非先向他们交纳处置费。这就是他们要求哈莱维帮助查找处理沙皇时代债务归还问题的机构的原因。哈莱维答应帮他们查找。他们走后他就把那些那一摞俄国债券塞进

抽屉里去了。索洛米尔留了下来。给伦敦那个处理奥匈帝国债务的俱乐部的信的措词需要得到他的认可。我们还在信中附了一张证券的影印件。原件已被索洛米尔锁在他在我们银行地下室里租用的保险箱里了。“就像一个小小的坟墓,”他从那里出来时这样说道。

他渴望对这类证券有更多的了解,因此对证券正反两面的文字都进行过仔细的研究。他以前不知道股票交易所有一套专门的术语。他从未见过用依地语书写的这类内容。有必要把他的德语捡起来,而且还要开始学习英语。既然他不再在老人院中当守夜人,晚上可以睡个囫囵觉,早上也就可以神清气爽了,现在,时间已不再是障碍。除了偶尔有些发抖以外,他的恐寒症似乎也不治而愈了。博物馆和图书馆都已正式开放——尽管迄今还没有一个人来借过书或参观过他收集的阿莱赫姆画像。但是,在萨费德的时候,一开始进展也是很慢。他记得那些几乎没有人踏进他的博物馆的日子。即便碰巧有谁从旁边走过,从窗户里伸头看一眼,那也很少会使那个人走进屋里,更不要说在门口的碟子里扔下一个硬币了。希娜·罗歇尔老是笑他自己把一些零钱放到那个碟子里,以此来说服自己这个地方并不像看起来那样被人冷落。

在这里也有一张桌子挡住大半个门,桌子上也放着一个碟子——尽管德沃拉认为这实在难看。她皱着鼻子说这有点乞讨的味道。采取售票的办法会显得更体面一些。她把自己所有的攒假都用完了,已经返回基布兹去了,等伦敦那边来消息时再回来。到那时,她就会搬过来,在城里与索洛米尔同居,不过那将是试验性的。她曾在某个安息日把索洛米尔带到她那嫁了人的女儿居住的农业合作社,把他介绍给她的家人。在那里,索洛米尔无意中提到德沃拉买彩票中奖的事,因为他忘了她和拉辛甚

至对自己的女儿也保密，怕她的丈夫把那些钱全都要去。听到索洛米尔泄露的秘密，那位女婿的眼中闪出贪婪的火光，而且当即索要他妻子的那一份。他甚至威胁说，那笔钱若少一个子儿，他就要拿索洛米尔是问。从一开始他们就对他没有好感，不给他拿多少吃的东西，甚至不给他第二杯茶。那女婿示范给他看，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已经干掉并发黄的用过的袋茶。“使劲挤，使劲挤，”他说，“那样它就会使水变得有颜色了。”

“无赖！最终会有人受他的骗！”索洛米尔从合作社回来后曾这样抱怨。

他得等伦敦方面有了回话才能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他不时到地下室去看看他的证券。伦敦那边杳无音信。会不会有什么地方疏忽了？他想知道附带、平价、证券偿还期这些术语的确切意思是什么？那家俱乐部是否向任何人偿还过债务？哈莱维总是以需要时间和耐心之类的话安慰他，想必他也在这样安慰自己，因为他仍在等待瑞士方面的回信。这倒不是说他对自己能否获得肯·贝协会那个职位存有任何怀疑。他根本没有时间去怀疑任何事情。新客户的人数一直在以令人惊愕的速度增加。老老少少都在疯狂抢购肯·贝协会股票。在索洛米尔所在的那个区，关于他发了意外之财的消息使人们对于快快发财热情倍增。就连那位以前当过部长、现在是丽达·奥拉米的情人的本·齐夫也带着他保存的一大包工人银行的股票来找我们了。博物馆开幕那天他没到场。不过，当丽达·奥拉米把那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之后，他觉得现在该看看自己多年以前所做的那笔投资究竟怎么样了。他这一生一直关注公众事物，总是把涉及自己的事情往后推。在他那个时代，谁会想到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呢！他亲眼看到工人银行那些年的发展情况，看到它在一些大城市内盖起大型写字楼，连最小的城镇都建立了分

行，更不必说在各主要国家的首都建立的机构了。看到这一切，他感到万分放心。毕竟，他是这些财富的首批股东之一，而且每一股都是用"法定英镑"购买的。"在那个时代，这可是很大一笔财富啊。那叫'创办人股份'！"当他把那一包东西塞给哈莱维时，他不无骄傲地这样说。

他同丽达·奥拉米走到一起是因为她的丈夫到美国同一家电视台谈判出售一部介绍在欧洲的犹太人坟墓的电视片的事去了。哈莱维开始翻看本·齐夫的工人银行股份。他说的话让人很失望，但本·齐夫却任由他说下去，决不插一个字。即便当哈莱维对他说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有一种错觉，以为这些股票能有一点价值时，他也不动声色。当年，他用这些钱本可以在特拉维夫市中心买上一德南（土地丈量单位，略小于一英亩——译者注）土地。而今天连到饭馆吃顿饭都不够。本·齐夫伸手去取那些印着密密麻麻的《圣经》片段的股票中的一张。当手指触到那粗糙的灰色纸张时，他把目光停在了该银行最早的几位董事的签名上。那些人他全都认识，有几位还是他的朋友，但他们都辞世了。他同丽达·奥拉米默默地交换了一下眼神。看到出纳员的小办公室前面排的长队，他表示，他本来可以把附在股票上的息票剪下来兑换一点小额的利息，但他决定利息不要了。丽达·奥拉米抿着嘴朝他笑了笑。参与股市交易加上堕入情网，使她看起来比以前年轻了。后来，她把一大笔肯·贝协会股票转到了本·齐夫的户头上。

索洛米尔要哈莱维给他解释一下他的证券同本·齐夫的股票有什么不同。尽管奥匈帝国已经灭亡，他的证券的价值却在增加，而本·齐夫的股票却几乎一钱不值，尽管他听说工人银行现在已排在世界一百五十家最大银行之列。"这不合道理嘛，"他说。哈莱维不厌其详地给他上了一堂课。这堂课的要点在索

洛米尔去世后我从他的录音机里听到了。奥匈帝国政府为了给予它的少数成员以特别优待，钻了法律的空子，因为法律允许政府为其提供的贷款支付高额利息。伦敦为这些贷款作出担保，因为约瑟夫皇帝在英国的资产被抵押给英格兰银行了。而当工人银行发行创始人股份时，它是按相反的原则运作的——它把总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社会富了，个人却没有。据哈莱维说，肯·贝协会选择的是第三条道路，也就是使个人和社会共同受益的道路，而且个人与社会相比受益还略多一些，因为有关前景有利的消息一传开，个人就能够预见到他会从自己的投资中获得多少利润。

索洛米尔本人也阐述过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概念，而且把它应用到其他问题上，例如生与死的问题。尽管他承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时常陷入迷茫，他不再热衷于探讨死的问题了，但他发现在他的博物馆开幕那天中断了的思想之线是无论如何也接不起来了。当时，他灵机一动，想出了“死亡是永生链条上的一环”这样精辟的论断，但自那以后，他就再也无法用合适的语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了。每当他开始思索永生与肖洛姆·阿莱赫姆这个题目时，约瑟夫皇帝的证券和肯纳德·贝伦森的股票就在头脑中冒出来。他的思绪无时无刻不是停留在这两者中的一个上。当他消沉的时候，它们使他振作。一天早上他醒来时，感到嗓子发炎、发高烧，而且全身骨头都痛。他没去看医生，而是请一位邻居去拿来报纸。看到肯·贝协会股票又涨了，他躺在床上算起自己当天能赚多少钱来。他不再考虑死的问题了，也不再设法找寻放错地方的手稿了，把写自传的事也往后推了。但是，他继续把各种故事录到他随时带在身边的录音机上。即便是在他到全国各地去寻找希娜·罗歇尔的时候，也带着它。德沃拉还是一周两次进城来打牌，偶尔在他这里过夜。由于他

很少有什么可吃的东西，她就从基布兹给他带来各种奶制品，还把她每个月的津贴分给他一部分。这是作为贷款给他的，等伦敦那边来了答复再说。

伦敦那边来的答复是一大包书面材料，还有一张要钱的单子，说明要钱是为了支付各种费用。哈莱维认为，对方的答复证实了他的看法，即那证券是给极少数享有特权的个人的。此前没有任何人前去索要这笔债款，所以索洛米尔就是惟一权利人。一俟在英国的抵押财产被卖掉，索洛米尔就是最早拿到还款的人之一。伦敦的答复中还夹有几张照片，照片上的大楼就是当年奥匈帝国所拥有的财产。要不是因为一些前附属国——匈牙利、奥地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作梗，这些财产早就被卖掉了。那些附属国各自都对这些财产提出权利要求。这就是法律程序迁延多年的原因。不过，最近显然有了一个对债权人有利的转机，而且那个俱乐部始终注意保护自己会员的权利。它说，英国一直是维护个人权益的先锋。

索洛米尔把那些书面材料拿给我和阿纳钦看，一会儿解释解释这个短语，一会儿解释解释那个字眼。库托夫夫妇从俱乐部成员的名单中发现了一些以前的熟人与好友的名字，那都是一些国王、王子、公爵的孙辈和以前地位很高的军人的后代。埃内斯蒂娜帮助索洛米尔详细填写了申请表。他自己的名字现在也要加到那个名单里去，而且人家问他愿意要使自己的名字以多大字号出现。字号大一些，价钱自然也就高一些。但是，索洛米尔出不起这个钱。博物馆没有收入，也没有人到图书馆来借书，而肯·贝协会股票是万万不能卖的，因为它们每天都在上涨。因此，他接受了哈莱维的建议，用他的股票作担保，又向银行借了一笔钱。“他现在非常合群，”哈莱维评论说。

这时，德沃拉已经向基布兹说明了她要到城里住一年的意

图。她与索洛米尔到处看房子，看的都是那种能从卡梅尔山上看到大海的公寓。既然伦敦方面承认这张证券，还要钱支付各种费用，她就丝毫也不怀疑这些证券最终是要偿还的。像公爵这样的债权人是不能轻易置之不理的！

诺德尔到处传播有关索洛米尔同伦敦之间联系的故事。在送煤油和蔬菜的间隙，他时常赶着车到我们银行来，把马拴到银行旁边的一个柱子上，手里拿着鞭子走进来，挨着我们坐下，听我们同客户的谈话。肯纳德·贝伦森成了他的英雄。虽然他依旧发不准他名字的音，但却对我们讲，英国女王就要封他为勋爵了，还说他表示愿意买下索洛米尔的证券，以便把在英国的抵押财产弄到手。

人们还带着各种各样的文件去找索洛米尔。耶胡舒阿·里默尔带着玛丽来就她保守了多年的一桩秘密向他求教。一个寒冷的冬日的上午，索洛米尔带着他们到我们银行来同哈莱维谈这个问题。他们穿了很多衣服。玛丽在她那左三层右三层的衬衫里摸索着，直到找到她要找的那件东西——一张列明她仍埋在波兰的所有值钱东西的单子。她想出了一个取回她和她已故的丈夫在纳粹进城之前埋在克拉科夫附近一座小城中他们家的地底下的那些宝贝的主意。单子上写满很大很潦草的字母，看起来像是出自小孩之手。本来有一式两份清单，一份给了她丈夫，一份给了她。但是，她丈夫被打死了，她自己的单子在集中营里被弄丢了。她获得自由之后，她根据自己对每一件被埋起来的珍宝的记忆，重新列出了一份清单。哈莱维扫了一眼那张单子，上面列的有黄金、钻石、戒指、银质餐具和宝石等等。他说他想知道她凭什么认为那些东西还埋在老地方。毕竟，发生了世界大战，街道、村庄、整座整座的城镇都被夷为平地了。他在这样说的时候没有丝毫的惊讶。在看过客户带来的大量文件，

听了有关埋藏的珍宝的各式各样的故事，了解到人们对梦的看法、对幸运数字的看法、对幸运之星的相信之后，他早就不对任何事情感到惊讶了。

玛丽又在她的衣服里乱找了一通，拍拍这，摸摸那，最后拿出了一张快照照片来。那上面拍的是她在波兰时拥有的、后来被现住户抢占去了的房子。虽说经过一场战争，那房子却完好无损，所以她百分之百地确信那些财宝还埋在老地方。她从集中营出来后，找到了那座房子，但没敢让住在那里的人知道她是谁，到这里来干什么，因为幸存的犹太人到那一带去是很危险的。她听说过一些回来的犹太人被暗杀后像死狗一样被扔掉的事例。哈莱维看了看那张照片，肯定地认为在战后这么多年中那座房子一定被拆掉了，在原址上盖起了高楼。要是这样的话，那些财宝肯定被挖了出来并且被别人拿走了。但是玛丽还有一张更近的照片，那是在纳粹开进来时藏匿过她女儿的那位农民在一年前寄给她的。为此，她给了他好多钱。别看她现在是个穷困不堪的乞丐，她以前可不是这样。她曾经是有钱为自己付账的。只是到了以色列这里，她才穷困潦倒了。想当初，她有房子、有丈夫、有一副走在大街上引得人们行注目礼的好身材。"人们总是说我漂亮得像西班牙的舞蹈演员。"

哈莱维把那份清单还给了玛丽，也回绝了她的计划。她的计划是这样的：我们银行以这份清单为凭据，借给她一笔钱投在肯·贝协会股票中。一俟那笔钱升值三倍，就派那个男孩到波兰取回她的财宝。

"哪个男孩？"哈莱维不解地问。

"她的瞎女儿的未婚夫，"里默尔插言道。我们的桌子四周挤满了人，这使他觉得很不自在，担心我们的谈话被别人听见。玛丽也没有披露克拉科夫附近那座房子的地址，她怕别人先下

手为强，把她的财宝挖出来据为已有。她把清单又交给哈莱维，请他放在银行里妥为保管。里默尔表示可以用他的股票来为玛丽得到的贷款作担保，而玛丽会立即用这笔钱为她自己购买肯·贝协会股票。

肯·贝协会股票仍是市场上的热门，而且，鉴于肯纳德·贝伦森同第三世界国家缔结了协议，专家们预测这种股票的好运气还会长期持续下去。莫斯科邀请他和一大批金融顾问一起去访问，以商谈为他们的西伯利亚项目出资的问题。还有传闻说，肯·贝协会已承诺从南极拖一座冰山到沙特阿拉伯，以便在今后一百年中为沙特阿拉伯提供淡水。莫根施特恩给我们带来了他从外国报刊上收集到的更多的新闻，说贝伦森即将同他最新一任妻子(也就是他在西墙那里娶的那一位)离婚，并且已经同世界上最富有的钻石交易商奥本海默的女儿订婚。

雅可夫·诺德尔听说了有财宝埋在波兰的消息后，也跑到我们银行来，悄悄地告诉哈莱维说他自己的家中就埋着财宝。他多年来不断地购买黄金，他妻子雷塞尔则把金子藏在她的羽毛褥垫中。不久前，哈莱维为他算了一笔账，过去九个月他在肯·贝协会股票上赚的钱远远超过过去十年他卖煤油和蔬菜赚的钱。这促使他要赚更多的钱。他要把金子卖掉，买肯·贝协会股票。用不了多久，他就能用赚的钱把他卖掉的金子全买回来。他听说，过去十二个月中，金价没涨多少。他一边嚼着一根很长的草棍儿，一边告诉哈莱维，到他应当把房子腾出来的时候，他会把预付金还给西尔弗，自己把它买下来。西尔弗肯定会同他大吵一场，但他根本不在乎。他在拆开羽毛褥垫的一道缝，从羽毛中取出所有金块时，也对雷塞尔说过这种话。他把金块装在一双男人袜子里拿到我们银行。他表现得非常谨慎，生怕引起人们的怀疑。这笔交易没白做，因为他刚买进肯·贝协会的股

票，这股票就开始飞涨，使他赚了数目可观的一笔钱。

看到诺德尔和其他客户都能省出钱来购买肯·贝协会股票，哈莱维羡慕得要死。诺德尔这个笨蛋到现在还只能用三个叉来代替签字，他怎么会弄到那么多金子呢？光靠省吃俭用是发不了财的。他每月的薪水勉强可以度日，阿纳钦到月底也是一个子儿都剩不下。何况他们还都是金融专家。他们两人都认为，现在的公务员也不比从前了。二十世纪的公务员已经堕落了。生活对他们很刻薄，凭他们的专门知识，他们理应受到比较好的待遇。哈莱维现在从肯·贝协会中正等着他的那个职务以及这个职务将带给他的丰厚报酬中寻求安慰；阿纳钦则从股票的利润中寻求安慰——尽管现在这利润还只是纸面上的。有时，他看到大把花花绿绿的钞票在他的眼前晃动，那情景是如此真切，以致他会在一瞬间想像自己是在卖出自己的股票，自己变成了百万富翁。

终于，哈莱维不再谨慎地观望了。他从秘书拉蒙达那里借了一笔钱，投到了肯·贝协会股票中。他对客户们作出的预测毫无过分乐观之嫌。他对肯·贝协会前途的不可动摇的信心使他获得了旺盛的精力，几天几夜连续工作也毫无倦意。他每晚都要去参加各家各户的家庭聚会，很少有呆在自己家中的时候。连拉蒙达也成了股市专家。她到处为股市作宣传，呼吁修改经济方面的法律。他若在拉蒙达那里过了夜，那总逃不过我们的眼睛。第二天他会比通常早十五分钟来上班，会以涂奶油和蜂蜜的干酪、而不是通常那种切成两半的黑面包三明治作早餐。哈莱维一打开装饼干的纸袋，阿纳钦便会淘气地向他挤一挤眼，暗示我们知道他昨天夜里与谁做过爱，并朝着他的方向轻轻地哼起一支曾经很流行的歌曲："哦，亲爱的，哦，亲爱的！"

贝伦森的那位穿梭于欧洲与以色列之间的使者戴维·斯塔

福德爵士在一次来访时邀请阿纳钦到瑞士去，一切费用由肯·贝协会负担。哈莱维请他打听一下肯·贝协会的那个职位的事，问问何时能有准信儿。他本人已做好随时离开我们银行的准备，只需要一天——最好是一个安息日或其他假日银行不对外营业的时候——来清理他抽屉里的那些文件，留下一张干干净净的写字桌。我们仍然忙于处理客户们带来的那些文件，其中有一些是拿到洗衣店去洗干净了的，其他的则破损不堪，有的还被老鼠啃过。有人带来的债券是以米尔计算利息的，那是几十年前使用的一种货币的千分之一。还有的人的债券早八辈子就兑付过了。另有一个人的债券在一次抽奖时中过一等奖，但却一直没去领。后来，哈莱维带着一丝疑虑对我们讲起那债券的主人在听到这个重大消息时居然连眼也没眨一下。他没看出来那是个盲人。事实上，他已经变得心不在焉起来，对周围的事物已经失去了观察能力。正因为如此，他一直不知道齐波里就站在他身边，直至一位客户提出抗议，说有人在偷听他们的谈话。而且，哈莱维一开始也没认出齐波里来，尽管齐波里在索洛米尔的展览馆晕倒之后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也看不出有明显的后遗症。他只是看上去更虚弱、更僵直了，而且眼镜后面的眼睛一只比另一只大，大的那只眼睛与眼镜片相仿。他的圆脸比以前瘦了，变得有点像三角形。他手里拿着一张纸，但我们弄不明白他到底想要什么。哈莱维像对聋哑人和小孩子那样，用自己所知道的各种语言同他讲话。齐波里听得懂，也有反应，但却只能发出“嗒、嗒、嗒”的声音。

这不是齐波里第一次呆在我们的写字桌旁不走，使我们无法工作了。如果碰巧索洛米尔在这里，他通常会哄劝齐波里回家去，答应由他来解答他的问题。不然的话，我们就会通知老人院，让库托夫夫妇中的一个人或者让肖莎娜来把他领走。在老

人院中，他蛮横地对待所有的人。刚出院时，他很驯服，很听话。如果老人院里来了客人，而他又认出那个人是谁，他会开始不出声也不流泪地抽泣。然而，没过多久，他就变得暴躁起来，一点小事就会使他狂怒，别人若是不能领会他的意思，他就会大打出手。最后，他穿起他的那件罗马斗篷，拿上他的棋盘和几件衣服，索性搬到老人院中其他人住的厢房去住了。他不肯再同妻子同居一室，也不再像一个房东应做的那样与妻子共同进餐，而是坚持要与所有其他领养老金的人一起吃饭。鉴于他的生活已不能自理，埃内斯蒂娜便承担起照料他的责任。她带他去厕所，喂他吃饭，给他洗脸剃须。他心血来潮，执意要留长鬓脚——像当时所流行的那样，留到耳朵以下——她就耐心地满足他的要求，还带他到镜子前面去照，看看所留的长度是否正是他想要的。有一次，库托夫看到他一个人坐在那里，膝盖上放着棋盘。于是，他便把自己的棋子拿出来，与他对弈。齐波里不再能正常移动棋子了，因此库托夫就一人走两人的棋。

我拉着齐波里离开哈莱维的桌子。那天下着毛毛雨，齐波里穿着那件海军蓝风衣。他伸给我看的一张纸上写着一个超过十位的数字，其间有几处用斜道隔开。哈莱维记得齐波里有一次当着他妻子的面说过，他把其余的那笔找不到下落的钱买了肯·贝协会股票。于是，他想到那纸片上的数字很可能是他在别的银行开的秘密账户的号码。我们给肖莎娜打了电话，让她把她丈夫领回家，还告诉她我们有点急事要同她商谈。她开着他们那辆新车赶来了，还牵着一只毛蓬蓬的小狗，那狗也像她那染过的头发一样是黄色的。哈莱维把那张纸片给她看了，希望齐波里说出了其余的钱的下落。肖莎娜疑惑地扫了一眼哈莱维手中的那张纸。她的动作很怪异。她先是责骂她的狗，接着责骂她的丈夫，然后又在响个不停的打字机、电话和其他响声构成的

一片嘈杂中用她那沙哑的声音抱怨说，她已经无力独自处理每一件事情了，日复一日的那些没完没了的杂事她实在照管不过来。要不是有库托夫夫妇帮忙，她早就把老人院关掉了。她手里捏着那张纸片，专注地看了看那个数字，竭力回忆着什么。他为什么老是不肯告诉她把钱放在什么地方？他能讲话的时候一直守口如瓶，而到他不能讲话的时候，却要透露这个秘密了！他头脑清醒的时候老是撒谎，现在糊涂了却要讲真话了！她走到齐波里跟前，冲着他的脸说，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太晚了，我亲爱的丈夫，太晚了！"她补充了一句，同时指着他的风衣的肩膀，告诉他：那里面装的已经不是瑞士法郎了。她当着他的面，撕开风衣的缝，从中取出一张又一张钞票，让他知道他的秘密终于败露了。她以为他接过没了钱的风衣时会大闹一场，但他只是却木讷地对她笑了笑。她站起身来。"回家吧，硬汉子，哲学家，梦想家，"她一边把他领到门口一边说。她扶着门，让他一瘸一拐地跨过门坎。那只毛蓬蓬的短腿小狗也跟着出去了。肖莎娜把那张纸片留给哈莱维，请他查对一下，看看齐波里是否在本城其他银行做过交易。哈莱维便把那张纸塞进了他的写字桌的抽屉。

阿纳钦到瑞士去了两周回来时，带来了确认哈莱维担任肯·贝协会驻以色列代表职务的口信。书面确认马上就会来，最多再过两周时间。戴维·斯塔福德爵士已受权在下次到这里来时同哈莱维办理各种待办的手续。这一次哈莱维决定不再拖延了。他确定了一个日子，到时候将最终把桌子清理完毕。在连续下了一周雨之后的一个安息日的上午，我们三个人从侧门溜进银行，把所有窗户的百叶窗都拉上，使任何人都看不见我们在里面工作。大厅里又黑又湿。冷飕飕的气氛令人感到压抑，我们真不想动手。如今，肯·贝协会的职位已经成了哈莱维的囊中

之物。想到自己终于实现了既定目标，他已无心处理日常工作。有时他一连几天干脆不来上班，带着拉蒙达四处看房子，为未来的肯·贝协会办事处寻找合适的地点。他们两人都开始学开车了，买了一辆雪佛莱汽车的莫根施特恩开着车带他们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到处转。“一开始最好弄得排场一些，”这成了哈莱维喜欢重复的一句话。

此刻，他穿着那件开了线的风衣——就是去医院那天晚上穿的那一件——坐在写字桌前，简直无法把一只抽屉全拉出来。他略微打开一只抽屉，刚刚能伸进手去。他掏出文件，摆满了桌面，以一种厌恶的神情看着它们。他拿起一封早就写好但却一直没有发出的信，朝着坐在自己桌前的阿纳钦望了一眼。阿纳钦正在装烟斗，而且他今天装烟斗用的时间要比平时多。哈莱维竭力抑制着一种嫉妒的心情。他已经听阿纳钦介绍了瑞士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事物和那里的豪华生活。如果他应邀出席的那些聚会和他拜访肯·贝协会创始人时见过的那些世界著名的人物都确有其事，如果那些宫殿里的黄金白银、装饰宫殿墙壁的价值连城的艺术瑰宝以及他在那里看到的艳光四射的女士都没有夸张，那么，他哈莱维这么多年就算白奋斗了：在一个没出息的地方苦干了一辈子，到头来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夸耀！此刻，当他站在一个新时代的门坎、但还得在我们的银行里没完没了地度过一天又一天的时候，这种心情尤其让他不得安生。迄今为止他所取得的所有成绩似乎都不再有任何意义了。他把自己这一生最好的年华都贡献给了这家银行，他以前所设想的自己在离开这个地方时的感受可不是这样的。毕竟他在这里是有所建树的。他刚到这家银行工作的时候，这里只有一个很小的厅堂和一个前厅。偶尔有一位顾客到来，那简直是稀罕事，职员们通常都坐在那里打哈欠。那时谁听说过证券和股票？在特拉维

夫艾伦比大街上一座房子的后屋内，几个来自维也纳、法兰克福和柏林的老头儿每周聚会两三次，进行某种股市交易。实际上也就有那么五六种相似的证券换来换去，其差价只有几个普鲁特而已。谁听说过红利是什么东西！有一次，一位客户拿来一张带息票的证券，但他坚决不接受息票的利息，说那成了高利贷啦。今天要是有谁这样看，那简直荒唐透顶。银行扩大了，我们这个部成了它最红火的部门。股票交易进入了千家万户，肯纳德·贝伦森的名字成了这一带地方的口头禅。“我敢肯定，你在那里玩了个痛快！”哈莱维边把那封写给瑞士的信放在一旁边转向阿纳钦这样说。

第二封信是阿莫斯·沙伊——就是那个曾表示要花钱买哈莱维那个职位的年轻人——写来的。哈莱维看到这封他已经能背下来的信，脸上的表情突然改变了。他念了其中的几行给我们听，让我们知道沙伊准备出多少钱来买那个职位。他说，现在是给那个傲慢的年轻人答复的时候了，尽管他很欣赏这种傲慢。只有像沙伊这样意志坚定的人才具有这种傲慢，使他们得以攀上成功的顶峰。他要在协会中给他一个职位。只要有五六个像他这样的人，他们就能征服全世界。他们能制定出利用股份资本的计划，把所有值得买的东西都买下来。一听说哪家公司破产，他们马上就会用很少一点钱将它收购过来。在商业中，有一条铁的定律：手头拮据的人一定会廉价甩卖。不能让机会从指缝间溜走。他要安排阿莫斯·沙伊坐在一张列明全国所有重要企业的图表前面，让他紧紧盯住每家公司的经济状况，发现弱点就立即行动，逐步把整个公司控制起来。他们的实力会变得很强大，会建立起控股公司，拥有工厂、代理行、油井，会成立“死海工程公司”，许多城镇和乡村都会成为自己的地盘。用不了多久，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就会操纵在他们的手中。而且，倘若关

于肯纳德·贝伦森要在以色列定居的传闻属实、在地中海和死海之间修建一条运河的工程能交给他的公司来做的话，肯·贝协会就会成为这个国家实际上的主宰。哈莱维的脑子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计划，他显然不想空着手去同贝伦森的使者见面。他脱下风衣，把它挂在身后的钩子上，揉搓着双手，以便使自己的情绪进入开始工作的准备状态。

"我也要去为他们工作，"阿纳钦吐出一口烟说道。他以前从未提过这种打算。近来在乘巴士上班的路上，他曾相当骄傲地声称，是他设法为哈莱维弄到了肯·贝协会中的那个职位。瑞士那边的人对哈莱维的一再请求根本未予考虑；他参加的那些家庭聚会和为推销肯·贝协会股票及传播贝伦森的主张而做的种种努力根本没给那边的人留下任何印象。只是在他阿纳钦同戴维·斯塔福德谈过这件事之后，斯塔福德又走了一些门路，肯纳德·贝伦森才决定把那个职位给哈莱维。"借用一位英国诗人的名言，真正的友谊是最珍贵的。"但他没说这是哪位诗人的名言。

他在我们的桌子前踱来踱去，眼镜推到前额上，烟斗一会儿拿在手中，一会儿放在嘴里。他说，肯·贝协会的欧洲分部需要懂多种语言的人，因此，他很快就会成为高级经理之一。阿纳钦丝毫没有要坐下来工作的意思。他只是看着哈莱维把一只抽屉取出来，放到桌面上，以便整理那些文件，同时不停地点头，就好像是在对一句值得注意的话作出回应。

哈莱维看到了戴维·奥拉米从美国寄给他太太的一本小册子。这本题为《亲情的疆界》的小册子概要介绍了一项依据基布兹中实行的那种自愿原则制定的计划。它呼吁自由世界的男女犹太青年到欧洲去从事短期的修复和清理两千座犹太人坟墓的工作。它希望并坚信这对犹太青年和犹太传统都将是有益的。

哈莱维草草地浏览了一眼，便把注意力转向平沙西克和茨威·明茨写来的赞扬信上了。这两个人正带着各自的妻子在欧洲到处旅游。他们对哈莱维为他们做的事情赞扬有加。哈莱维不时地挑几句读出声来，根本不理睬阿纳钦所讲的话。从他的表情上看，他对阿纳钦的那些话显然不当回事，就像他对阿黛拉讲述的有关她丈夫同戴维爵士饮酒嬉闹的故事不当回事一样。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人总是喜欢想入非非。比如说，他的妻子达妮埃拉就总是想像那些镀金戒指和用来装饰她编织的瓶子套和花盆套的那些金属丝都是真的金子。哈莱维一只脚放在椅子上，给我们读了格拉·明茨代表两对夫妇写给他的信。只是到了欧洲，他们才真正领略到肯纳德·贝伦森的伟大。他的名字响彻他们所到的所有大城市和大银行。他们到那里去是为了时刻掌握肯·贝协会股票牌价的走向。既然获得了那么丰厚的利润，他们决定延长他们的旅行。他们住在豪华的酒店，吃在高档的餐厅，而且刚刚乘邮轮畅游了法国里维埃拉沿海美景。他们真不知道该用什么言词感谢哈莱维才好，因为他适时地给他们出了主意，让他们卖掉房子和卡车，把钱全都投到肯·贝协会的股票中去。格拉引用了她丈夫茨威常对她说的一句话："让老牛们卖力干活吧！"在信的结尾，她祝愿肯纳德·贝伦森、哈莱维和我们的银行生意兴隆、健康长寿。格拉在去欧洲之前曾到我们银行来换外汇。当时她告诉我们她是多么盼望能出去旅行，因为这样她丈夫就可以摆脱他的那个"荡妇"了。有一次他们正在做爱，被她捉了个正着。她说打死她她也无法理解他看上那女人的什么："长胳膊长腿，前胸平得像块菜板。"

喝咖啡时，有谁敲了敲我们后面的窗户。哈莱维拉开百叶窗的一角。原来是拉蒙达一边指着一辆汽车一边喊他出去。莫根施特恩坐在司机座上，发动机还在突突地响。他们是来接他

到加利利去转上一天的。哈莱维抓起风衣，往身上一披，把最后一口咖啡喝完，急忙向门口走去，连抽屉也顾不上放回原处了，只是朝我们点一点头，示意我们在干完我们的工作之后，帮他放回去。我们也没呆多久。悠闲地喝完咖啡后，我们把所有文件都塞进抽屉，再把抽屉放回原处，然后便把银行的大门锁牢走人了。安息日照例没有巴士，我们只好安步当车，沿着静谧的街道回家去。一间教堂里传出唱诗班领唱者高亢的声音；一些住户在家中所做的低声祈祷也隐约可闻。一个男子披着祈祷披巾、拉着他的小儿子急匆匆地走过。一个骑马的人从大街中间疾驰而行。这是一个晴朗的冬日，向阳处暖融融的，背阴处则冷得够呛。阿纳钦给我看了他在瑞士的两周期间拍的一些照片。在肯纳德·贝伦森的豪宅内，他拍了一盏落地灯。那灯开着的时候，会流出金色的眼泪。另一张照片上是挂在墙上的一幅画，画的是穿着骑士盔甲、骑在一匹白马上的肯纳德·贝伦森。从马腿下面可以看到作为背景的巨大战场，战场上到处都是阵亡的将士。阿纳钦让我看了一张他本人同斯塔福德爵士在一起的照片。那位爵士带他游览了一些山川和峡谷，让他欣赏了一些令人惊叹的美景。这十几天的经历将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直至他离开人世。他找不出适当的词语来描述戴维爵士和他的朋友们的慷慨大方——尽管在他的心目中肯纳德·贝伦森的光芒使他们全都黯然失色。在他的光辉照耀下，阿纳钦自己的财富似乎也增加了。

"那个叫拉蒙达的丫头，"阿纳钦在分手时问我，"你说她是不是跟他们两个都上了床?"

打击来得太突然了。一夜之间，肯·贝协会的股票跌了一半。索洛米尔听从哈莱维的建议，开始东挪西借，多买肯·贝协会股票，以免在它们再度回升时错过很快赢利的机会。他请求

银行提供贷款,但遭到了拒绝,因为他没有什么可抵押的财产,而他的博物馆是绝对动不得的。因此,他只好向老人院中的朋友们借——向肖莎娜·齐波里、前部长本·齐夫、丽达·奥拉米借。他甚至说服韦格借给他数目很小的一笔钱,作为一种短期恩惠,因为他正在为返回德国做准备。人们之所以愿意把钱借给索洛米尔,是因为预计他会从伦敦得到一笔财富。在此期间,他收到了那边寄来的把他的大名——施穆埃尔·索洛米尔博士——加进了名单的小册子。列在名单上的其他名字给老人院中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中有不少人是哈布斯堡王室(欧洲最古老的王室家族,其成员从十三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当过好几个欧洲国家的皇帝或国王——译者注)的后代。索洛米尔是以色列在那个名单中的惟一代表。哈莱维对他说,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理由,说明他完全用不着为借了那么多钱感到不安。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是:在肯纳德·贝伦森在以色列举行婚礼的前一天,索洛米尔听从他的劝告,以极低的价格买下了他的股票,没过多久股票就回升了,他很可观地赚了一笔。只有胆小鬼才会赔钱。哈莱维得出结论说,这是进行股票交易的关键。股票有涨也有落,你只需知道何时该进、何时该抛就行了。

哈莱维不厌其烦地对我们的所有客户讲这个道理。莫迪凯·莫根施特恩卖掉了他的雪佛莱,丽达·奥拉米自己已经没有财产可变卖,但她有一些有钱的亲戚朋友,所以便尽量从他们那里多借些钱。诺德尔卖了一匹马和他后院里囤积的所有废品。开小铺的那个寡妇拿来了她因丈夫去世而领到的人寿保险赔偿金。电影院对面那个保加利亚摄影师带来了一叠钞票。阿纳钦用他那两个当海员的儿子的积蓄买下了肯·贝协会的股票。平沙西克和明茨两对夫妇缩短了他们快活的欧洲游,仓皇失措地冲进银行。哈莱维设法让他们安下心,让他们再多拿些钱来。

哈莱维和索洛米尔惟一没能说动的是德沃拉·米肖里。股票暴跌的消息使她大病了一场,至今仍很虚弱。她到银行来了一次,对我们说,这回她可汲取了教训。一俟她的股票再升上来,她就要把它们抛光,并且从此洗手,决不再同以肯纳德·贝伦森为首的这种肮脏的生意沾边。她没有像上次那样大吵大闹,没有责怪任何人,只怪自己想得太美反使自己吃了亏。就连索洛米尔的约瑟夫皇帝债券在她看来也很可疑。如果伦敦方面不停地向他要钱来支付费用,看到他的名字同那些公爵亲王的大名列在一起,这对她又有何用?她之所以向基布兹说明她打算在城里住上一年,是因为索洛米尔有那张债券,她自己又有一些钱。实际上,基布兹的人早就知道她有那样一笔钱了,而且她也不再否认这件事了。现在她得想个什么借口来解释事情何以会变得如此不可收拾。等把自己的钱收回来后,她是决计不会再到这里来的了。

股票没有回升。这使哈莱维深感不安,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下跌的股票如果不能立即反弹,它往往会跌得更惨。他要阿纳钦同他的朋友戴维爵士联系。他自己也给瑞士发了急电。就在肯·贝协会股票下跌的那一周内,他收到了对他担任肯·贝协会那个职位的书面确认。该协会的股票一天天下跌,直至这种股票的交易最终完全停了下来。所有公告上在肯·贝协会股票的那一栏都划着一道杠,这表示这种股票已经从市场上消失了。

在瑞士,警察查抄了肯·贝协会的办公室,逮捕了该公司的高级经理人员。好几家银行都立即宣布破产了,成千上万人的存款都随之泡了汤。银行业的康采恩一家接一家地倒闭。报纸大量地报道骚乱和金融丑闻。一位高级经理饮弹自尽。一位著名的金融家从十二层楼上跳了下来,他的情妇服毒自杀。一位英国内阁大臣失踪。肯纳德·贝伦森事件成了欧洲各国议会以

及斯德哥尔摩、巴黎和罗马等地议事日程上的头号问题。意大利政府集体辞职。记者们以极大的热情挖掘着有关贿赂和贪污的新证据，每天都能爆出更加触目惊心的丑闻，而且一个比一个报得更深入。报道中明显地提到卷入这次事件的犹太人的人数。然而，肯纳德·贝伦森声称这一切不过是同他有私仇的人、嫉妒他的竞争对手以及反犹分子的恶毒诽谤。一俟他获得保释，他将发起一场宣传运动，以说明真相，讨回公道。

我们银行里也乱作一团。客户有哭的，有晕倒的，有大吵大闹的。好几个人煽动闹事，打破窗子，扬言要打人，还组织了示威。

诺德尔在此之前就受到打击了。就在他把所有金子从雷塞尔的羽毛褥垫内取出来的那天，她就病倒了，而且是一病不起。他说什么也弄不明白她究竟是因为生病还是因为失去了那些金子而懊恼，才日甚一日地虚弱下去。他一个劲地哀求她高兴起来，许诺尽快把那些金子买回来。他将把分期付款的钱还给西尔弗，他们将继续同他们的禽畜住在一起；就像以往的许多年一样，在温暖的夜晚，他将与她并排坐在院子里的吊椅上，听她为他念报纸上刊登的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所发生的可笑的故事。但是雷塞尔没有反应。只有她的小狗不时从羽毛褥垫下出来"汪汪"地叫几声，然后再钻到垫子下面去。每当诺德尔走近它，它就长时间地朝他忧郁地吠叫。为了能喝到水，这狗儿现在只好将鸟儿赶跑，自己把梯子上食槽里的水舔得光光的。家中的其他禽畜也都饿得到处乱转。那只猫失踪了一段时间，后来又遍体鳞伤地回来了。这只饥饿的猫眼神凶巴巴的，嗓子不停地发出鸽子那种"咕咕"的响声，或潜行或躺着，随时准备扑向从旁边走过的小鸡。禽畜们已不再可以自由徜徉了，因为这只猫不放过任何能走动的东西。每当这猫弓着背挡在小狗到梯子前去

喝水的路上，不让它接近扔在院子里的骨头时，它都会发出哀鸣或狂吠。

雷塞尔是在所有肯·贝协会的股票都从股票交易所消失了的那一周咽下最后一口气的。诺德尔为妻子守灵七天还未满，人家就来驱逐他了。索洛米尔和我一道去找西尔弗，让我替诺德尔向他求情，宽限他几天。“西尔弗不是你的朋友吗?”他问我。可是，不论我怎样恳求，也不论我怎样暗示我们之间有着长期的友谊，西尔弗硬是充耳不闻。“交情归交情，买卖归买卖，”他直通通地把我顶回来。七天守灵一满，诺德尔就分好几次把他的家当装到车上，拉到跳蚤市场去卖了。他用卖得的钱加上他退出房子后人家找给他的钱，买了一张床，在一所专门收留穷人的老人院里住下来了。

丽达·奥拉米也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了。她丈夫在访问波兰期间接到噩耗后，以前的忧郁症又复发了，而且再也没能康复。他终日无精打采地坐在老人院起居室的一把木椅里。长鼻子变得更长了，几乎到了下巴尖上，遮住了部分嘴巴。他几乎一句话不说，脸像一副没有表情的面具，看不出他还有任何思想。

恰好在这个时候，肖莎娜·齐波里想起了留在哈莱维那里的那张有许多位数字的纸片。她把它取回来，开始独自调查齐波里晕倒的那天应当带在身上的最后那一部分钱的下落。她让他坐在他们新买的汽车里，坐在她身旁，开着车到我们这个城里的每一家银行去，希望有人能认出他来，免得她再作不必要的解释，或者他自己能想起点什么，向她示意他在什么地方购买了肯·贝协会股票。有人对她说这纯粹是浪费时间，因为肯·贝协会已经不存在了，无论他把多少钱投了进去，也都化为乌有了，但这种劝说毫无用处。别人对她讲的话她一概充耳不闻，说她已经不能分辨真与假、分辨哪些股票已作废哪些股票还有用、分

辨什么是虚幻什么是现实了。这个世界本身已经颠三倒四了，很难说清楚真理和正义在谁那一边：是在依旧关在瑞士监狱里的肯纳德·贝伦森那一边，还是在整天缩在她的起居室的角落里、一有人靠近就大发脾气的戴维·奥拉米一边？她已经失去了判断力。或许瑞士监狱里的那位会出狱，或许奥拉米会恢复神智，或许肯·贝协会股票还会再度回升。

神色漠然的莫迪凯·莫根施特恩还是同我们站在一起。他抓住因周围发生的事情而情绪低沉的哈莱维，告诉他说，尽管他的全部积蓄都付之东流，自己已经一贫如洗，但他不会仿效他的一位叔叔的做法。那位叔叔在被很多人愚弄，变得身无分文之后，整天呆在原先属于他的那座店铺外面，胸前挂着一块牌子，上面赫然写着"受害者"几个大字。自从接到书面任命，当上了肯·贝协会驻以色列代表之后，哈莱维决心查明肯·贝协会的钱到哪里去了。他总是说肯·贝协会投资者的损失不会太大，让客户不要担心，因为以色列政府同肯纳德·贝伦森签署过协议，不许他把在以色列赚的钱转到国外，政府也正是根据肯纳德·贝伦森本人作出的要把外国资本投在以色列的保证才允许他在以色列全国各地宣传和推销他的公司的股票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希尔顿饭店召开的那次会议的重要议题。当时作出的决定都公布过，任何熟悉金融事务的人都能明白。事实上，用不着有多少专门知识就可以弄懂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哈莱维每天都在强调，只要这些钱还存在以色列，谁也不会吃亏。禽肉店老板平沙西克、卡车司机茨威·明茨以及拉蒙达都信任哈莱维。他们希望，整个这件事情会像一场噩梦一样成为过去。哈莱维解释说，历史上类似的事例，即无辜的人被判定有罪，但是到头来世人只好认错并追悔莫及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他提到圣彼得堡对贝利斯的审判，也提到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

然而,当人们购买肯·贝协会股票的钱一个子儿也没留在这个国家内、戴维·斯塔福德爵士蒙骗了银行董事们并用狡诈的手法欺瞒了财政部这一点变得明白无疑的时候,哈莱维伫立在窗前,不停地拍起光头来了。他那悬垂的双颊变得更加松弛了,脸上开始装出一种假笑。"这些钱都到哪里去了呢?"他百思不得其解。全世界的人也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尽管这些钱的数目大得吓人,有数十亿美元,但却连一点线索都找不到。许多国家的报纸用许多种语言发表着世界各地的金融专家们的猜测,但是这些钱到哪里去了依旧是个谜。特别是鉴于肯纳德·贝伦森在世界所有重要的工业化国家内都建立了一个由公司、工厂、经纪人和康采恩构成的网络,买进和卖出世界所有现代化国家都垂涎的、战时和平时均可使用的最先进的机械的技术知识,这笔钱的下落更难查清了。不过,事实后来证明,那些公司、工厂和经纪人全都是虚构的,只是一种烟幕。人们一致认为,肯纳德·贝伦森成功地进行了本世纪最精明的诈骗。

损失了钱的人合起伙来同哈莱维算账。平沙西克、茨威·明茨、他们两人的妻子、拉蒙达、开售货亭的女人、医院里的护士——全都来了。他们用威胁和咒骂来围攻哈莱维,捶着他的桌子要他把他们的血汗钱还给他们。他们在银行外面吵吵闹闹,举着标语在国会大厦外面示威,标语上写着各种口号,要求没收我们的银行,立即逮捕哈莱维。他们呼吁全国人民的良知,指责政府对这个犹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听任这种骗子逍遥法外。他们特别提到那位保加利亚摄影师和来自安哥拉的那个犹太人,说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诚实劳动的人被那些利用他们的天真的骗子们所欺骗的典型例子。"总工会到哪里去了!"格拉·明茨喊道。

一天早上,阿纳钦突然拿起他盆仙人掌,送回原来的桌子

上。肯·贝协会的垮台使他自己的小算盘打不下去了。他为自己将来退休时所作的种种设想都成了泡影。比他的错误估计、赔掉他儿子的钱更让他痛心的是他这一辈子所交的惟一的朋友原来却是一个假朋友。他在去上班的巴士车上再也不同我谈这件事了，在大街上走过时也是一言不发。有时干着干着工作，他会向后拍拍手，以驱散想像中那些讨厌的东西；早上到银行时，他会避免碰到门里面的把手。我走在他后面相距几步远的地方。我来到后，我们总是再次脱帽，相互客气地道一声“早安，先生”。有时，我们同乘一辆巴士，他的眼睛会从我身边扫过，好像根本没认出我。

索洛米尔在肯·贝协会的股票完全停止交易之后，离开本城一段时间。他锁上博物馆，拿着他的录音机到萨费德寻找希娜·罗歇尔去了。他要告诉她，他将把他有希望从伦敦那里得到的钱分一半给她；倘若他发生什么不测，她将是他的博物馆和那张奥地利债券的合法受益者。他把他仍欠着钱的所有人的名字都录到了磁带上——其中有我们银行、有德沃拉、齐波里夫妇、奥拉米夫妇、前部长本·齐夫、韦格。索洛米尔去世后，我在从录音带上记录他收集来准备有朝一日写自传用的全部故事时听到了这些名字。他到萨费德去，是因为他渴望见到希娜·罗歇尔。他会对她说，他同德沃拉·米肖里的这段恋情只是他生活中的一个短暂的插曲。尽管它曾是一个美丽的插曲，但毕竟是短命的。德沃拉不是那种肯为艺术献身的人。他会把欠她的钱全部还给她，今后还将是好朋友。他对一切都无怨无悔，而且他已经给她写信谈过这一点了。在肯·贝协会股票作废的那一周，她到西奈沙漠旅行去了。

等德沃拉旅行回来时，一切都过去了。她在索洛米尔家中没有找到他，就到银行和老人院中去找他。她要我们把索洛米

尔的约瑟夫债券交给她，但是，当她听说他已经把它抵押给银行以取得贷款时，她咬着嘴唇强压下怒气。第二天上午，她在女儿和女婿的陪同下又来了。那位女婿很像索洛米尔描述的样子，但银行雇有维持秩序防止闹事的警卫。不管怎么说，即便在听说德沃拉的钱已经分毫不剩的时候，他们也没捣乱。他们只是低声商量了一下，那女婿撂下这么一句话：只要他看见索洛米尔在基布兹或他的合作社附近出现，他就要把他打得灵魂出窍。

索洛米尔从萨费德回来时，发现他的小木屋已经被洗劫一空。从一位邻居含糊的叙述中，他得知是德沃拉、她的女婿、女婿的兄弟和姐夫妹夫开了一辆卡车来，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把能拿走的东西都拿走了。他们对几个房间和后院来了一番大扫荡，没留下一块石头、一幅画、甚至一张书页。墙壁已是光光的，窗户打开着，门上只剩了一个合页，斜挂在那里。只有那口罗马石棺还放在树荫下。索洛米尔把窗户关上，把门弄好，用一截电线把插销拴上，然后又回到老人院去住了。在那里，他再度当上巡夜人，白天兼做一些杂务，以便挣钱还债。他帮助埃内斯蒂娜·库托夫照看哈伊姆·齐波里，带他去散步，还为戴维·奥拉米读报纸。索洛米尔签署了一份文件，授权银行把他每月的社会保障补助金扣掉百分之五十，用于偿还债务。只有韦格等不得了。由于基布兹一直没有答复他提出的重新接纳他的要求，他要求把他的钱还给他，以便他能立即回德国去。但是，索洛米尔说服他亲自到基布兹去一趟，请求秘书处发善心，实在不行再利用一下他那位女朋友的影响。他自告奋勇陪他前去，代韦格同那里的人谈。他说他以前常干这种事。

在一个星期三，他们乘坐巴士到了基布兹，在那里吃了饭，但却找不到可以谈话的人。于是，他们便到安娜·松塔格的家中去拜访。这是韦格以前在基布兹时惟一有点交情的人。她就

是我们给韦格送去库托夫的靴子的那天在他的住处看到的照片上的那个包着头巾的女人。索洛米尔所能了解到的有关她的情况，只是知道她在基布兹中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像修道院中的修女差不多。事实上，她极力避免请他们进屋，只打开窗户露出四分之一张脸，大声地说："我不是告诉你不要来吗？你没收到我的明信片吗？"韦格作出一个姿势，表示他口渴得很。门上的一个缝隙开大了一会儿，一只手递了一杯水出来。在回家的路上，韦格想到，他们这一趟并不完全是白来，想到这里自己感到了一点安慰。安娜·松塔格还记得他爱喝什么饮料——四分之一杯是搅碎的杨梅，其余是苏打水。他到德国去了，行前他逼着索洛米尔签了一纸协议，以不得改变的承诺授权银行，一俟他的约瑟夫债券兑现，银行将把索洛米尔欠他的钱分成五份，分给他所支持的五个慈善机构。

索洛米尔在带哈伊姆·齐波里去散步的时候，会把他在萨费德那些年中的经历讲给他听。有一天，他还带他去看了他那座已经荒废的博物馆。他用手指着告诉他，那些墓碑、古代陶罐小径还有那一圈石柱原先都在哪里；肖洛姆·阿莱赫姆弥留之际的画像，还有肖洛姆·阿莱赫姆在卡尔斯巴德的那张画像都曾挂在门对面的什么地方。那里曾是一个真的博物馆，里面展出的是他毕生的收藏品。想到所有那些东西都在某个阴暗的洞穴内烂掉，真让他痛不欲生。单是那些书就曾摆满几面墙壁！所以，他曾利用一天休息时间到德沃拉的女儿、女婿所住的合作社去，希望能看到他的古董被放在某个地方。那是在天快黑的时候，周围是一片汪汪的狗叫声。他在大路上走了差不多一整夜——因为他忘了那一带在入夜之后是没有巴士的。他还到德沃拉的基布兹去过，去过两次，都是在晚上去的。那两次他都从百叶窗的缝隙中看到德沃拉在与一些朋友打牌，而且看来她是

整日整夜地玩牌,从不休息。索洛米尔相信齐波里把他对他讲的话全都听进去了。他在吃了医生给他开的特殊的药丸之后,变得文静而又和善。他不再发脾气摔盘子了,而是像一个真正的禁欲者一样矜持寡言。索洛米尔到银行来看我们时就是这样描述他的。

他现在来得比以前少多了,尽管我们现在的工作不像以前那样忙了,即使在上班当中也有足够的时间闲聊。由于肯·贝协会的垮台,其他股票的交易也降到了最低点,特拉维夫股票交易所看来已处于停滞状态。感到失望并怀疑一切的客户关闭了他们在我们银行开立的户头,对于同证券和股票沾边的事一概不肯再听。有时,某个在我们这里损失了全部金钱的人会走进来,把周围环顾上好几遍,然后默默地离去,谁也搞不清他来干什么。平沙西克夫妇搬到加利利的一个镇上去了,他在那里的一家超市找到了一份卖肉和卖鱼的工作。他妻子则当收款员。茨威·明茨在西奈沙漠某地给人开推土机,三个月才回来一次。他妻子格拉在一家服装厂当上了缝纫工。人们倒是常常可以看见雅可夫·诺德尔坐在另一位车老板的车上。他偶尔会到银行来挨着我们坐一会儿,嘴巴和裤子前口都微张着,脸色阴暗,目无表情。哈莱维和我还记得诺德尔拿来金子——有的金块上还粘着羽毛——那天穿的袜子。只有清洁工雷切尔和艾哈迈德·纳阿拉尼还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事,仍把他们从工资中省下来的钱拿来让哈莱维给他们买肯·贝协会的股票。一个晴朗的安息日的上午,我看到艾哈迈德在大街上走着,一会儿折到这一侧、一会儿折到那一侧,就像是跟在诺德尔马车后面,向街两侧的主妇们卖煤油似的。

有时一整天也没有一个顾客到银行来,股票交易所的晨间公告上也没有任何东西可读。证券和股票的价格变动极小,升

降都只有一个点。金融评论员不停地重复昨天或许多天以前讲过的话。偶尔，某家日报的财经记者会预测，股市交易很快会活跃起来，但这不过是一种梦想，最终都未能实现。现在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尽可以清理塞在抽屉中的那些未处理的文件了。我再次查找起证券所有者来。有些证券还是英国托管时期发行的。哈莱维也开始清理他自己抽屉里的积压文件了，其中包括阿莫斯·沙伊写给他的那封他一直没回复的信。有一天，电话铃响了起来，打电话的人告诉哈莱维，阿莫斯·沙伊仍然愿意购买他的肯·贝协会驻以色列代表职位，出价是一个以色列镑。哈莱维搞不清楚打电话的究竟是阿莫斯·沙伊本人呢，还是某个以前的客户在希望全部破灭之后对他进行报复。还有可能是某个了解哈莱维的处境的人——很可能是拉蒙达，在同他算账，把他当作笑柄。她已不在这个镇上了。有一次我听到她在电台上讲话，内容是支持妇女解放之类。

受到所有人冷遇的哈莱维感到痛苦不堪。所有沙龙聚会都已停止活动，他晚上便无事可做了。他的妻子达妮埃拉几乎足不出户，不是织网套便是坐在窗前呆望街对面一直延伸到海边的众多房舍的屋顶。那些瓶套和花盆套装饰着亮丝、金圈和彩色玻璃珠，在灯光下像宝石一样熠熠生辉。“我们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在发光和发亮，”有一次哈莱维情绪比较好的时候，这样说过。

哈莱维抽屉里的各种文书中还有库托夫夫妇送来的那一打文件。我们发现美国有一家律师事物所办理向当今的克里姆林宫统治者提出诉讼，要求他们偿还沙皇债务的事宜。但是，他们只为具有美国公民资格的客户服务。另一方面，哈大沙医院很有可能接受库托夫夫妇提出的处理他们的尸体的要求，不收任何费用。前部长本·齐夫答应为他们办理这件事。他现在仍有

一定的影响力。人们不时请他出出主意，政府机构和各种委员会总是欢迎他去捧场。即便没人邀请他参加会议，他也不会寂寞：他会花大量的时间在希伯来文报纸上查找和记录印刷错误。他每天都能收到一摞新的报纸、杂志和期刊。要是哪一天能找到很多印刷错误，他会非常开心。

哈莱维抽屉里的文件中还保留着任命他为肯·贝协会驻以色列代表的委任书。它被套上一个塑料壳，免得被污损或弄皱。肯纳德·贝伦森再次获得了自由，他的名字不停地见诸报端：新的诈骗，另一起自杀，有关多少人上了肯·贝协会的当、多少家庭因此而沦为赤贫的统计数字，贝伦森不仅拒不支付他的前妻索要的赡养费，还认为自己被所有人所陷害，杜邦家族、罗特希尔德家族和奥本海默家族全都否认自己与肯纳德·贝伦森的事情有任何瓜葛，贝伦森因害怕复仇者的子弹而躲起来了。一家报纸说，他现在用假名居住在以色列。还有人推测，贝伦森会愿意在瑞士受审，那很可能使他被判处二十五年监禁。

哈莱维给他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对他的诚实深信不疑，并说以色列还有许多人也与他有同样的想法。贝伦森的公司倒闭对他们丝毫没有影响，而且，尽管大多数人都对公司的创建人抱有怨恨，他哈莱维却依旧是他的忠实追随者，并没有对他的主张或对他为自己确定的目标——使穷人富起来——感到幻灭。他惟一的错误是使自己被冒牌的顾问和贪婪的助手所包围。哈莱维认为，正是那些人背着他进行种种可疑的交易，对他隐瞒真相，使他误入歧途。到了清算的那一天，他们都逃之夭夭了，而那些被捉个正着的家伙则百般抵赖自己的罪责，把矛头对准肯纳德·贝伦森。最后，哈莱维认为，今后，如果他不再同在关键时刻溜之大吉的戴维·斯塔福德爵士——此人已被列入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名单——之类的人交往，他会听到有益的建议。

现在，哈莱维倒是倾向于相信阿黛拉对他讲的那些有关她丈夫同肯纳德·贝伦森的特使戴维·斯塔福德爵士背着她寻欢作乐的那些故事了。阿纳钦本人再没提过他在瑞士度假的事。有时，他走过来，坐在哈莱维的桌旁，好像有话要说。但他把烟斗装满、深深地吸了几口之后，依旧默不作声。在银行员工开会时，我会看到他在纸上画出两排并行的美元和英镑的符号——$和£。它们像铁轨一样延伸，越远越小，直达天际。

我们清理完一个又一个抽屉，证券交易所依旧毫无动静，就好像进入了冬眠期。我们银行里的生意也同样清淡。惟一活跃的时间是老人院的那些享受退休金的人来领取政府发放的“代代相传”养老金的时候。索洛米尔对我们说，在老人院内，这一天实际上在头一天吃过晚饭后就开始了。老人们各自找一个角落，把证件从一个口袋换到另一个口袋，嘴唇翕动着，默记着胡乱写在小纸片上的计算结果。需要特别妥善保管的是身份证，千万不能放错了地方或者在人家要你出示的时候拿不出来。在这种时候同任何人说话都是很危险的。大家都很容易发火而且都是诡诡秘秘的。次日清晨，许多人都在天亮之前起床，因为激动而一次又一次地去解手。那天的早饭总是一团糟，因为人们的表现要比平时更加古怪。不论索洛米尔多么细心地摆放餐具和饭菜，他们总能挑出毛病来，抱怨什么都放得不是地方。

银行开始营业前好几个小时，那些领养老金的人就围在入口处等候开门了。间或有些等得不耐烦的人用指关节敲击门上的玻璃——尽管银行的玻璃门不到点是绝对不会开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属于以色列的一些特殊种群。从他们的衣着以及站相和坐相可以判断他们是哪个种群的人。其中有一位来自匈牙利的退休工程师，他把胡子刮得光光的，身上散发着一股香皂味，衣服烫得平平整整的，领带、袜子和鞋子都与衣服相配；那位

曾是垦荒者兼养路工的人，鼻子红红的，脸上是一副闷闷不乐的表情，卡其布裤子的裤带系在大肚皮的下方；一位老太太蹲在人行道上，穿着好多件花衣服，那些衣服都是从有钱的人家和贫穷的人家讨来的；还有一位身材瘦削的族长式的老头，他穿的袍子和留的胡子都是白色的，而且都很长。

索洛米尔的任务之一是把戴维·奥拉米带到银行来领养老金。奥拉米本来用不着自己来领，但他的儿子们坚持要让他们的父亲至少每个月有一次出来透透气的机会。他们还让索洛米尔每天给他读报，这是他当初向丽达·奥拉米借钱时提出的一个交换条件。不过，不论给戴维·奥拉米读什么，对他都是完全一样的。任何东西都不能驱散他的深深的忧郁。然而，当索洛米尔开始为他读他的小册子《亲情的疆界》的时候，他似乎发现奥拉米的眼睑颤动了一下。为了引起他的进一步的反应，索洛米尔接着读起奥拉米在美国时在一位捉刀人的帮助下写出的有关为后代保留欧洲的犹太人坟墓的著述。继序言之后，是一些著名的犹太人士发表的一系列宣言。这些名人意识到即将到来的灾难，都曾极力寻找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诗人海涅皈依了基督教；哲学家摩西·赫斯倾向于祖国以色列；记者纳丘姆·索科洛夫设想把犹太人迁到马达加斯加岛上去；西奥多·赫茨尔则想让他们移居乌干达；而依地语诗人兼周游世界者梅莱奇·拉维奇甚至把船开到了澳大利亚，考察一片叫做“金伯利”的地方。他在致欧洲犹太人的公开信中不停地劝说他们带上妻子儿女离开欧洲这个炼狱。“而且也不要把坟墓留在那里！”他始终不忘叮嘱这样一句。在另一页上，索洛米尔看到一帧照片，照片上拍的是一度著名的拉比摩西·戴维·韦尔特曼的坟墓。这位拉比本人生前也念念不忘要解救他的人民，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救世主带给他们；也正是这位拉比，在他已成为皓首老翁

的时候，心中还燃烧着另一个愿望：他的第四位妻子——一个年轻的孤儿——能终生不再改嫁。不过，他的这两大心愿最终都没有实现。

索洛米尔的巡夜人差事以及他对哈伊姆·齐波里和戴维·奥拉米的精心照料，占去了他的全部时间，使他无暇照管自己的事情。他的床就放在一间小小的穿堂屋子里。这在夜里对他倒没有影响，但是，在白天，人们川流不息地穿越他的房间，使他根本无法好好休息，更没有任何隐私可言。他的小木屋已经空空如也，荒废在那里了。德沃拉不仅把屋里所有的厨房用品都搬走了，连床也没留下。天气刚有点暖和，他就向肖莎娜·齐波里要了两条破毯子，把它们铺到大树下的石棺里，使他不时可以在里面眯一会儿，同时也能晒上个把小时的太阳，暖和一下被冻僵的筋骨。

有一天，我从耶胡舒阿·里默尔住处回来时从小木屋旁经过。我看到索洛米尔正在费力地把石棺从树荫下往有太阳的地方推。我是受哈莱维差遣，去向里默尔说明肯·贝协会股票的现状的。我们给所有客户都写了信，竭力使他们不致太消沉，要他们到银行来听听我们的介绍。里默尔一直没有来，而且他的小棚屋也锁着。通过百叶窗的缝隙，我看见他屋里的东西还在，但门上的信箱内装满了我们银行给他发的通知。索洛米尔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在为丽达·奥拉米举行葬礼时在墓地也没看到他。他想，他也许已经结婚了。

我帮他把石棺推到太阳地里。要是在从前，总会有个邻居来搭把手。但是现在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邻居了。以前，某个领养老金的人去世后，会有一位新的领养老金的人搬到他那里去住。莱布·西尔弗不再出租空出来的小木屋了。不久前，他给我看过一本澳大利亚周刊，那上面登载了一则整版广告，还配

有两张照片：一张是这一带的现状，另一张是不久的将来的景象。照片下面的文章对我们这座小城推崇备至——它依山面海，空气清新，有益健康。文章呼吁有能力的人快到这里来建房子。

诺德尔的院子已经荒芜了。院里长满杂草和荆棘，没有任何生灵，也没有任何物件，只有空气中依旧飘散着些许牲口粪便的气味。部分屋顶已经破损，瓦已经没了。索洛米尔的院子里也是什么都没剩下，就连他以前用来推石棺的那根管子也不见了。他指着锡皮屋顶和门廊的墙壁之间的空隙说，他甚至用不着把以前慢慢掀掉屋顶的树枝锯掉了。要不是他每月都要同莫迪凯·莫根施特恩到某位喜爱依地语民歌的教授家中去参加聚会，他会认为自己早就死掉了。

索洛米尔来银行时已经对我们谈起过那些来自拉美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男孩和女孩的事。这些理工学院的学生虽然不懂依地语，但唱起依地语歌来就好像他们是在东欧的犹太人小镇上出生长大的一样。在理工学院内，他喜欢上了一个女孩，他觉得那女孩的样貌非常可爱，声音十分悦耳。有一次，他对她说，从她和她的朋友们身上他看到了依地语在以色列的一线希望。他总是滔滔不绝地大谈这个问题——他一向喜欢当众演说——对他们讲犹太民族的一些侨居国外的儿子如何使自己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们当中包括连一个依地语单词都不会的西奥多·赫茨尔和在埃及一位法老的宫廷中长大的摩西。就连大卫王的曾祖母也不是犹太人。

索洛米尔讲述的事情在我们听起来有些牵强附会。我们从重操音乐教师旧业的莫迪凯·莫根施特恩那里听到了另一种版本，尽管那些学生的确几乎连一句依地语都不懂也不会说。原来，理工学院有一位教授一直很喜欢他在他父亲的老家学会的

依地语歌曲。由于他是理工学院的一位有名的教授,学生们都愿意上他的课。他还让学生们参加每月一次在他家中举行的依地语民歌演唱会。那些孩子们把索洛米尔看作一个喋喋不休的老头、一个怪人,而那位教授却即刻对索洛米尔产生了好感,因为他会唱许多有关犹太教学堂和有关窃贼的民谣。他让索洛米尔教他唱这些歌谣。作为回报,他送给他一部非常古老的肖洛姆·阿莱赫姆作品选集珍本。在索洛米尔看来,这就像是一个新的开始,于是,他到银行来向我们宣布了他要建立一个新的依地语图书馆的意向。此刻,在我帮他把石棺推到阳光下之后,他表示了这样的希望:德沃拉也许会回心转意,重新回到他的身边,把抢走的博物馆展品还给他;伦敦也许会很快把他的债券兑现,使他能如数还清欠她的债。

但是,到德沃拉真的出现的时候,索洛米尔已经撒手人世了。当时她站在墓地入口处等待送葬的行列,与她站在一起的还有平时同她一块打牌的朋友。由于天热,她穿着一件薄薄的绿色长裙,头上顶着一方黑手帕。哈莱维向她打招呼时,她只矜持地点了点头,然后便远远地跟在送葬队伍的后面行走。就是在墓穴周围,她也保持着距离,避免同任何其他吊唁者接触。

希娜·罗歇尔也离开众人,独自站在那里。她看上去与索洛米尔生前描述的大不相同。她的灰白的头发遮盖着前额,深色的眼镜又遮住了一部分脸庞。当哈莱维得知她的身份后,他走上前去同她讲了几句话。他对她说,作为索洛米尔的遗孀,她是他的所有遗物的惟一继承人——尽管那遗物少得可怜。其中有他后院里那具罗马石棺,有一整套肖洛姆·阿莱赫姆作品集,有一部录音机连同全部录音,还有那张仍然被抵押在银行里的奥地利债券,那是留作充抵借给他的贷款的。

原来,希娜·罗歇尔早就知道索洛米尔在设法同她联络,但

她本人根本不打算再见到他。她也不想继承他的任何遗物，最不想要的便是他录在磁带上的那些东西。“他有些什么生前不曾对我说的话要在死后告诉我？”她耸耸肩膀说。

“施穆利克死了！”耶胡舒阿·里默尔在用唱诗班领班那种慢慢吞吞的调子同吊唁的人打过招呼并从哈莱维那里得知我们在为什么人送葬之后，这样惊叫了好几遍。他急忙朝入口处的墙边走去，那里有一个失明的女孩坐在地上，头部被树荫遮着，两腿却伸到太阳地里。里默尔把要钱的盒子放在她身旁，又急忙回到我们这边来了。听说没有雇领唱的人（因为没有这笔钱）而只是由老人院的一位老者主持葬仪，里默尔便自告奋勇在坟边吟诵依地语悼文。然后，他又冲着索洛米尔的遗体唠叨起来。他在向死者的遗体告别并告诉他玛丽刚刚于一个月前去世之后，便让索洛米尔立即去找她。鉴于他们两人以前常常念叨他给他们的种种帮助，她一定知道他是谁。里默尔希望他告诉玛丽，她没有什么可担忧的，她的女儿受到值得信赖的人照顾。他将兑现他在她去世之前向她许下的所有诺言，他这个星期就要到银行去把他所有的肯·贝协会股票都转到她女儿的名下。他很高兴当他自己的大限到来时能有人继承他的这些股票。这肯定是一笔大钱了，肯定要比他在索洛米尔的展览会上写在收条上的那个数目多出很多。于是里默尔便开始浑身上下翻找那张收条，把各种物件从一个口袋换到另一个口袋。他掏出了一捆鞋带、一根两头露着烛芯的蜡烛，还有一个鼻烟盒。在收条依然找不到的情况下，里默尔又把所有这些东西塞到一个口袋里。他会到银行去查询他的股票现在值多少钱，反正足够花一辈子的了。他有些迷惘地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俯下身去冲着墓穴里喊道：“告诉她，她女儿的未来是有保障的！”

在众人散去之前，肖莎娜·齐波里觉得活着的人也需要听

几句好话，于是便请哈莱维向戴维·奥拉米、诺德尔以及她丈夫讲点什么。她的丈夫由路德维希·库托夫搀扶着，免得从墓穴旁边的土堆上栽下去。哈莱维已经赞美过死者，此刻也不反对再向活着的人发表讲话——如果他们愿意听他要讲的内容的话。就在前天，当索洛米尔腋下夹着几本书来到银行，宣布他打算重新开始建立一座依地语图书馆的时候，哈莱维还对他讲过同样的话。当时，他告知索洛米尔，伦敦方面传来了一些有关他的债券的令人振奋的消息，还谈到特拉维夫的股票交易所即将结束长期的停滞状态。不等这个夏天过去，它的生意就会再度红火起来。毋须说，所有这一切将使我们的银行再度有生意可做。他还把肯纳德·贝伦森给他的回信拿给索洛米尔看了。贝伦森依旧忙着恢复自己的名声，捍卫自己的信誉。一俟他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他会再度追求自己早就确定的目标，不过不会重犯以前的错误了。他在回信中写道，肯纳德·贝伦森协会的哲学并没有破产。看到肖莎娜拉长了脸，一副不高兴的样子，他向她俯过身去。“请保持信心，夫人，”他说。“请保持信心。”

这也正是索洛米尔临死前听到哈莱维对他讲的使他朗声大笑起来的那句话。

“请保持信心，我的朋友，请保持信心。”